

記憶

REMEMBRANCE



2008年9月13日创刊 2017年7月31日第11期 总第189期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史研究

《记忆》189期

目录

【专稿】

- 文浩 等 2016年亚洲研究协会年会
——关于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派性问题圆桌讨论会的报告 2

【评论】

- 杜钧福 解读刘丽英《往事回首》兼谈造反派定义 22

【评杨书】

- 胡鹏池 评杨书前言历史决议 41
刘建业 吴法宪的这个说法能采信吗？——小议《天地翻覆》的考据 68

【读书】

- 途 客 字里行间的反思——一位思想者的《回首文革》批注 69

【旧文新编】

- 龚忠武（台湾） 纪念海外“文化革命”四十六周年（1970-1976）
——一段金色的记忆与反思 92

【编读往来】

- 1.张正儒认为，胡拾音的文章仍在沿用文革思维 110
- 2.何蜀正误
- 3.樊能廷对于胡拾音文章的一点意见 111

鸣谢：本期封面照片选自李振盛摄影集

【本刊声明】

【专稿】

2016年亚洲研究协会年会

关于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派性问题圆桌讨论会的报告

讨论人：文浩（Felix Wemheuer 科隆大学，主持人）、魏昂德（Andrew Walder 斯坦福大学）、安戈（Jonathan Unger 澳洲国立大学）、安舟（Joel Andreas 霍普金斯大学）、吴一庆（Yiching Wu 多伦多大学）

亚洲研究协会年会圆桌会议讨论记录，2016年3月美国西雅图

1980年代，在研究中国文化大革命（1966-69）的西方学者中，盛行一种对群众政治派性作出理性解释的范式，这种范式不是将群众运动仅仅描述为“疯狂的行动”，而是将派系斗争解释为文革前具有不同社会背景和政治利益的社会群体之间潜在冲突的升级。这一曾经非常富有影响力的解释范式近年来受到从不同角度提出的质疑，最强有力的质疑来自魏昂德的专著《分裂的造反：北京红卫兵运动》（*Fractured Rebellion: The Beijing Red Guard Movement*，哈佛大学出版社，2009）。魏昂德及其他几位学者认为，这种解释过于夸大了文革前的社会背景的差别在派性形成及冲突中的作用，而事实上，偶发事件和运动过程中所产生的新的团体认同与利益的影响要大得多。本场圆桌讨论的目的是为这一争论寻找新的切入点。基层的派系斗争如何与高层政治相关联？参与者的社会和政治背景如何对派系斗争产生影响？对毛泽东思想的不同解释是否在其中发挥作用？派系成员参与斗争主要是不是为了不被别人打倒？

第一部分

文浩： 魏昂德，在关于北京红卫兵的书以及与董国强合写的关于江苏文革的系列论文中，你不同意用文革前的社会矛盾和参与者的社会背景来解释派系斗争。你的主要论点是什么？这些案例有多大的代表性？北京重点高校的派系斗争部分地可以用高层领导的操纵来解释，但是这个因素在南京真的那么重要吗？

魏昂德： 关于这些案例有多大代表性问题，从逻辑上来说，只有在对其他地区都做仔细的研究之后才能做出回答。而这样的研究至今尚未完成。我们得依据证据而不是猜测。

不过，真正的问题不是能不能用成员的社会背景来解释派系斗争，而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社会背景有可能在派系斗争得到表现。我们所讨论的问题是导致某种后果的政治进程，而非“一般的”或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后果。提出“派系斗争一般来说是不是反映了参与者的社会背景”这样的问题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有时是，有时不是。而真正的问题在于为何派系冲突有时候反映或不反映其成员的社会背景，以及在什么情形和背景下？

关于文革派性的社会学解释（social interpretation，俗称“社会冲突论”）的一个最基本的看法是：有的派别倾向于维持现状；有的则斗争性更强，要求激烈地改变中国的社会与政治体制。如果我们看一看派系斗争的模式，这种解释就会遭遇一个显而易见的逻辑问题，即在地方性冲突的某个阶段联合在一起的造反派群体常常在其他阶段分裂了。如果造反派群体时而联合时而分裂，从逻辑上看，它们就显然不可能一贯性的表现自己的社会背景，而有可能是社会背景在开始时起了决定作用而后来不再起作用，反之亦然。如果我们坚持社会背景与派系划分存在因果关系，我们就得直面这个明显的逻辑问题。

关键的问题是我们怎么看待导致派性分化的政治进程。对文革政治的最大误解是：干部、党员、政治积极分子或出生于某种家庭背景的人，他们有能力观察迅速变化的、在很多情况下是前所未有的情况，并且可以对什么是他们的利益作出明确的判断。当时原有的现状被打破了，人们得决定采取什么立场。或许在某些环境和情况下，做出什么选择是很清楚的，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在所有情形下都是这样。我们对北京红卫兵运动和南京

文革运动案例的研究表明，这种对政治过程的理解方式与我们能够观察到的经验证据很不一致。

我们的核心观点是，运动参与者必须判断环境、做出政治选择。持社会冲突论观点的学者认为，这种选择是很容易的，参与者可以根据他们面临的形势做出完全符合他们预期利益（基于他们的职业或家庭背景所预期的利益）的判断。在北京的高校和南京的很多情况中，我们发现一种共同的模式，即在高校和很多工厂，运动积极分子得对上级领导派来实施清洗的“工作组”的行动做出判断。过去我们曾以为，这些工作组是要保护在职的领导、避免党组织受到攻击，但这种看法大多没有证据支持。现在我们知道，尽管并不多见，有时是这种情况，而且工作组的行为会在短时间内急剧变化。事实上，很多工作组的工作是针对所在单位领导的大规模清洗。那么对于运动积极分子（好比说，党员或者与单位权力结构紧密关联的个人），他们就必须得判断工作组的行为是否与他们自己的个人利益相一致。

在文革中，如此艰难和难以解释的选择十分常见。比如，作为造反派，你要不要支持军队的介入？实际情况是，如果军队最初的行动削弱了与你对立的派别，你就会认为应该支持军队。但是如果军队的行动影响了你自己这一派夺权，你往往会反对军队。决定的作出是视情形而定的，在所有军队介入的地方几乎都是如此。在很多地方情况更复杂，军队里不同部队支持不同的造反派。我们不能用以前的方法作出简单的解释：“支持军队是因为某一派别的社会背景让其更希望保持社会现状，而反对军队是因为这一派别希望改变现状。”如果仔细观察地方政治的具体情况，我们就会知道这种解释根本说不通。激进的造反派在推翻地方党委后常常是在是否支持军队介入问题上发生分裂。

另一个例子是干部积极参加造反派，在这方面我们已有越来越多证据。当学生造反派到北京市政府部门“夺权”时，他们发现，那里的干部已经成立了互相对立的派别。他们必须决定支持哪一派。本来支持某一干部派别的学生造反派常会发现对立面的干部派别更值得支持。这种复杂的抉择过程导致北京红卫兵运动中产生了各类新的派别。原有的联盟

破裂，原本对立的派别重新结盟，全国皆然。通常的情况是，小城市和县城里夺权的其实是单位内部的干部造反派，学生和工人造反派并没有多大的参与。如果干部本身就分成了对立的派别，学生和工人造反派怎么能将这种冲突解释为是他们的职业或家庭利益所致，或者用对“社会现状”的态度来解释呢？

简言之，关键的问题是，我们能不能用这样的看法来解释，即人们以基于职业、与党政组织或家庭背景关联的某种固定的、静止的利益和身份认同来参与文革政治运动。我们认为应有另一种理解，即利益和身份认同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形势和一系列政治互动而变化的，这些互动随着时间的推移改变了参与者的动机和自我认知。在这些政治互动的展开过程中，如果各派别能够清晰地表现文革前就存在的不同利益群体，那么社会冲突论就有可能获得支持。但我的直觉是，这类情况极为罕见，假若存在，特定政治冲突的发展必须和文革前的身份认同差异相吻合。而我们的任务是解释派别认同如何以及为何演变，而不是争论它们是否或在何等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社会的潜在不公。

文浩： 安戈，1980年你与其他两位学者共同撰写了一篇重要的论文“学生与阶级之战：广东红卫兵冲突的社会根源”【“Students and Class Warfare: The Social Roots of the Red Guard Conflict in Guangzhou (Canton).” *The China Quarterly*, no. 83 (1980)】。在这篇文章中，你们以广东为例，建立了解释红卫兵派系冲突的社会冲突论，并且使用了当年在香港的红卫兵的采访资料。你怎么回应魏昂德和其他学者所提出的质疑？

安戈： 1970年代和1980年代早期，我们一些博士生和年轻学者对1966-1968文革动乱中基层所发生的事情做了大量的研究，但到后来，我们所有人几乎都转向研究其他问题了。魏昂德是一个例外。他继续研究1966-1968年文革基层冲突，做了很多十分必要的深入研究工作，他的努力值得赞赏。他和他的几位博士生揭示了那时所发生事件的一些重要的新方面，并分析其原因。

当然，他的工作与我们三、四十年前所做的研究在根本上有所不同。那时，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文献资料，包括很多红卫兵和工人派系的小报，但是我们发现这些小报有意隐藏

个人利益和恩怨，不提人们为何在学校和单位分为对立派别、与自己的同学和同事大打出手。那个时候人们认为不应该考虑个人利益，所以基层小报的编辑假装他们都是毛泽东忠诚的追随者，不牵涉到任何个人利益。正因如此，在1970和1980年代，我们这些年轻的学者（包括魏昂德）主要依靠采访当时派系冲突的参与者，听他们亲口叙说他们及其战友当时的态度、恩怨和动机。这样的采访对我们很有启示，让我们不仅了解为什么在学校和工作单位一派攻击另一派，而且还了解到文革前人与人之间隐藏的紧张和对立关系。

与此相反的是，现在魏昂德和他的合作者几乎完全依靠文献材料，因为经过这么多年，当年参与者的记忆已经不再清晰。我认为，文献材料能对何以导致基层单位和学校最初的冲突提供一种不同的视角，尽管这种视角也未必全面。

你刚才提到我和陈佩华（Anita Chan）、骆思典（Stanley Rosen）在《中国季刊》1980年第83期上发表的关于广州中学红卫兵派系斗争的文章。在70年代中期，我们不仅能采访到很多当年的参与者，还能从他们那儿收集到关于他们中学50个班级所有同学的大量资料，一共大约有2200学生。这些资料令人惊讶：所有加入红卫兵的学生中，81%红色家庭出身的参加了所谓的“保守派红卫兵”，与此形成对照的是，74%一般家庭成份的学生加入了造反派。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广州。我们还收集了其他城市的情况，结果与广州非常相似。

如我们在文章中所说，根据大量的访谈我们了解到，在文革前的数年里，高中生进大学越来越困难，如果进不了大学，前景将很不乐观。60年代中期，政府的大学录取标准更多关注学生的家庭出身，而不是学业成绩，而共青团招募则会优先招收红色家庭出身的学生（父母解放前是工人、贫农和共产党的干部）。一般家庭出身的学生（父母解放前是小贩、白领人士、专业人员、知识分子等等）对此很焦虑，对自己今后的就业前景，以及表现其坚定政治忠诚的机会越来越没有信心。

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时，红色家庭出身的中学生利用反对“资产阶级权威”和“白专”道路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将非红色家庭的学生排除在外。1966年秋季和冬季，

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矛头转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学里一般家庭出身的学生才有机会成立自己的红卫兵组织，将斗争方向从“资产阶级权威”转向犯了错误的地方党政领导。这可能不完全是出于偶然的——这些领导中很多是红色家庭同学的父母。全国各地中学里都发生了两派红卫兵的武斗，特别是在那些高考竞争非常激烈的重点中学里。

我们收集的50个班级的情况表明，干部子弟绝大部分加入了保守派红卫兵。而绝大多数家长教育水准较高的一般家庭出身的学生则参加了造反派。解放前父母是工人的学生平均分布于两派红卫兵组织，36%加入造反派，41%参加保守派或保皇派。一个原因是，他们主要在排名靠后的高中上学，那里很少有学生想挤进大学。在这些以工人子弟为主的中学里，红卫兵派别的主要分为两派：一边是班干部及共青团员，他们在其他同学面前代表权威；另一边是其他没有太高志向的非积极分子学生，他们大部分加入造反派红卫兵。但这里要注意的是，工人家庭出身的学生所建立的红卫兵组织常常排斥出身不好的学生。大部分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避免参与任何文化革命活动，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出身不好，很容易遇到麻烦。

在重点中学里造成学生加入不同派别的“阶级”问题在大多数大学或工作单位则不是最重要的问题。大学生已经成为教育竞争的“获胜者”。他们无需为家庭出身和大学入学等问题担忧，而这些问题困扰着有上进心的中学生。在北京之外的高校和大多数我所了解的单位，派别划分主要在政治活动积极分子和表现一般的非积极分子之间，即前者对文革前的社会现状感到满意，后者则心怀不满。简言之，这是全国最常见的情况。红卫兵组织以政治上的积极分子和非积极分子划分，这与普通中学里的划分相差无几。

多年前，魏昂德对工厂情况的看法也是如此。他根据工人组织小报和70年代在香港进行的采访发表了一篇论文（收于裴宜理 Elizabeth Perry 主编的《回归阶级：东亚的工人身份认同》（*Putting Class in Its Place: Worker Identities in East Asia*, 加州大学出版社, 1996）。魏昂德强调，“文化大革命期间工厂里的冲突主要是由党组织网络在

工人中制造差别所造成的，虽然这不是唯一的原因。”他观察到，保守派是那些文革前受到工厂党组织信任的工人组成的。文革中与他们发生冲突的是以前觉得不受青睐的非积极分子。

简单说来，我们是在今日的魏昂德和过去的魏昂德之间进行辩论。我觉得魏昂德年轻时的观点更有道理。70年代后期我对工厂工人做了一些采访，我当时的发现与魏昂德80年代及90年代所发表的看法很一致。安舟对毛泽东时代的工厂做过大量研究，对这个问题他更有发言权。

最后要强调一点：由于重点中学中一般家庭出身的学生和红色精英背景的学生之间有着很强的敌意，他们在文化大革命的动荡起伏中一直明确分成了造反派和保守派两大阵营。至于其他一些派别的形成，如大学生、工人或职员因观点类似而形成的一些团体，主要是为了在文革斗争中保护自身利益。这些小团体有时加入保护他们的大派，但当这些大派系不再为他们的利益和地位提供保护伞，他们又从中分裂出来。这就是魏昂德刚才所谈到的情况。不过重要的是，无论在更高权力机构里各派系为了自身生存做了什么，就基层单位和学校而言，小派系的成员在动荡岁月中一般比较稳定，因为在基层单位，同事或同学之间每天抬头不见低头见，小团体成员利益、恩怨相似，所以很少有人投靠其他派别。随着时间的推移，参加派系变得危险起来，人们或是因恐惧和疲惫而退出，待在家里，或是与他们熟悉的人一起继续参与基层的派系组织。

文浩：安舟，在你有关清华大学的专著《红色工程师的崛起：文化大革命和中国新阶级的起源》（*Rise of the Red Engineers: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Origins of China's New Class*，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9；中译本2017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中，你主要用政治资本和文化资本之间的斗争来解释红卫兵派性。魏昂德也就北京的重点高校发表过论文，你怎么回应他提出的质疑？

安舟：我在很多方面同意魏昂德对文革中基层派系冲突所做的新颖解释，但是今天我要集中谈谈我们看法不一致的地方。我要讨论两个重要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涉及学生派系

根据社会背景划分的传统观点。安戈及其同事在分析广州的重点中学时力推这个观点，他们在研究中发现，干部子弟与知识分子子弟形成了对抗。而魏昂德则认为，学生已有的社会地位和身份在分派时不起重要作用。第二个问题范围更广，因为它涉及到文革研究中一种经典观点，即在挑战党组织的“造反派”与捍卫党组织的“保守派”之间存在明晰的政治分野【译者注：见李鸿永 Hung Yung Lee, 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政治 *The Politics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 Case Study*, 加州大学出版社, 1978】。魏昂德的观点则与此恰恰相反，他认为学生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立场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是作秀而已，实际上发生的只是高层和基层的权力斗争，学生主要是争取胜利和避免失败。

文化大革命当然涉及到权力斗争。所有政治冲突都是这样。但是，很少有哪场政治冲突，参与者的动机仅仅是算计输赢的代价和获利，文化大革命并非例外。各派学生都被狂热的信念所激励，这些信念常常与他们的社会身份和家庭背景相连。如果我们不能认识到这些学生在相当程度上是受到意识形态理念的驱动，那么我们对那个时代就无法有正确的理解。

我来简单介绍一下我在清华大学和清华大学附中所了解到的情况。这两个都是一流学校。两个学校的派系都是因为完全不同的政治观点而分的，但是每个学校的派别划分又很不一样。我认为这个不同主要是因为大中学生的社会构成不一样。

清华附中的学生构成和安戈了解的广州重点中学相似，派系划分情况也差不多。几乎所有的学生都来自社会精英家庭，多数是知识分子的孩子，少数是革命干部子弟。在文化大革命中，学校自始至终都是完全按家庭出身来划分派别。这是一场政治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博弈。这与安戈所介绍的情况相似，我就不在此详谈了。我只想提一下，魏昂德关于北京学生派系的书中，有一章是关于由干部子弟组织的早期中学红卫兵派系，写得非常精彩，但他却没有写到后来重点中学的知识分子子弟组织的造反组织。如果他的书中也有一章讨论这些组织的话，那么社会冲突论的解释就更容易站住脚。

清华大学学生的组成则与附中不同，干部子弟很少（大部分干部子弟还没到上大学的

年龄），大部分学生都是知识分子的孩子，农民子弟的数目也在增加。清华大学里第一个红卫兵组织与中学的一样，强调出身要好。这是一小伙干部子弟组织和领导的，但其主要成员是农民子弟。他们与上级派来的工作组合作，抨击学校领导过于照顾教育程度较高的旧精英，以及把学业置于政治之上。他们尤其攻击家庭出身不好和有个人历史问题的学校领导和教授。用我书里的便捷方式来说，就是他们集中攻击“文化资本”。

后来，在1966年秋天组成的造反派红卫兵反对排斥不同家庭出身的学生，把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子弟都收了进来。主要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清华大学井冈山”受到毛泽东亲信人物的支持，它的成员积极响应毛提出的打倒“党内走资派”的号召。到了这一年冬天，早先成立的、由红二代子弟领导的老红卫兵组织，由于毛派领导人的强力声讨，都很快垮台了，它们的成员则纷纷转而组织较为松散的“井冈山”。到了第二年春天，清华“井冈山”又分裂为激进派和温和派。

激进派仍称为井冈山兵团或“团派”，他们否定十七年“旧清华”的一切，反对清华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批判学校领导干部是顽固的官僚。温和派则称为“井冈山四一四”或“四派”【译注：这一派于1967年4月14日成立】。他们为旧清华辩护，他们认为大学党的领导组织基本上是好的，虽然犯过一些错误，但是执行的政策基本正确。在我看来，激进派完全追随毛泽东的文革目标，即既反对政治资本又同时挑战文化资本，而温和派则捍卫两者。

这两派的学生有着类似的社会背景，都是知识分子和农民的子弟。其主要区别在于与党组织关系的远近。温和派与党团组织关系更密切，并且得到学校干部的有力支持。激进派与党团组织的关系没那么近，几乎很少得到学校干部的支持。当然选择加入哪个组织还有很多个人的原因。学生受意识形态的影响都很大，他们得考虑怎么解释毛泽东的理念，如何最好地捍卫社会主义。当然他们也受个人恩怨和私人情谊的驱使。

总的来说，我觉得用社会背景来解释学生派系划分对清华附中很有用，因为干部子弟和知识分子子弟基本上按家庭出身站队。但是根据我所看到的关于其他学校的材料，我觉

得可以说，这种划分仅仅适用于重点中学，因为那里学生群体几乎只限于干部子弟和知识分子子弟。而清华大学的情况则很不一样，干部子弟很少，但有很多知识分子和农民家庭出身的学生。派系划分不是简单根据家庭出身，而是根据政治联盟——与党团组织关系密切的学生与关系不密切的学生形成派系对立。我认为这种派系划分更为常见，不仅在高校中，在普通中学中也是这样。后面我还要说到，在工作单位亦是如此。

在如下问题上我完全同意魏昂德的看法，即到了1967年春季，北京全城分为两大派的大学生之间没有明确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分歧。在毛泽东支持造反派夺权之后，大学的造反派分裂成了对立的派别，“天派”和“地派”，彼此争权夺力，但在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观点上我们很难对他们加以明确区分。但我觉得其他地方并不都是这样，即使北京的中学生群体也不都是如此。北京的中学生最终形成了两大全城范围的派别联盟，“四三派”和“四四派”，这与清华大学出现的激进派和温和派很类似。

文浩：一庆，读了魏昂德的《分裂的造反》和马若德（MacFarquhar）与沈迈克（Schoenhals）合著的《毛泽东最后的革命》（*Mao's Last Revolution*，哈佛大学出版社，2006），我有一个感觉，即他们都在有意无意压低意识形态的作用。你就文革中有关阶级问题的争论写过一本专著《边缘的文化大革命：中国社会主义的危机》（*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he Margins: Chinese Socialism in Crisis*，哈佛大学出版社，2014），这些争论与派别分化有什么关系？湖南的造反派联盟“省无联”【译注：“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的简称】是不是可以作为一个例子用来证明社会冲突论的基本观点，比如出身不好的人倾向于支持造反派？

吴一庆：我想首先澄清一点，说马若德或魏昂德完全忽视了意识形态的作用是不完全公平的，至少我们应该说他们并不从基本原则层面上拒斥意识形态的作用。比如，马若德在他的经典三部曲《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的首卷（*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74）的开头就明确无误地指出，“中国领导层的分裂是对中国革命的目的、如何统治中国以及中国走什么发展道路等问题上的分歧引起的”，他同时强调，

文化大革命的根源“既基于原则性问题亦有个人矛盾问题”。魏昂德在二十多年前发表的一篇关于文革中群体政治的文章中，曾尖锐批评社会学家长期忽视表达特定意识形态的大规模政治运动。魏昂德批评政治社会学家“不去探究信念和意识形态何以产生和改变、以及如何影响人们的政治行为”，他指出，这些学者的论著“与我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理解毫无关系”【“Collective Behavior Revisited: Ideology and Politics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Rationality and Society* 6, no. 3 (1994)】。

现在回到你的问题。我也同样认为文革研究学者没有对意识形态现象给予足够的关注。我在《边缘的文化大革命》一书中讨论了意识形态、社会不满与诉求以及大规模群众运动之间的复杂关系，作为十几个湖南造反派组织的联盟的省无联是一个很好的例子。1967年下半年和1968年初，中央致力于解散群众组织、重建政治秩序，省无联无视甚至挑战这一重大方针，对抗湖南省革命委员会这一得到中央支持的、新成立的地方权力机构。这个时间节点非常重要，它表明，第一，文革运动中开始形成重大的政治分化，也就是说，出现了偏离毛主义官方导向的自称为所谓“极左派”的群众组织；其二，一些造反青年试图以自己独有的方式重新解释毛主义意识形态，并且让其变得更加激进。

文革学者常常用社会冲突论来解释与省无联有关的红卫兵派系争斗和异端政治理念。根据这一流行的观点，导致省无联崛起的红卫兵派系活动，其根源可以追溯到中国社会主义体制中根深蒂固的社会与政治矛盾。湖南的红卫兵派系争斗导致了“省无联”的产生，按安戈的说法，这代表了“出身好的红卫兵组织”与“苦头派”（the have-not groups）【译注：“甜头派”和“苦头派”是前广东造反派人士刘国凯用来描述保守派和造反派的词汇，参见刘国凯，《文化革命简析》】之间的冲突，前者是红色阶层，后一类则来自于弱势工人群体（比如临时工与合同工）以及家庭出身不好、受歧视的学生。用安戈自己的话说，“省无联是许多组织的混合体，它们的共同点在于，它们的成员在文革前或文革中都受到过国家机器和党组织的迫害或歧视”。

这个存在已久的观点具有很强的事实基础，但其背后的假定近年来受到学者的批评。

魏昂德及其合作者的大量论著强调政治事件的偶然性 (contingency) 以及路径依赖 (path-dependency) 特征, 这对曾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学解释是很大的挑战。我在这里必须坦率地承认, 我个人对于文革群众运动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于社会冲突论的观点, 这个领域的先驱学者安戈、陈佩华、骆思典, 李鸿永 (Hong Yung Lee) 以及青年魏昂德本人的研究都曾对我有过重大影响。但是, 我同时也感到 (这好像有那么一点奇怪), 成年魏昂德对这一经典学说的强力批判对我也非常富有吸引力。魏昂德本人的早期研究是社会冲突论的奠基性作品之一, 今日的成年魏昂德实际上是在质疑和否定他自己以前的说法, 这种学术勇气和诚实大大推进了学问的发展, 非常值得赞赏。我觉得魏昂德对手社会冲突论的核心观点 (社会关系决定政治冲突) 坚持不懈的挑战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但是在我看来他似乎走的太远了。我倾向于认为青年魏昂德以前和成年魏昂德今日的说法都有道理, 这两种貌似截然不同的看法应该有可能彼此相容, 社会因素对我们理解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可能仍然很重要, 我们应该致力于重新引入这些因素, 用来补充、强化、和继续拓展魏昂德的批评。但我同时要强调, 这绝不是通过机械叠加的简单办法可以完成的。

在这方面, 湖南的省无联可以做一个很好的例子, 用来帮助我们更为全面、动态地理解社会关系和政治过程之间的复杂关系。在这个案例中, 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非常复杂的交织在一起。事实上, 湖南文革中群众运动的派系分化、社会诉求的表达、和另类政治思潮的出现有着相对独立的起因和发展轨道, 只是在特殊的情况下, 它们才汇合在一起。派系政治和意识形态争斗是如何起源的? 正如哈佛大学学者西达·斯考切波 (Theda Skocpol) 在她关于革命的历史社会学的经典论著中所说, 这是由于“原本相互分离的进程同时展开, 相互交织、互动” (如果借用另一个流行的学术用语, 这也正是法国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 Louise Althusser 著名的“多元决定” overdetermination 概念的意思)。正如我在书中所详细讨论的, 湖南红卫兵运动的派性冲突源于一系列不同的政治进程, 这些进程主要由派别组织间的竞争、个人争权夺利以及其它有相当偶然性的地方性事件所驱动。在湖南, 文革前的社会矛盾的爆发及政治经济诉求的表达与文革运动派系政治的发展

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没有直接或必然的关系。文革前的社会矛盾和政治经济诉求融入于日益恶化的派系争斗中，这发生在地方和全国政治冲突的某个特定当口，即文革运动从无序的大民主转向恢复秩序——这个过程里党政权威、军队介入，对立的各派系组织开启新一轮的争斗以在新秩序中获得一席之地。正是在这种情形下，通过吸纳对社会现状不满的势力，重组后的派系力量获得了新的社会特性，在此过程产生的团体身份认同也与由社会经济诉求驱动的政治目标发生了新的关联。

要对红卫兵政治运动作出令人满意的学理解释，诚如魏昂德所言，我们不能仅仅简单地罗列所涉及的组织的社会背景和利益恩怨。更重要的是，我以为，我们必须仔细考量整个政治进程的复杂动力特征。在这个进程中，不同社会身份和地位的人参与，使得原有的利益恩怨的性质发生改变，与此同时，派系斗争的方式和路径也可能会发生相应变化。简言之，湖南的省无联案例提供了很有价值的素材，有助于我们构建一种有关文革群众派系政治的更为复杂、更强有力的解释框架，这一框架不仅强调偶发性和互动，同时亦从动态角度考虑社会利益、身份认同和结构关系的影响。

省无联事件同时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文革群众运动中意识形态的作用。安舟在评述魏昂德《分裂的造反》一书时，对作者忽视意识形态的作用提出批评：“魏昂德故事里的个体大都没有意识形态和政治关注，他们考虑的只是斗争的输赢。为了揭示参与者暗地里的利益盘算，魏昂德完全无视文革群众运动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内涵。”虽然我对安舟的说法享有同感，但我觉得若要充分理解意识形态的重要性，我们不能仅仅简单的将意识形态放回历史方程式里，将它们与政治利益驱动的行为相提并论。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要构建一种更有解释力度的理解方式，可以让我们看到意识形态是如何赋予政治和经济利益意义的。在省无联事件中，新兴的异端政治思想赋予地方性派系冲突及社会经济诉求以新的意义。诸如“红色资产阶级”和“中华人民公社”等“极左派”话语概念在各种不同的具体社会政治诉求之间建立起符号意义的联系，通过话语上的关联，具体诉求和利益的涵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湖南，一些省无联成员尝试创造性的重新阐释晚期毛主义，拓展

其意义空间；通过这种努力，一些貌似毫不相干的不同社会诉求和政治斗争被提升到新的高度，其具体经验内容被抽去，而被转化成新的、更广泛的斗争的象征意义载体。日愈分裂、难以驾驭的群众运动，广泛存在的社会不满及诉求，一旦和偏离官方意识形态轨道的异端政治理念汇合起来，便可能造成巨大的政治危险。对于这一切，毛泽东和他身边的北京高层领导看的非常清楚。于是，湖南的省无联和全国各地的类似组织很快被镇压，避免了一场可能具有爆炸性的政治风险。

第二部分

文浩：魏昂德，你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一场脱轨的革命》（*China under Mao: A Revolution Derailed*, 哈佛大学出版社，2015）一书中根据大量县志材料揭示，大部分死亡发生在受军队支持的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后。我曾采访过一位当年的造反派人士，他称这个时期为“绿色恐怖”。军队在派性斗争中起了什么作用，比如说在江苏？很多以前的造反派都认为军队代表的是保守力量。

魏昂德：军队在1967年派性武斗中的作用十分复杂。派系冲突和武斗的加剧实际上始于1967年1月军队“支左”之后。一开始，军队极力压制号称夺取了权力、但并没有得到中央认可的造反派组织。反抗他们的组织于是不可避免地成为军队的对立面，但也有一些造反派组织支持军队压制他们的对手，这样军队就被扯入了地方造反派的派系冲突之中。江苏的情况就是这样，当地的驻军本身也是分裂的，不同军官或指挥部门支持当地彼此对立的派别。这似乎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其他学者在浙江（福斯特 Keith Forster）和陕西（谷川真一 Shinichi Tanigawa）有类似的研究发现。我们试图解释为什么军事人员会在政治效忠上产生分歧，当然这个工作还只是刚刚起步。

当省一级革命委员会得到中央批准之后，派性争斗很快就结束了。上海从一开始就是这样。1967年1月张春桥领导的著名的上海夺权得到北京认可之后，他立刻就调动军队镇压学生造反派和挑战他夺权的一部分工人造反派（毕竟他曾经是上海市委的重要成员之一，

因而也得到了一部分同僚的支持)。这使上海避免了其他地区那种严重的派系斗争,也没有经历别的地方发生的大规模街头武斗,上海的部队也没有发生分裂。

1968年下半年,其他地区相继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一些部队人员被清洗以保证军队内部的团结,军队果断地结束了地方上的派性冲突。公开的及未公开的资料表明,在这一阶段因各类政治原因被判罪、监禁和杀害的人数要远远超过被红卫兵迫害或杀害的人数,甚至也大大超过大规模派性武斗导致的死亡人数。解放军在最后成为保守势力,但是在1967年1月他们开始介入文革运动到1968年中最终解决群众运动之间的大约18个月里,军队的介入反而大大加剧和延长了造反派组织之间的敌意和冲突。

文浩: 安戈,文革的各个不同的阶段有什么不同?我觉得在所谓的“人民文革”阶段(1966年下半年至1967年初)曾就包容抑或排斥异己阶级成分问题发生过激烈的辩论,但是在1967年下半年和1968年,立场相近的造反派组织却互相攻击。在保守派被击溃之后,派别的社会背景发挥什么作用?

安戈: 为了更好地回答这个问题,我要把城市基层文革运动分成三个阶段。1966年后期是第一阶段,是造反运动兴起的阶段。1967年初到1968年春夏是第二阶段,文革运动的主要特征是普遍的派性分裂与冲突。从1968年夏季开始文革运动进入第三阶段,主要是压制造反派以及全面恢复党政秩序。

在文革运动的初期或第一阶段,在同一单位和学校、具有相似社会地位、利益和恩怨的人在朋友和同事之间组成了自己的造反小群体。他们有时因家庭出身走到一起,比如在中学。有时候,政治积极分子和对现状不满的非积极分子组成了不同的团体。还有些人因为对工资和工作地位的不满而组成自己的团体,比如在学徒工、临时工和工资待遇很低的街道小厂工人中有这样的情况。

当像我这样的年青西方学者在70年代和80年代进行研究时,我们对文革运动的第一阶段最感兴趣,因为这个阶段暴露了毛泽东时代中国社会的很多紧张关系、挫败感和敌意,这些大多是被掩盖的,外人可能都看不到。在后来阶段的冲突中,地方性的偶然因素导致

造反组织重新组合、分裂、又合并，我们对这些问题的兴趣要小得多。对我们来说，后来的情况很混乱，给我们提供的新的研究视角很少。

总之，在第二阶段，一旦小团体形成、并开始在自己单位内部与对立派别发生冲突，他们意识到，为了不被打垮或者为了夺权，他们需要联合起来，所以他们在单位之外寻找联盟。这就形成了包括很多小组织的大规模保护性组织。在第二阶段，小团体常常与其他具有相似政治地位和恩怨的团体结盟。如前所说，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各地中学里。但是在其他情况下，一些“奇怪的组合”也常会出现。比如，70年代后期，我分别采访了两个来自于云南省会昆明的大学生。他们在两所大学读书，彼此距离很近。他们都说到，非积极分子组成了自己的团体，其对立面是学生积极分子。在其中一所大学里，非积极分子组成的学生组织攻击大学党委领导，因为他们曾受到歧视。另一所大学则是完全相反：政治上积极的学生造大学领导的反，声称后者的世界观不够“红”。短短几个月内，攻击大学领导的两派学生组织结成联盟，尽管第一个大学里的组织是由不喜积极分子的学生组成的，但他们却与隔壁大学里的积极分子组成了同盟。而两所大学里原先捍卫大学领导的学生则组成了另一个同盟，以对付他们各自学校内部的对手。这种混乱的联盟，即不同学校里积极分子和非积极分子并肩作战的情况并不罕见。

在这一阶段中，单位内部的一些小派别为了自身生存，也出现了一些奇怪的组合。1967年1月，毛泽东和他的紧密追随者号召反对抵制造反派夺权的保皇派（也称保守派）。这些组织大多垮了，其成员集体加入造反派组织，但这些人的表现最为接近那些对社会现状并无不满的组织。在“二月逆流”事件（1967）中，军队和其他维持秩序的力量镇压了不听话的造反派组织，一些认为可以从中获益的造反派组织表示支持，这造成了造反派联盟的分裂。当毛泽东三月份对“二月逆流”表示谴责、并鼓励那些更具有反抗性的造反派时，基层两大阵营的冲突又再次爆发。文革运动的冲突最终在1968年下半年结束，在此之前，很多地区都发生了不止一轮这样的分裂，那些比较受地方领导器重的造反派（他们更易进入新的领导班子并受到重用）与那些反抗精神更强的造反派分道扬镳、互相争斗。

这就是现在魏昂德谈的比较多的时期：第二阶段和造反派的分裂。他认为, 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发展和派系分裂与我们对第一阶段的发现相矛盾, 否证了我们的观点, 因为我们曾提出, 在各单位和学校, 不同派别团体的形成是基于共同的恩怨和利益基础。虽然魏昂德在文化大革命的其他问题上做过很有价值的研究, 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他的说法完全不能令人信服。

文浩: 安舟, 你对文革中工人情况的最新研究是不是改变了你关于派性问题的观点? 工厂工人为什么分成不同派别?

安舟: 工厂的派系划分与学校的情况差不多, 但也有一些重大的不同。工厂中红卫兵组织最早出现于1966年8月, 是由工厂政治部门发起组织的, 要么是厂党委要么是上级部门派来的四清工作队。与学生红卫兵一样, 早期的工厂红卫兵攻击某些个人(比如技术骨干、家庭出身不好或有历史问题的领导), 但捍卫党组织的领导。如在学校一样, 造反派是在66年秋末才出现的。造反派是自发组织的, 他们攻击工厂中党的领导, 挑战党组织的权威是他们联合到一起的主要基础。

工人并没有按家庭出身划分派别, 两派的参与者大都是农民或工人家庭出身。家庭出身不好的基本上不参加运动。如在清华大学一样, 两派主要的分野是与党组织是否接近。保守派源自早期红卫兵组织, 其领导和成员主要是中基层干部、党员和积极分子。造反派则相反, 主要是由与党组织距离较远的工人组成。个人性格、理念、恩怨、历史以及朋友关系在派系形成中也都有相当作用。

1966年秋季, 全国的工厂似乎都是如上面的基本描述划分派别。一个很明确的政治分野即造反派与保守派。1967年1月毛泽东号召造反派夺权后事情变得更加复杂。首先, 很多保守派组织由于充当地方党组织的走卒而声名狼藉, 从而被解散。其次, 作为很多小战斗队松散联盟的造反派也分裂了。他们此前从未想到过夺权, 只是对工厂领导的高压政策有意见。这会儿问题来了, 他们当中谁来担任新的工厂领导? 而且, 没有原有工厂领导和派来组建革命委员会的军代表的支持, 他们是无法让工厂重新运转的。这些问题又导致造

反派内部新一轮的争斗。

在很多城市，我们很难用意识形态或政治地位的视角来区别相互对立的联盟。南京就是这样，魏昂德和董国强就此做了大量的研究，其他地方毫无疑问也是这样。但是我研究的河南和湖北却不是这样。在这两个省，保守派都得到了部队的支持，他们1967年春重新组合，军方压制的造反派内部也进行了重组。在湖北，2月份发生分裂的造反派再次联合起来，去对抗称为“百万雄师”的重新抬头的保守派力量。河南造反派和保守派之争也是这样。我采访的两派工人都乐于把对立双方看做造反派或保守派，并且乐于被冠以这个头衔。

南京的局势很不明朗，但这种情形并不少见。我觉得在很多城市，最基本的政治分界出现在1966年秋季，即分成造反派和保守派，这个分界在文革群众运动阶段一直十分明显，并在整个文革时期及之后继续将工厂分裂为两个派别。

文浩：一庆，你在书中描述了“省无联”积极分子提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民众与官僚阶级之间的矛盾，并对此观点表达了有限的同情式理解。他们要求打破传统社会主义的党国机制，代之以激进的公社式平等政治组织。在1967或1968年时这样的意愿是否现实？这是不是在呼吁进行一场暴力内战？

吴一庆：我在书中试图展示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偏离毛泽东及官方主导理念的社会政治潮流，湖南的省无联就是其中之一。这些潮流被冠之以“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极端民主”、“极左”、甚至“反革命”的罪名。对所谓“极左派”的清洗早在1967年下半年就已开始，这些潮流或派别无一例外地受到镇压，被消灭殆尽。当今中国很少有人对此有所了解，或者有所理解。在毛泽东时代终结之后的三十多年来，官僚滥用权力、公权私有化、和腐败大量出现，那些年轻造反派的激进反官僚观点在当代似乎比1968年时有更值得令人思考的意义。

人们常常延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语来理解文革的意义。毫无疑问，晚期毛主义和文化大革命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史中的另类。在毛看来，社会主义不像苏联模式所预设的那样，

仅仅通过经济和技术发展就能实现。社会主义社会仍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即颠覆革命和重新回到剥削社会）的强大势力。根据毛的观点，社会主义社会变质蜕化首先从执政党内部开始，一小撮领导人被资产阶级思想俘获，通过“篡夺”领导权着手系统改变国家权力的无产阶级特性，逐步创造出一个新生的剥削阶级。这就是毛泽东“资产阶级复辟”理论的大要，亦是其文革理论的基础。

在文革中，各级官僚遭到无情冲击，当权者及各类社会异己分子被羞辱于大庭广众之下。尽管文革从表面上看表现出极大的活力，但是这场所谓的大革命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列宁式政党和传统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实质。从运动一开始，毛泽东就未能阐明“继续革命”的主要目标和性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等概念被严重曲解，成了包揽一切的词汇，用来表明政治忠诚、意识形态正确和道德纯洁；“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概念被极大庸俗化，其外延被扩张到几近荒谬的地步，成为无数无谓暴力的工具，从而丧失了其作为社会分析概念所应有的批判力。虽然晚期毛主义对社会主义社会蜕化的趋势有相当警惕，但远未能解决在社会主义社会出现新兴统治阶级的问题。文化大革命试图在“灵魂深处闹革命”，反对资产阶级自私自利思想、告诫干部要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自己服务，这或许有助于在短时间内延缓官僚阶级的发育形成。但是，文化大革命针对的是所谓资产阶级思想、官僚主义作风、以及分配制度上的不平等特权，涉及的主要是官僚个人及其思想意识以及旧精英的残余，而不是针对传统社会主义体制下官僚统治的制度性根源。

正如我在书中所讨论的，湖南的一些激进造反派试图进一步拓宽毛泽东“继续革命”理念的意义阐释空间，他们认为新生官僚阶级和劳动大众之间的对抗是文化大革命中最主要的矛盾。他们打着毛泽东的旗号，质疑甚至大胆挑战“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内在矛盾和固有极限，指出文革运动只局限于打击作为个人的当权者以及旧精英残留，而不从根本上探寻中国社会和政治问题的结构性根源。在这些青年人看来，“继续革命”的主要冲突不在无产阶级和已被推翻的旧精英之间，也不是在毛的追随者和所谓敌对者之间。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不是要揪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应是一场“广大人民

群众”推翻“红色资本家阶级”的大革命。他们引用历史上巴黎公社的先例，宣告只有推翻“新生官僚资产阶级”，才能建立一个真正平等民主的社会。他们的看法无独有偶，其他地方如上海、北京、武汉、广州等地都出现过类似的思潮。

毛泽东为何最终不愿打破苏式一党专制国家体制？对此我们应该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看待。显然，毛泽东在厌恶官僚特权和渴望扩大大众直接政治参与方面与很多基层造反派心心相通。但是，与那些不惜以破坏国民经济甚至发动内战作为代价来“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激进青年不同，毛泽东的看法和行动在相当程度上受到他对维持公共秩序和国家安全的责任的限制。如高乐（Richard Kraus）所说，毛泽东的双重性在于他既是他个人所代表的国家官僚机构的首脑，同时也是造反派的总头目。借用安舟的说法【私人通信】，毛与他那些难以驾驭的青年追随者之间的差别在于“当权的毛主义者和作为反对派的毛主义者”的差别。我换一种说法，毛泽东既是孙悟空又是老虎，同时代表反叛和威权、体制与反体制、释放造反力量与重建秩序，并常在两极间游移不定，这正是理解毛泽东在文革中复杂角色的关键所在。

激进造反青年是毛泽东不听话的孩子，他们很快被毛丢弃，被他们满腔热情投入的革命所吞噬。他们狂热地响应最高领袖的造反号召，真诚相信当革命的敌人被清除、伟大的变革实现之后，世界便会变得更为美好。但他们的政治观念尚很幼稚。这些年轻人大多是高中生或低年级大学生，知识面有限。他们的理论思考简单而不成熟，他们之所以成为真诚的社会主义者，更多是因为自身的成长经历和单纯善良的愿望，而非基于系统持久的理性思考。他们常常要对急速变化的运动形势作出快速的判断和反应，因而没有时间让理论观点系统化和成熟起来。他们充沛的反叛热情常常表现为蛮干；红卫兵派系间的暴力冲突几乎把国家带到了内战的边缘，但他们仍鲁莽地呼吁开展“武装斗争”。他们无法提出替代性的经济方案，也没有社会治理和发展的全面规划。他们要求平等，要求“重新分配权利和财产”【译注：北京四三派红卫兵1967年提出的口号】，但却没有考虑大众政治参与和社会治理的制度安排，只是提出了“中国人民公社”之类的崇高而又空洞含混的口号式

程式。最后重要的一点是，他们对官僚体制的严厉批评与他们自己将毛泽东敬奉为最高革命领袖的做法相矛盾。他们一方面试图阻碍毛泽东在文革群众运动失控后借助军队力量重建党政威权的努力，另一方面又号称要建立一个新型的“毛泽东主义”先锋政党。毫无疑问，这些激进造反派的立场支离破碎，甚至自相矛盾。但就总体而言，他们的政治观点尖锐地反映了晚期毛泽东思想的内在局限和张力，并将其推至自身逻辑的极限。在1968-1969年文革群众运动终结之后，他们的思想碎片通过七十年代的地下思想网络得以保留，在极为困难的政治条件下继续发展、延伸，为毛泽东晚年中国民间思想的发展提供了宝贵资源，亦为今日我们理解中国二十世纪后半叶的社会政治变迁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视角。■

【主持人在此向参与中文翻译、校对与润色修饰的诸位学友表示诚挚谢意】

【评论】

解读刘丽英《往事回首》兼谈造反派定义

杜钧福

……革命与反革命，是事物发展的两极，其起承转合，
往往有一个复杂、令人疲惫不堪（扼腕三叹）的过渡，
正是这一过渡，成全了它们，而结果却不是想要的任何一个。

——刘苏里《评〈西班牙内战〉》

《新京报》2016年12月24日

—

刘丽英原来是沈阳市公安局干部，文革中经历磨难，文革后出任“两案”办公室副主

任、中央纪委书记。她退休后写了一本回忆录《往事回首》（新华出版社，2009），叙述她这几十年来在公安局工作的经历，其中一大部分内容与文革有关。

这本书2009年问世后，我见到两篇有关评论文章。第一篇是陈益南先生的《文革中，刘丽英是被什么人迫害的？》（《记忆》，2010年10期）。文章主要意思是，在《往事回首》中，作者把迫害她的人一概称为“造反派”，而陈先生解释说，这些人根本不是造反派。相反，在她被非法拘禁时，企图解救她的人才是真正的造反派，就是辽宁大学的“八一”红卫兵。

陈先生论述得很有理。但是我想，把坏人坏事乱贴“造反派”这个标签的做法，未必归于作者刘丽英女士本人。这本书2009年出版的时候，刘女士已年届77岁。我不知道她的文字功底如何，但我知道，凡是出版这样的书，出版社都指定一位编辑帮助作者理顺文字。

我猜想，这位编辑没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他对文革的印象，就是“四人帮”和造反派在那儿捣乱，所以把干坏事的人都说成造反派没什么语病。抹黑造反派已成为修辞手段。

我的这种猜想并非毫无根据，因为类似事件看得太多了。2010年4月20日的《南方周末》摘要登载了季承的书《我的父亲季羨林》片断，擅自把里面“各级党组织整了群众的黑材料”中的“各级党组织”换成“造反派”，也不顾与上下文意思衔接否。

2013年，共识网登载姚桐斌遗孀彭洁清文章《“两弹元勋”姚桐斌文革被造反派用钢棍砸死》。这篇文章是从人民网上转载来的，在人民网上该文章题目并没有“造反派”字样，是共识网编辑加上去的。其实呢，姚桐斌本人倒可以算个造反派，是被保守派打死的。现在，编辑不经意的一改，造反派从受害者变成了施暴者。

2013年5月19日的《南方周末》还登载了诗人白桦《守望底线》一文，说“‘文革’开始，造反派从我宿舍里搜出一封家书，妻子仅仅在信中为我的处境说了两句委屈和焦虑的话。他们竟然对她实行残酷的武斗，……。”对此我也很怀疑，因为文革开始的时候还没有造反派。特别是这样的话，似乎不应该从白桦口中说出。这是因为，在文革中两派最

激烈斗争的1967年夏季的武汉，白桦曾经写作和发表了许多热情洋溢的诗作支持造反派，一时广为流传。所以他不太可能把一切坏事都往造反派头上归。

我所见的第二篇评论《往事回首》的文章是王海光先生近年发表的《砸烂公检法的一个典型样本分析》（共识网，2014）。其论述主要从文革中“砸烂公检法”这个问题出发。他概括这一概念的内涵和社会影响：“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公安系统却成为了被‘砸烂’的部门，从中央机关到基层单位，层层犁庭扫穴，各级领导干部被打成叛徒、特务、反革命、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大批干警遭受迫害，许多人被赶出公安队伍，多年积累起来的公安业务工作基础毁于一旦，成为‘文革’的一个重灾区。‘彻底砸烂公检法’，搞乱了社会治安秩序，使国家本来就极不健全的法制毁坏殆尽，所鼓吹的‘群众专政’的‘乱法’，更是法制建设的倒退，是造成冤假错案遍地的一个重要原因。”

涉及文革期间公安部门的事有两个方面：“砸烂公检法”和公安系统内部的文革运动。王海光先生的文章在这两方面都论述到了。他认为，刘丽英的这本回忆录“提供了基层单位‘文革’运动的一个比较完整的样本。”但是和其他公安部门的文革相比，“沈阳公安局内部的造反派出现得早”，几乎与一些文教单位同步。

这是一个公安部门内部文革运动与社会上文革运动进程比较的问题，有共同性也有区别。这区别主要来自公安部门组成和职能的特殊性，王海光先生也对此作了说明。

公安部门本身就是专政机关。在文革初期，它作为一个整体，与造反或串联的学生几成对立面。而学生娃娃那些造反因素，在公安部门内部几乎都不存在。

学生为什么造反呢？文革初期，各学校或其领导部门一般先抛出几个替罪羊供大家批判，一般是知识分子出身的领导干部。然后呢，工作组进驻，在短时期内干了三件事。一是揭发批判学校领导，二是批判斗争“反动学术权威”，三是在全体师生员工中进行摸底排队，准备或开始整群众。在进行第一项的时候，不少学生跟着跑。在进行第二项的时候，学生们有些疑惑：不是主要整党内当权派吗？在进行第三项的时候，少数学生早就起来造反了。这都是后来几年里持续斗争的前奏。

但是这些因素，在公安机关内部都不存在。这里几乎没有什么知识分子，干警们都是党团员，政治上可靠，不应该再排队。那么，这里为什么也分两派呢？

就沈阳市而言，它的公安局的特殊之处在于，它在文革前就已经被“掺沙子”了。刘丽英的书说，1964年，公安部长谢富治到沈阳公安局指挥“四清”，说公安队伍严重不纯，要换血，并于1965年9月从部队调了6名团级干部来沈阳市公安局任职，改变公安局的领导层。其中有一位当了公安局政治部副主任，来局后就纠集一批对领导不满的人，形成一股势力，后来在文革中兴风作浪。1966年5月，他担任公安局文革办主任，后来刘丽英称之为“前文革主任”，称这股势力“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首先起来的一伙造反派。”

所以，沈阳公安局文革的特殊之处，也就是王海光先生所说“沈阳公安局内部的造反派出现得早”的原因，就是这个“掺沙子”问题。刘丽英没有介绍这位“前文革主任”所拼凑班底的组成，包括多少“沙子”在内，但至少，这位在文革前调来的领导干部和原来的人员之间的矛盾是贯穿沈阳市公安局文革中主要冲突的重要原因。

除去公安系统文革的特点以外，它当然还符合社会上文革的一般规律。就社会上文革的进程角度来研究公安系统的文革，即用社会上造反/保守之间的冲突来解释，有一个什么是造反派的问题。

《往事回首》称整她的“前文革主任”一伙为造反派。对于解救她的辽宁大学“八三一”仅称之为“红卫兵”。在王海光先生的文章中，并未忌讳“八三一”这一名称，但也没说它是造反派。陈益南先生说“八三一”就是造反派。事实上，“八三一”就是典型的造反派。熟悉辽宁文革历史的人都知道这一点。

《往事回首》没说“八三一”是造反派，如果“八三一”是造反派，“前文革主任”一伙也是造反派，怎么能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己人不认得自己人呢？为了避免读者这一困惑，这书，具体说是责任编辑，就不把“八三一”说成造反派。

他们避免这样说有其原因：这事情确实要费很多口舌才能说得清楚，主要是造反派的定义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有不同的主张。在当下的大众媒体上，造反派已经成为文革中坏

人的代名词，如同以前的地富反坏右一样。王年一先生则将文革中不同群众组织都称作造反派，只有激进和不那么激进之分，也是一种说法。我的意见是，在定义这个名词时要考虑两点：一是尽量和它在社会上流行时的本意靠近，二是要尽量符合它的字面意义。

二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必须把文革的进程，主要是文革初期，即1966年的进程梳理一遍。在这一时期，文革的内涵以造反为主，掀起了三波造反浪潮。第一波在6月，第二波在8月，第三波在10月以后。

6月的第一波又有前期后期之分。前期主要发生在6月上旬，后期在6月20日左右达到高潮。他们的内涵有所不同。

以本文上面所述的学校情况为例。第一波前期一般发生在工作组进驻之前或刚进驻的时候。这一时期的造反有什么特点呢？

首先，造反主体，有许多干部子女领头，例子不胜枚举。在北京师大女附中，干部子女马德秀、宋彬彬、刘进于6月2日联名贴出该校第一张大字报炮轰校领导。清华大学的刘涛、贺鹏飞在6月5日贴出《清华党委应采取积极态度领导文化大革命》，震惊了全校。

在北京航空学院，“那个时候造反最起劲的一帮人，都是高干子弟，李井泉的儿子李明清，赖际发的儿子赖锐锐，地质部长孙大光的女儿孙清林，铁道部长的儿子苏小泉，他们几个为首的炮轰党委特积极，写大字报是6月10号左右，比我们早，而且点了书记的名字，他们有内幕消息。那个时候我们还不显山露水，他们的大字报轰动了北航。”（戴维堤《逝者如斯》，乌有之乡）

在天津十六中即原来的名校耀华中学，天津警备区司令员朱彪的儿子朱强与几个部队干部子弟于6月初给学校领导贴了大字报，攻击他们压制运动。6月8日，胡昭衡市长的儿子李罗力领导成立了“文化革命委员会”，夺了党支部的权，后来又发生了震惊全市的“十六中事件”。周荣鑫的女儿周少华在南开大学，刘子厚的女儿刘力里在河北大学也都

成为造反派领袖。

在广州的华南师范学院附中，贵州省长、省委书记处书记李立之子李重明于5月27日贴出该校第一张大字报。

武汉实验中学学生王三宝（王任重之子）在6月6日贴出大字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矛头指向该校教师。“学校的当权派以为王三宝的大字报，就是官方关于文革运动如何开展的内部口径。”就按照大字报的思路揪出了由他们学校三位教师组成的“高廖张三家村”。（徐海亮《东湖风云录》，银河出版社）

除去干部子女以外，造反者，特别是领头的，大多是根红苗正的党团员、学生干部。在郑州大学带头给学校领导贴大字报的学生王相海是党员、团支部书记、复员军人。内蒙古师范学院造反派领袖、教员高树华是外语系的团支部书记。著名学生领袖、西安交大工程物理系学生李世英是党员、三好学生、学生会干部。兰州大学运动初期的积极分子李贵子出身贫农，虽然只是个要求入党的学生，但直接受到省委的重视与支持。哈尔滨师范学院的造反派领袖范正美是政治教育系的党员、班干部。和他一起造反的，不是党员就是“非党积极分子”。南京大学的文革始于溧阳分校，领头造反的是调干生、党员、学生会主席孙才基。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只是个团员，却出身好，是新四军后代，当时在校广播台工作。

这是造反主体。造反对象呢？“文革锋芒所指，处处云奔潮涌。文教宣传单位，高教系统、文化系统、新闻出版系统，烽烟四起。以大字报为形式的内部斗争，已经全面展开了。用王任重的话说：‘文化革命是全党的事，工人、农民的事。运动打击锋芒主要是知识分子。’”（叶曙明《历史现场的黑白记忆》，网络版，2005）

一大批大学校长倒了霉，包括北京大学校长陆平、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兰州大学校长江隆基、西安交大校长冯康、辽宁大学校长邵凯等等。

所以，从造反主体和造反对象来看，虽然形式上以下犯上，且犯上的是普通学生和基层干部，但是这些人拥有雄厚的政治资源，而造反的对象，虽然贵为一校之长，但在当时

政治环境下，已经沦为弱势群体，特别是在毛泽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著名论断之后。李达这位“一大”代表，早已被中南局列为批判对象。江隆基这样的老革命，也被西北局书记说成“不是我们的人”。由此可见，这样的造反，很难符合造反一词的本来意义。

再说他们造的是什么反。他们指责批判对象的罪名主要有：

1. 不参加甚至抵制文化大革命。6月2日，郑州大学的王相海等学生贴大字报《请问学校领导，对文化大革命究竟抱什么态度？》？（武彩霞《霜叶集》，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09）同日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学生游华生贴大字报批判院党委“对运动缺乏热情”。（徐海亮《东湖风雨录》，银河出版社，2005）

2. 反对毛泽东思想。在清华大学，最早的反蒋南翔大字报是批评校党委在教育路线上的问题，以及“反毛泽东思想”问题。6月9日，蒯大富等学生写了张大字报，也是批评蒋南翔贬低毛泽东思想。

3. 投降主义，重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6月10日，四川大学历史系总支书记于永志等给校长温建平贴大字报《请看温建平走的哪条路》和《校党委的投降主义错误必须批判》，被誉为“川大聂元梓”。

4. 修正主义阶级路线，压制、迫害工农出身的学生。当时北大的大字报大多是这样的内容，其中一些登在《人民日报》上。武汉重型机械厂工人文学创作组的朱鸿霞，后来成为著名工人领袖，在文革初期和别人共同写了一张大字报，批判工会和党总支执行了错误的文艺路线和阶级路线“。（徐海亮，同上）

再说他们为什么造反，即造反动机，大致有以下几方面：

1. 部分高干子女从内部得到消息，知道这次运动非同昔比，要打倒一大批高级干部。更多干部子女从内部知道了毛泽东对王海蓉、对毛远新的谈话，因而得到鼓励，产生反叛精神。

2. 大部分根红苗正的学生造反源于响应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认为积极投入运动是

自己的义务。

3. 还有聂元梓式的造反是文革前党内斗争的继续。在这样的党内斗争中，双方的互相指责也是说对方右。

所以从造反动机来看，很少有路见社会不平、拔刀而起的人物。从造反内容和造反动机来分析，也很难说符合造反一词的本义。

但是运动最初的这种造反也蕴含一些过去运动没有的因素。

1. 大字报的形式。这种形式不是首次采用，1957年右派发表言论使用的就是大字报。但是后来反击右派的也是大字报，而且铺天盖地而来，但都是奉命而为，或者是跟风，怕说自己也是右派。但是文革初期的大字报，不管其内容，有一定自发性和随机性，一般不是领导直接布置的。

2. 针对本单位领导。很多学生刚参加农村四清运动后回校，对二十三条中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斗争方向记忆犹新，也认为应当将矛头指向本单位领导。

这是说的1966年6月初造反第一波的初期。到了6月20日高潮时期，情况有了一些变化。以学校里的工作组为例，因为他们按顺序干的上述三件事，局面有所变化，广泛发生驱赶工作组的事件。和前段比较，造反主体范围更为广泛，造反对象转为工作组。造反内容也有改变。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下列两点。

工作组（有的部门单位是党委）给全体师生员工（或全体职工）政治排队，并开始整学生。这些政治排队做法或名单泄露出去引起轩然大波。中国科学院的应地所事件的部分成因就是这个政治排队问题。1966年6月13日，武汉水利电力学院一系总支书记召开该系“左派”会议。会后，参加这次会议的一位团支部书记郭明正对这种做法有意见，泄露了会议内容，引起学生骚动。随后学校领导组织“反右”对其迫害，并且制造了一起所谓“持刀行凶”事件予以诬陷，由公安局将其逮捕。（张建成《岁月留痕——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文革亲历记》，中国文艺传播出版社，2014）此时期在河南农学院，发生“六二一事件”，“之前，工作组为了整学生的材料，曾私扣、私拆学生信件，引起少数学生的义愤，”

21日，少数学生自发组织声讨大会，后被打为“匈牙利事件”，遭到镇压。（武彩霞《霜叶集》，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09）

一些学校的学生开始同情被整的校领导，对工作组整学校领导的做法开始怀疑和否定，如北京地质学院的高元贵、北京航空学院原校领导武光、天津大学原校党委书记李曙森。北京地质学院家庭出身贫农的王大宾对于他所尊敬的校领导高元贵和同样尊敬的工作组之间毅然取舍，支持了高元贵，说明他对局势有理智的分析，绝对不是盲从。

在工作组迫害之下，西安咸林中学的教导主任梁老师自杀身死。“同学们缓缓地从死者身边走过，个个心里都有一股气，这气是冲着工作组，冲着派工作组下来的县委（地委省委……）来的。（陈家琪《执着和迷惘》，徐友渔编《1966，我们这一代的回忆》，中国文艺出版公司，1998）

这样的造反已符合造反一词的原来含义，确实出于义愤，也包含了更多的独立判断。这是造反派的起源时期。

再说主要发生在1966年8月的第二波造反。在这一波造反中，造反派组织开始形成，和保守派发生原则分歧。这分歧以清华大学八八、八九两派的争论最为典型。这争论就是，当前的运动主要应该批判工作组还是批判学校“黑帮”？如果继续批判“黑帮”，就是继续遵循文革开始时的斗争方向，和历次政治运动没什么原则区别。如果批判工作组，就是批判工作组将普通师生打成“反革命”的政治迫害行为，为弱势群体说话。而且，批判工作组有一种“对事不对人”的性质，造反派并没有说工作组是“黑帮”，只是叫他们检讨而已。在行动上，典型事件是北京航空学院和地质学院到上级机关静坐要求工作组回校检查的事件。从他们提出的要求和具体行动方式来说，他们的行为都没有什么可指责的。

这一波造反被红卫兵运动掩盖，互有交集，有一定局限性。

1. 虽然一些单位造反派在“破四旧”运动中采取了保护文物的行动，如聂元梓在北大组织保护校园、浙江大学造反派保护灵隐寺，但是仍有不少造反派随大流参与破坏古迹或抄家，特别恶劣的是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根据中央文革的指示到山东曲阜砸孔庙的恶行。

2. 未能摆脱血统论的影响。大多数造反派组织沿用运动初期红卫兵的组织形式、组织路线和行为规范，并或多或少受当时正红的血统论影响。一些出身好的造反派红卫兵，如哈军工的红色造反团，则唱着北京老红卫兵编的造反歌曲去外校煽动造反。对多数造反派来说，这一方面是认同，例如我单位工厂“硬骨头”战斗队居然将谭力夫的讲话印成传单散发。另一方面是外界压力，例如我单位造反派组织“革命造反大队”在这一时期悄悄将仅有的两名出身不好的成员劝退了。

3. 两派在组织上未能完全脱离。例如著名造反派北师大“井冈山”和北航“红旗”分别和保守派混在一起成立红卫兵“一司”和“二司”。在组织原则上，他们将红卫兵的阶级属性放在第一位，而把对工作组的立场问题置于其次。

4. 劳改队在这一时期继续存在或开始成立。造反派当然不能对此负责，但似乎无视或无暇顾及这样的政治迫害行为。

5. 这前两波的造反运动主要发生在大中城市，或者说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在广大地县以下区域，只有在地方政权主持下对弱势群体（如四类分子和中小学教师）的迫害，而无造反事件，所以也不存在“五十天”及其后的反复。例如涪陵这样一个专区所在的县，在10月之前，只存在官办红卫兵的“破四旧”运动。

在此期间，还有大批北京学生到外地串联，煽动对地方领导造反。这其中包括在本校持各种立场的学生，甚至有一些老红卫兵。这形成一种“泛造反”概念，与造反一词的本义有很大距离，尽管此举在很大程度上鼓舞了地方上在前段运动中受到压制的群众。

1966年10月，开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后，启动了造反第三波，一直延续到1967年初夺权阶段。这一波持续时间长，社会动员面广，是文革初期造反的主体成分，具有前两波所没有的特点——

1. 这个运动有实质性的具体内容，就是清理、销毁整群众的“黑材料”，给运动初期打成“反革命”的群众平反。这一点，在很多有关这次运动的文章中都避而不谈，使得一

些没经历过文革的读者感觉，这就是造反派“踢开党委闹革命”，平白无故地冲击各级领导的一次运动。

前一波的造反针对的是“五十天”的问题，这一波则不限于“五十天”和工作组。例如北京被关押折磨致死的中学教师郑兆南是在工作组撤出后被红卫兵关押殴打的。正如卜伟华先生所概括的，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中“在中央的支持下，一大批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的人得到了平反，许多被‘文化革命委员会’或‘筹委会’以及‘老红卫兵’打击、压制的群众也得到了平反。”（卜伟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者博客）

再者，无论在中央文件中还是在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中宣布要平反的，是运动初期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学生”、“革命积极分子”，就是蒯大富这样的人。实际上，这些“黑材料”基本上是运动初期各级党委或工作队的排队名单，即左中右名单。名单上所列的右派主要是传统意义上的阶级敌人和有各种政治历史问题的人。直到群众造反兴起以后，才将带头贴大字报的学生列入。在清理“黑材料”的时候，很难把这些人员和“革命学生”区分。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中，这批人实际上搭车平了反。在这样做的时候，有些造反派是有意识的，有些是无意识的。

2. 这个运动具有明确的批判血统论内容。在这次运动开展之前，一些造反派红卫兵已开始系统批判宣扬血统论的谭力夫讲话。北京工业大学《东方红》等于9月15日联合成立“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十六条’联合委员会”，并于26日，召开批判谭力夫讲话的大会。9月16日，北京一些中学造反派成立“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坚持批判血统论。

10月5日，中央文革成员雍文涛在清华大学召开第二次批判谭力夫讲话大会上的讲话中表示：今天能够参加大会挺高兴，大家一起讨论，对谭立夫同学讲话的批判，是捍卫十六条，执行十六条，肃清这个错误路线在一部分同学中的影响，因此呢，我们是支持的，赞成的。

在刘丽英所在的沈阳市，血统论红卫兵称为“红后代”。1966年10月23日，在东北工学院召开造反派“思想兵”与“红后代”的辩论大会，主要辩论谭力夫讲话。辩论进行得非常激烈。这次辩论以后，“红后代”就逐渐式微，到1967年初就销声匿迹了。

也就是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背景下，出现了遇罗克《出身论》这样的批判血统论著作。

3. 这次造反对象之一就是“牛鬼蛇神劳改队”。多数劳改队成立于1966年6月初或8月，到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多解散。有的是被造反派有意识解散的，有的是学生们出外串联自动解散的。在沈阳，伴随“红后代”解散的是“牛鬼蛇神”的解放。例如在沈阳铁中：“在这时，我校风云一时的‘红后代’突然从学校里蒸发了，不见了踪影。黑字大军无声无息的结束了自己的历史。黑五类老师解放了，校长夏汝南解放了。”（谷茂伦《在那特定的年代里》，作者博客，2014）

4. 造反内容涉及文革前的冤案。在这一时期，造反派把“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引申到文革以前。历次政治运动中的一些冤案，例如广东的“双陈案”、一些省份的“地下党案”和“地方主义案”，都列入重新审查之内。极少数造反派开始替右派翻案。武汉的极左派鲁礼安甚至替党内“叛徒”喊冤。在很多地级以下的文革中，群众普遍揭发、控诉一些无良干部在“大跃进”及以后的饥荒中执行极左路线的罪恶行为。

1958年辽宁省委制造了一个“反党宗派集团”冤案，省委第二书记王铮、省长杜者衡、副省长李涛等被打成“反党集团”成员，撤销一切职务，遭到严重政治迫害。在文革中，东北工学院“辽联”派红卫兵在1967年6月底，和“省委联络站”一起召开1958年问题的小型辩论会，后来又在7月9日召开这几名干部的“平反大会”。

5. 造反主体所包含社会阶层空前广泛。到了夺权时期前，广大农村中小学教师从“教师集训队”中解放出来以后，纷纷参加造反派。此时造反派的右翼边缘扩展到“摘帽右派”。前《文汇报》总编徐铸成是一典型。前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袁永熙是另一典型。

以上所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内涵已经超出中央限定的范围，表现了一定的独立性。在当时的社会习惯用语中，也将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中崛起的政治派别称为造反派。这一定义也符合造反一词的本来意义。

杨继绳先生说：“批判资反路线是文革的一次重要转折。真正的造反派的崛起是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相联系的。这里说的真正的造反派是指斗争矛头指向‘当权派’、即指向特权阶层的那一些个人和组织。这一批人在运动初期反对党委、反对工作组，在工作组的50天镇压中被打成了‘右派’、‘反革命分子’。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他们虽然得到了自由，但还没有从阴影中走出来。直到1966年10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造反派群众组织才真正走上政治舞台。”（《天地翻覆》，电子版）我基本上同意杨的判断，但要指出从运动初期的“伪造反”到后来的“真造反”之间有个必要的过渡。

三

论述了造反派的定义以后，再回到刘丽英和她的书《往事回首》。

刘丽英书中所说的那个政治部副主任在1966年年5月中旬就当上了沈阳市公安局的文革办主任。聂元梓大字报发表后，“政治部的一个造反派”就贴出了大字报攻击公安局的一位领导。“接着，造反派们以同样暴露人事档案的手法，抓住家庭出身、社会关系等问题，组织指挥在各个处室张贴一批大字报，打倒一批处、科级中层干部。”

这里说的事件，应该发生在6月初以后一段时间。先是贴大字报，6月18日到20日，发展到刘丽英被批斗。如果说这样一批贴大字报的人是“造反派”，他们就是全国最早的“造反派”，正如王海光先生所说：“沈阳公安局内部的造反派出现得早”。

他在这里从形式上定义造反派，就是给单位领导贴大字报的就是造反派。这样的定义未尝不可，但是其中却包含若干矛盾之处。所谓“造反派”，后面的靠山自然是那位5月中旬就上台的文革办主任。而这位主任，是谢富治派来“掺沙子”的，背后有谢富治支持。他们既有强势的政治资源，也有权力察看公布干部们的人事档案，能完全主导公安局的运

动走向。所以，他们既与蒯大富这样的造反派的地位完全不同，也异于刘涛、宋彬彬这样首先给学校领导贴大字报的学生。他们实际上是掌握沈阳市公安局命运的真正实权派。造他们的反，才符合造反这个词的本来意义。

刘丽英等干警虽根红苗正，但在当时的公安局里，相对于这些真正掌权者，属于弱势群体，和一般的造反派有共同之处。强势和弱势从来就是相对的。例如我院的复员转业军人，分配在实验室的，以自己身份高贵而傲视知识分子，大多参加保守派。而分配到附属工厂当工人的，相对于党政干部又处于挨整的地位，大多成为造反派骨干。

6月20日以后，市委派工作组进驻公安局。对于市委工作组在此期间做了什么事，刘丽英在书中语焉不详，只说停止了乱批乱斗，“使造反派们的恣意妄为受到了限制”。停止乱批乱斗，符合一般工作组的规律。他们停止群众乱批乱斗，自己组织批斗。派驻沈阳公安局这个工作组可能也整过人，因为后来叙述，也有个“黑材料”的问题。刘丽英对这个工作组有好感，原因是市委和公安局这些干部应该比较熟，和那些刚从军队派来“掺沙子”的外来户不同。

接着叙述：“不久之后，从上到下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派工作组被指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公安局内的造反风又刮起来了。”

“但是到了八月中旬”，一位市委常委肯定了那位文革办主任，代表市委支持“市局革命派”，否定了工作组。于是，前文革办主任成为文革主任，并组织了市局临时党组、党委。“整个公安局的党政权力被以那个‘文革主任’为首的造反派夺权”，并开始了“第一次迫害潮”，一直持续到10月底。

这段叙述主要说的是1966年8月的事。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开始于10月。这是个明显的时序颠倒，对事件的定性有严重误导。

这些人反对工作组、批判工作组，和社会上一般造反派行为类似。但是他们不但批判工作组，主要精力还放在批判、迫害局里很多干部上面。政治部“文革小组”还对政治部

的干部“分类排队”，将划为“四类”的干部科副科长刘连瑞迫害致死。这种行为和运动初期许多党委和工作组迫害群众的做法极为类似。

转折发生在11月，也就是真正开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以后。11月10日，大东区一位干警在市局贴出一张大字报，“借用当时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击一大片’的提法”，点名质问那位文革主任执行的是什么路线。从18日起，刘丽英接连贴了《请同志们评一评，到底是谁打击陷害谁？》等三张大字报揭发批判文革主任，并得到广大干警的支持。于是这个文革主任及其属下那帮人垮台了。说是垮台了，但根据后文，此后公安局正式形成两派。

虽然作者尽力与文革划清界限，说是“借用”文革的口号，但说明，刘丽英等人的这次反抗政治迫害的行为正是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旗帜下进行的，和社会上其他造反派没什么区别。实际上，所有的造反派，都可以说是在“借用”中央提出的口号。

1967年1月7日，辽大“八三一”将他们学校两名对立派学生扭送沈阳公安局，说他们在京冲击中南海。次日他们来局要领回予以批斗，公安局未给，“八三一”于10日冲击并占领了市公安局。公安局刘丽英等与他们谈判后，他们方才予以启封和退出。而市公安局和刘丽英他们对立那派诬蔑刘丽英等“勾结红卫兵冲砸市公安局并乱中夺权”，于14日将他们几个人拘禁批斗。辽大“八三一”知道此事后，派了几十人到分局解救他们。此时他们已被转移到派出所。红卫兵到派出所要人，派出所民警对空开了枪。直到凌晨3时，刘丽英等才被释放。次日，“八三一”把这几个开枪的民警游了街。

2月6日，在一月革命风暴影响下，前文革主任一派在沈阳市公安局夺了权，发出第一号命令，称其对立群众组织是“在一小撮反（革命）坏分子把持下的右派组织”。这正是保守派对造反派通用的攻击语言。

2月20日，辽宁省军区对沈阳市公安局实行军管，随后表态承认“二六夺权”和他们成立的机构。之后，刘丽英等赴京上告。“这时候，一些地方已开始抓‘一小撮’”。

3月24日，市局刘丽英等6人“以‘造反派革命群众’扭送为名”被逮捕，次日在大会上被批斗，总共关押了58天，在中央117号文件颁发后被释放。

熟悉文革史的人都知道，这就是遍及全国的“二月镇反”。3月5日，辽宁大学“八三一”的十名领导人被“扭送”公安机关拘禁。沈阳农学院“八三一”派的三个头头被关进监狱，20多骨干关在学校审查。在这次“二月镇反”中，被军队逮捕的都是造反派，主要是比较激进的造反派，像四川的“八二六”、辽宁“八三一”这样的。找不出一例保守派在此期间被军管会逮捕。

刘丽英从未说明她所在群众组织在沈阳属于哪一派，当然也许哪派都没参加。但是她的丈夫李文彬肯定是“八三一”派的，很可能在组织上参加了这一派而且是骨干成员。这是因为1967年9月，中央召集辽宁三派分别组团来京谈判。一位“八三一”派的“秘书”说：“我们代表团公安代表是沈阳市刑警队队长，他的妻子经常来看他，她温柔漂亮文静（回沈不久，她爱人被革委会关押至死），她就是后来的中纪委副书记，威震全国的女包公刘丽英。”（法库老糊涂《往事烟云》，作者博客，2012）这正是李文彬后来被残酷迫害致死的根本原因。刘丽英的书中仍将此归罪于“造反派”。可是后面她又谈到，1979年1月4日中纪委在北京开会，她看到与会的多穿军装。“当时我对穿军装的解放军特别反感，因为‘文化大革命’时我接触的军管会的人都是整人的，对他们有一种厌恶。”指明了罪魁祸首是谁。

所以，刘丽英在文革中至少是辽宁造反派“八三一”的基本群众。她在文革初期被迫害，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期翻身，并敢于奋起反抗强权、反抗政治迫害，在“二月镇反”中被逮捕，在“二月镇反”被否定后释放，然后在“清理阶级队伍”和“清查五一六集团”运动中再次遭受更残酷的迫害。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她的命运始终和社会上的造反派共进退，应该算个典型的造反派。她在这十年里的遭遇，也是整个文化大革命的缩影。

因此，我感觉，王海光先生以刘丽英为例得出“这种情况大致反映了单位‘文革’的运动特点：单位大多数干部和群众的政治倾向都是属于‘保守派’的，他们参加运动是被动介入的。”这样的结论可能值得斟酌。在运动初期的单位内，确实很少有人参加或支持造反派，所以将其称为少数派。但多数人的保守派倾向，不是出于是非的判断，而是出于利益的考量。即他们认为党组织神圣不可侵犯，也多来自历次政治运动积累的经验，特别是反右斗争的教训。到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后期，保守派组织大多自动解散，多数群众认同当时的文革思想体系，拥护或参加造反派。这里有个变化过程。

四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有人说，区分一个人是否造反派有个标准，就是文革后被审查、被处理或定为“三种人”的就是造反派。可是这个刘丽英，文革后青云直上，当了中央纪委会常委，她怎能是造反派呢？

这话问得有理。但是凡事都有个例外，刘丽英就是个例外。

文革后造反派遭到整肃，是在1980年以后的清理“三种人”运动中进行的。在那个年代，辽宁省是怎样的局势呢？

在一般省市，是文革中被打倒的干部重新上台，自然对反对他们的造反派反攻倒算。然而辽宁省的情况有些特殊。辽宁在文革中分三派。一般认为，“辽革站”是保守派，“辽联”是温和的造反派，“八三一”是激进的造反派。“辽革站”支持陈锡联，打倒宋任穷。“辽联”打倒陈锡联，拥护宋任穷。不但拥护宋任穷，还支持一批东北局和省市领导干部，把他们隐藏在他们的大本营东北工学院内免遭批斗。“八三一”既打倒陈锡联也打倒宋任穷。从这点说，他们最激进。但是从“出身”来说，“辽联”和“八三一”都是造反派。如果没有另外的对立面，他们也许打得不可开交。但是，他们面对凶悍的敌人，就是沈阳军区全力支持的“辽革站”，基本是站在一起的。

1967年6月1日，东北工学院与造反派“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对立的两个组织煽动军区支持的一些工人队伍，也就是“辽革站”的前身，调动上几千人、几百辆汽车冲进东北工学院行凶。这次进攻是精心准备的，结果被打败，一名工人被打死，称为东工事件或六一事件。这一事件引起了社会各界强烈的反响，各阶层人士纷纷表态，谴责“辽革站”打砸抢的罪恶行为。此后，在军区支持下，“辽革站”在辽宁三派斗争中一直占据强势，文革后期更成为掌权派系，对造反派和一些领导干部反攻倒算，进行残酷迫害。其中，黎明机械厂的“李大麻子”李培元率领的“棒子队”最为凶恶，在沈阳老少皆知。

文革后，清除“四人帮”的帮派体系。在辽宁谁是这个帮派？当然是毛远新。毛远新是谁？他是沈阳军区政委。这样一来，军区的威信大打折扣，自然影响到对文革中事件的评价。

谁来“清除”呢？掌权的自然是文革后重新上台的原东北局省市老干部。在文革中，想置这些干部于死地的不是造反派，而是军区，以及军区支持的“辽革站”。“辽革站”要打倒的干部是“宋、马、顾、喻、徐”（指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第三书记马明方、书记顾卓新、候补书记喻屏和辽宁省委书记处书记徐少甫）这些干部中有些被“辽联”保护起来，“辽革站”六一武斗冲进东北工学院要抓的就是这些干部。

此外，中央1977年派著名干部任仲夷为辽宁省委第二书记，翌年转为第一书记。任辽宁省委第一书记期间，任仲夷第一个公开发表文章响应“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批判“两个凡是”。他绕过“禁区”，亲自主持烈士张志新的平反昭雪。

在任仲夷领导下，对文革中问题的处理也较为公平。辽宁最激进的造反派“八三一”司令张祥久，相当于清华大学的蒯大富，是在1968年中央首长接见辽宁各方代表时被点名批判的“坏人”，后来被关押了8年直到文革结束。他曾率队伍去营口抢枪，虽然枪没抢到，但冲突中导致当地一位解放军连长死亡，他应负领导责任。此外，在“一月风暴”中，他还进驻、占领过《辽宁日报》社。这些事件，按说都可以上纲，可是到了粉碎“四人帮”以后，官方也找不出确凿的犯罪证据，就算判他十年徒刑，因已关押多年，就放出来了，

以后也没有再受审查。其他一些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八三一”骨干也重新安排了合适的工作。（鄂西钓徒《张祥久“司令”的悲剧——记忆鳞片62》，作者博客，2013）

而那个“辽革站”“棒子队”的李培元呢？他于1977年11月15日被捕。1978年1月24日的《辽宁日报》以整版篇幅刊发文章《篡党夺权的凶恶打手——李培元》对其进行全面批判。

这是辽宁省的大气候。刘丽英所在的公安局呢？公安局内原来被对立派打到的领导干部纷纷恢复原职。那位“前文革主任”估计也回到部队。刘丽英书里没提他的名字，说明可能没受到任何处理，全身而退。他造了那么大的孽，如果真是个造反派，能那么顺利过关吗？

至于刘丽英个人的仕途，也不难解释。1979年1月4日中纪委在北京开会，刘丽英与辽宁省委副书记徐少甫参加。在此期间，中纪委征求了徐少甫意见以后，决定调她到中纪委工作，徐少甫是谁？就是辽革站要打倒的“宋、马、顾、喻、徐”中的徐。他和刘丽英同时遭到同一批人的迫害，可说是难友，当然说刘丽英的好话。

至于刘丽英后来参加“两案”审判工作，又当上了中纪委常委，我想可能与宋平的推荐有关。刘丽英在哈尔滨女中上学的时候，校长是宋平夫人陈舜瑶。刘丽英的这本书中有2004年她去看望宋平夫妇的照片。

较之其他省市，以刘丽英为代表的辽宁造反派的结局还比较好的根本原因，是在文革中，由于有“太子”毛远新在辽宁坐镇，“四人帮”和王关戚等人很少插手。文革后清理的那些事，如迫害张志新、“哈尔套大集”、“考教授”、张铁生交白卷等事件，都与造反派无关。■

【评杨书】

评杨书“前言”：关于“历史决议”

胡鹏池

本文目录：

一、杨书“前言”对“历史决议”的评价

（一）具体的评价：三段话

1. “历史决议”是折衷和妥协的产物
2. “历史决议”目的是为了“三保全”
3. 具体批评“官方文革史”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美化

（二）评价要点：三句话、九个字

二、我对杨书“前言”的评价

（一）“非理性结论”必然来自“非理性分析”

（二）为“主要结论”铺垫的“次要结论”何等不靠谱！

三、对错参半一大段，似是而非三句话

（一）对错参半一大段

（二）似是而非三句话

四、文革的最后胜利者是谁？

（一）文革中后期，中国社会的政治力量

（二）文革后期，中国社会有三种政治力量

（三）“前言”的“不幸的是”另有所指是什么？

五、“前言”对老一辈革命家的褒贬太轻率、太浅薄

六、为什么写不好文革史？

七、“历史决议”的伟大意义

(一) 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与“历史决议”的“彻底否定文革”是分不开的

(二) “历史决议”是阻止文革翻案的定海神针

附件：

胡鹏池：史实的层次

一、“韩爱晶殴打彭德怀”案中的史实层次

二、戚本禹诬陷田家英一案中的史实层次

杨书《天地翻覆》之“前言”仅3500字左右，相当短小精练，主要有两个主题：

一、如何研究文革史？

二、对“历史决议”的评价。

第一个主题：如何研究文革史？

“前言”说：“研究文革史就是要跳出时代的局限、利益的局限和个人情感的影响，还原文革的本来面目；站在人类文明和现代政治文明的高度，重新认识文革。”

这个主张包括三个“跳出”与两个“站在”。为叙述方便，我将其称为“三跳出”。

我认为文革虽然结束了40年，许多领域都发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变化，但“史学”领域曾经是文革重灾区，“四人帮”主要成员及其爪牙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及“历史为政治服务”的流毒至今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肃清。所以，在史学领域内仍应当大力提倡恢复中华民族的优良史学传统，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秉笔直书”、“以史为鉴”等史学主张，没有必要再去另搞一套包括“三跳出”在内的其它名堂。

第二个主题：对“历史决议”的评价。

在这个主题上，我们的分歧相当大，而且是根本性的。

杨书“前言”对“历史决议”的评价除了有一点点正面的内容外，其余几乎全是负面的。可以这样认为，“前言”对“历史决议”作了“全面、彻底”的否定。

一、“前言”对“历史决议”的评价

“前言”：“官方文革史局限于原来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难免违背文革的真相。”

需要加以说明的是，迄今为止虽然已有几本民间的或海外的文革史，却并没有出现一部或几部官方修撰的文革史。所以，杨书中一再提及的“官方文革史”并不是一个特指的规定概念，而是一个坊间的流行概念，它的内涵与外延首先指的是《历史决议》，其次是邓小平及其后的几代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有关讲话，还包括有关的重要历史文件，再就是官方机构组织编撰的一系列重要的历史文献。如《毛泽东传》、《毛泽东年谱》等等。当然还有许多其它内容，但主要还是指“历史决议”。

在作了这样的说明后，对于“前言”中的这句话是可以表示认同的。

但是我们分歧并不在这里。

（一）具体评价：产物与目的

“前言”接着对“历史决议”作了具体的评价与阐述：

1. “历史决议”是折衷和妥协的产物

“前言”说：“说它是一部历史问题的决议，不如说它是它是一部政治问题的决议。它是对当时面临政治问题的折衷和妥协。为了达成改革开放的共识，当时这种妥协是必要的。如果没有这种共识，就不可能有以后三十年改变中国的伟大活剧。但是，历史学家在还原文革真相时，不能像政治家那样折衷、妥协。”

请注意，其中“如果没有——就不可能有——”是“前言”中对“历史决议”唯一含有正面意义的评价。尽管作者用“伟大活剧”代替“改革开放”可能另有深意，但是它仍然将“历史决议”与“改革开放”联系到了一起。

还请注意，历史学家虽然不能像政治家那样折衷、妥协，但是历史学家有责任分析指出哪些折衷、妥协是必要的、合理的？哪些是不必要的、不合理的？如果这也做不到，短

篇可以谅解，但对于像“天地翻覆”这样长达80万字的鸿篇巨制是不可原谅的。

2. “历史决议”目的是为了“三保全”

“前言”结论：官方文革史既保全了毛泽东思想，又保全了中国共产党，也就保全了整个官僚集团，保全了官僚集团继续执政的合法性和他们的全部利益。

这个结论既简明扼要，又旗帜鲜明。句式上虽有四个“保全”，但后两个“保全”可以合并为“保全了官僚集团”，所以我们可称其为“三保全”。

稍加细察，可以发现“三保全”结论是作者通过两种简单的推理得出来的：

(1) “历史决议”通过切割毛泽东思想保全毛泽东思想和官僚集团。

“前言”说：把毛泽东1956年以后发展起来的思想从毛泽东思想中切割出去，是为了保全“毛泽东思想”，是为了挽救“信仰危机”。显然，只有保全了毛泽东思想，才保全了专制制度的灵魂，才能保全官僚集团的利益。这种实用主义的切割，既违背历史真实，也难以说服人。

(2) “历史决议”通过切割两个反革命集团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保全中国共产党。

“前言”说：官修文革史还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所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一论断又把“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从中国共产党中切割出去。这种切割是为了把文革的责任推给“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从而保全中国共产党，是为了挽救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危机”。

3. 对历史人物与事件的具体评价

“前言”在表达了对“历史决议”的上述看法后，接着又对重要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进行褒贬。

“前言”写道：在官方文革史和受官方影响的写文革的书中，刘少奇像驯服的绵羊，任凭毛泽东摆布，最后被毛送上绝路。事实上，作为老革命家、历经战争和多年党内斗争考

验的刘少奇和以他为代表的官僚集团，从文革一开始对毛就有抵制，刘少奇还没有下台时有“二月提纲”对姚文元文章的对抗；“5·16通知”出来后，又派工作组对抗。刘少奇被打倒以后，有“二月逆流”和“二月镇反”对文革的对抗，有邓小平为代表的一批人对文革的对抗。其间，还有军事官僚集团更为强硬的对抗。这一系列的对抗主要不是正义和非正义的对抗，而是利益的对抗。在对抗中，以普通民众的牺牲为代价。把刘少奇写成驯服的绵羊，是为了使官僚集团不承担文革的责任，掩盖了军政官僚们在文革中摧残群众的恶行。美化周恩来、掩盖周恩来在文革中紧跟毛泽东搞文革的事实，也是出于这一目的。

（二）评价要点：三句话、九个字

“前言”对“历史决议”的评价中有三句话特别令人侧目，将其拎出来，以达到“醒目”的效果。

1. 官方文革史既保全了毛泽东思想，又保全了中国共产党，也就保全了整个官僚集团，保全了官僚集团继续执政的合法性和他们的全部利益。

2. 这一系列的对抗主要不是正义和非正义的对抗，而是利益的对抗。

3. 文革最后的胜利者是官僚集团，漠视百姓的苦难是很自然的。

杨书后来在“导论”中又重复了这段话，且在前面加上了“不幸的是”四个字。

因此“前言”对“历史决议”的评价可用更简洁的“三句话、九个字”来代表：

三保全，非正义，不幸的。

读者不妨去细读“前言”，看看我将“前言”对“历史决议”的评价提炼成这“三句话，九个字”对不对？正确不正确？精当不精当？有没有夸张与歪曲作者的原意？

二、“三句话、九个字”的由来

因此，我的下一个问题就顺理成章地提上来了：作者为什么会对“历史决议”得出如

此评价？

说实在话，我对此看来看去，想来想去都没有搞明白，只能说两点粗浅的意见：

（一）“非理性结论”必然来自于“非理性分析”

就这段话本身而言：“前言”直接引用了“历史决议”第（20）小节中的最后一段话“‘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所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然后就此进行推理得出了“三保全”的结论。

而这段话一共也只有三句话：

第一句“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这句话有什么错？难道不是这样吗？我认为这句话是完全正确的。

第三句“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句话又有什么错？难道不是这样吗，我认为这句话也是完全正确的。

第二句“被反革命集团所利用”，这句话是确实有问题的。

“错误发动”本身就是错误的原点与起点。篱笆扎得紧，野狗钻不进。正因为起点上的错误，才有空子可钻，才会被利用；“利用”有时是单向，有时是双向，这里的“利用”是单向还是双向呢？

我与作者都是那个时代的亲历者，我们的亲身感受明确无误地告诉我们：这个“利用”是双向的。一方面发动者利用“反革命集团”发动、领导文化大革命，推进文革路线，打倒一个又一个政敌。另一方面“反革命集团”也利用发动者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赌上身家性命，积极投身其中，浑水摸鱼，打倒了一个又一个政敌，谋取上位，实现其政治野心。

特别需要指出：其中有一部分政敌与发动者的政敌是重合的，但也有一部分是发动者暂时并不想打倒的政敌。至于哪些是重合哪些不重合？这需要根据一个个具体的对象进行具体的分析。但进行这种分析其实也并不困难。例如刘少奇是共同的政敌，邓小平就不是；周恩来也不是。

还必须看到这两个集团是在领导者错误发动文革的同时，为发动者所授意、怂恿、支持下产生、形成与发展的。利用与反利用的双方都是心知肚明、你情我愿，而不是一厢情愿。

“历史决议”既然否定了这两个集团，那么同时也否定了发动者。这同样是不言而喻的。

所以这第二句话起码也有一半是正确的。

一共只有三句话，三句话中对了两句半，而且点明了是发动者的错误，也即点明了是毛的错误，点明了文革的性质——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所以我认为：“历史决议”对于文革的结论是完全正确的，其分析推理的过程也是基本上正确的，是能够站得住的，起码能得80分。

还必需指出“历史决议”（20）中这段话前面还有一段话：“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这更是一句非常正确、非常精辟的论断。“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这些程度状语运用得十分准确！

（二）为“主要结论”铺垫的“次要结论”何等不靠谱！

“前言”对“历史决议”的主要结论是“三保全”，为了为主要结论铺垫，又列举了一些次要结论。请看看这些“次要结论”吧！

次要结论1：关于“四人帮”。

“前言”说：其实，1973年8月才有“四人帮”，在这以前不存在“四人帮”。

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中国人都有一个不言而喻的共识，所谓的“四人帮”就是“江青集团”，或称“江青帮”、“上海帮”、“江青反革命集团”，这些概念是近于全等的。起初，这是一个规定概念，因为共识，现在就是一个辞典概念。

“江青集团”的起步、形成与发展要早得多，我们不妨作一简要回顾：

早在1965年春（或更早），江青在得到毛授意后到上海开始组织班底批吴晗《海瑞罢

官》，得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大力支持，柯具体安排张春桥负责，张又将任务布置给了姚文元，张姚开始组织秘密班子在秘密地点进行秘密撰稿。“江青集团”的原始班底由此开张，主要成员是江张姚。本来还应该包括柯庆施，只因为这个柯大鼻子随后就因病休养了，不久又死了。如果柯大鼻子不是早死，他起码也会成为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在历史上的地位应与康生并列为“康、柯二奸贼”。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该文见报后，《文汇报》驻京办事处（简称“北办”）写了大量的采访情况汇报，其中写到在北京支持姚文元文章的只有关锋、戚本禹，学部的尹达等少数几个人。毛江在上海看到该材料后随即布置《文汇报》负责人陆灏电话通知“北办”主任艾玲将关、戚二人像地下工作者似地秘密安排到上海（详见艾玲的回忆文章）。关、戚在上海见了江张姚，关锋还参加了毛于1965年12月21日在杭州的谈话会。由此“江青集团”的班底扩容了关锋、戚本禹，南北呼应的格局开始形成。

1966年5月28日，中央发出关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的通知，成员13人，其中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都在列。江青虽是副组长，但组长陈伯达是专为江青遮人耳目、代之受过而专设的傀儡。中央文革小组成立之日实际上就是“江青集团”形成之日。

而在“前言”所提到的“1973年8月”是个什么日子呀？这是中共十大召开的日子。“王张江姚”中位置最高、起步最晚、也最是草包的王洪文正是在十大才当选为中央委员，接着又在同月的十一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

将这个时间算作是“四人帮”形成的日子是不是史实呢？表面上也可算作是。然而实乃小儿之见，读死书的书呆子之见。如果将此认作史实的话，则与“公元前548年，齐国国君死了”同属第一层次的史实。也就是笔者所定义的“低阶史实”，“高阶伪史”。（关于这个概念，详见附件：《史实的层次》）

真不知道作者出于何种史识才会说出这番话？我猜想一定是老杨从哪儿抄来的。

次要结论 2、关于林彪集团

前言说：如果说有个“林彪集团”，这个集团也是在1969年4月以后形成的，到1971年9月就不存在了。

有没有“林彪集团”？笔者也认为过去下这个结论的理由并不充分，需要等待相关历史资料的解密。

虽然“林彪集团”不能定性，但“林彪小圈子”却是事实存在。这个小圈子的成员起码包括“四大金刚”加上林彪老婆，也即人们所说的“黄吴叶李邱”，其形成的时间最晚也在经林彪推荐，毛泽东批准，黄永胜上调中央任总参谋长之时。

1967年8月17日成立军委办事组，当时吴法宪是负责人，成员包括叶群、邱会作、张秀川等。9月底由当时的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兼任组长，吴法宪任副组长。1968年3月24日杨成武被打倒后，林彪提议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出任总参谋长。毛泽东说：“永胜，永胜，永远胜利，就让黄永胜干吧”，并且明令取消“代”。于是黄永胜从广州军区司令员上调进京任总参谋长兼任军委办事组组长。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这些“开国中将”就有了一个“开国上将”当领班，后面又有叶群这样一个“林家铺子”的“老闆娘”。1968年4月1日吴法宪宣布：军队重要文电，今后不再抄送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刘伯承等军委常委；4月6日，黄永胜说：“今后有事就打电话找办事组和林副主席，军委常委不执行权力，办事组代替军委常委。”

那么“前言”所提到的“1969年4月”又是一个什么日期呢？这是中共九大召开的日期。正是在九届一中全会上，黄吴叶李邱悉数进入政治局。

而在此前，“林彪小圈子”早已形成的了。作者却认为是在“九大”形成的，这不是睁眼说瞎话吗！作者的历史知识、史识水平何至于低到这种程度啊！

三、对错参半一大段，似是而非三句话

（一）对错参半一大段

“前言”接下来又是一大段：“1976年的十月政变以后，否定文革成了“政治正确”。所以，在记述文革的书刊中，党内的高级干部们都标榜自己如何抵制文革、如何坚强不屈，完全掩盖了他们在某个阶段追随毛泽东搞文革的事实，掩盖了他们曾经大力镇压群众、参与迫害干部的事实，也掩盖了一部分官僚对受迫害的官僚幸灾乐祸甚至落井下石的事实。在官修文革史对干部受迫害的情况写得很多。

这一大段话，表达了老杨对“党内高级干部回忆文革”的总体认识。

这段话对不对呢？我认为是对错参半。

一方面，“十六条”明确规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内高级干部们当然首当其冲，他们是文革中最重要的受害者群体之一。文革以后，他们不仅有权利，也有责任与义务回忆他们在文革中受迫害的历史，而且由于地位特殊，他们的回忆对揭示文革的真相有着积极的、不可或缺的重大意义。

另一方面，一些党内高级干部的回忆中的确存在着“前言”所说的“几个掩盖”的现象，这种“掩盖”既是当年的主客观环境的必然，也是时代局限性，既是当年的政治需要，也是群体及个人的利益需要。但也不能说是全部如此，相当一批高级干部直至“四人帮”被打倒后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从监狱放出来，才被平反，他们基本上没有参加对干部群众的迫害与镇压。

“前言”对“党内高级干部回忆文革”在立场与态度上将他们置于对立面，在方法上采取了以偏概全、近乎全盘否定的态度，这很不好吧！起码也是一种不公正。

（二）似是而非三句话

“前言”接着说：实际上，在文革中受迫害的普通百姓比受迫害的干部要多数百倍。

恐怖的“红八月”、工作组反右、1967年的“二月镇反”、“一打三反”、清查“5·16”、“清理阶级队伍”和某些地区的集体屠杀等一系列的血腥镇压，官修文革史不是轻描淡写就是尽力歪曲。历史是胜利者写的。文革最后的胜利者是官僚集团，漠视百姓的苦难是很自然的。”

这一大段话对不对？我认为这其中的有的是“似是而非”，不仅表露了作者不正确的认识，而且还渲泄了一种不健康的情绪。

例如：1976年的十月政变以后，否定文革成了“政治正确”。

引人注目的是“前言”也用“政变”对“抓捕四人帮”作政治定性。当然这不是老杨的发明。不过从中可以看出他对“抓捕四人帮、大快人心事”这件大事在感情上及认知上的倾向。

什么叫“否定文革成了政治正确”？它当然是“政治正确”。早否定早正确，晚否定晚正确，任何时候都是“政治正确”，用不着用“成了”这种阴阳怪气的语气。

自从1976年10月“抓捕四人帮”，40多年来，官方与民间在这个问题上保持高度一致的，全都认为这一举措挽救了国家、人民和这个党，它早就是全民共识，符合民心民意的历史潮流。只有少部分人认为文革应该否定，但不能全面否定与彻底否定；也有极少数极端极左分子，主要是“四人帮”帮派分子在为“四人帮一朝覆灭”唱挽歌。

“彻底否定文革”经过了40多年的历史考验，可以是历史定论了。

“前言”一开始就说“研究文革史——要站在人类文明和现代政治文明的高度，重新认识文革”，但在具体写作中却并没有认识到文革的错误性质正是反人类、反人性的浩劫，还谈什么“人类文明和现代政治文明的高度”呢？连封建社会政治文明都够不上，“高度”固然没有，连“低度”也没有。

又如：实际上，在文革中受迫害的普通百姓比受迫害的干部要多数百倍。

进行这种数字上的“比较”太不科学了。

在绝对数字上，受迫害的普通百姓肯定要比干部多得多。因为基数不一样，普通百姓的基数起码比干部高上几十倍，比高级干部的数字更高上几千、几万倍。但是文革的主要对象仍然是“走资派”，干部们仍然是文革受冲击、受迫害的主要阶层；其次是知识分子阶层，尤其是老知识分子，他们被扣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受到残酷迫害的面积几乎是百分百。当然也有几个、十几个因为历史上与毛有一些渊源，受到特殊的指名保护。其中的代表人物如章世钊，一起受到保护的还有郭沫若、茅盾、钱学森等极少数几个人（个位数或者十位数）。即便他们在受到所谓“保护”之时，他们的身心也是饱受摧残，也是颤颤惊惊地渡过了这段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光，而且他们的亲属也并没有一并受保护，一样遭迫害；文革中受迫害严重的还有“地富反坏右”这个阶层。

在相对比例上，高级干部，老知识分子、地富反坏右这几个阶层受迫害的比例显然要比普通百姓高得多。

《天地翻覆》“第六章”写道：“据中共中央组织部统计，在文革中全国被立案审查的干部共230万人，占文化革命前1200万干部的19.2%，虽未立案审查，但被错误批斗、关押的干部和受株连的人为数更多。其中，国家机关副部长和地方副省长以上的干部被立案审查的约占同级干部总数的75%；有6万多名干部被迫害致死；集团性的冤假错案近两万件，涉及干部达几十万人。”

作者又说“一旦最高权威发出了整干部的号召，所有的干部都难逃浩劫。”“一些有名望的知识分子都受到了冲击。各级党委‘抛出’一些知识分子，受到打击更为严重。知识分子受到打击的人数和比重远远超过领导干部。”

作者在引用的这些资料并进行这样论述的时候，难道就没有意识到这已经与“前言”中的结论发生了明显的矛盾？然而却仍然不加修改。难道写文章可以如此粗心大意、随心所欲，前言不搭后语吗！

我认为文革受迫害对象是全方位的，既不能以干部受迫害掩盖某些地区的群众受镇压，也不要群众受镇压淡化干部与知识分子的受迫害，这才是正理。

再如：历史是胜利者写的。文革最后的胜利者是官僚集团，漠视百姓的苦难是很自然的。

关于这句话的错误，将在下一节作详细剖析。

四、文革的“最后胜利者”是谁？

“前言”中说：“文革最后的胜利者是官僚集团，漠视百姓的苦难是很自然的。”

“导论”中说：“不幸的是，文化大革命的最后胜利者还是官僚集团。官僚集团掌握着文化大革命责任的追究权、改革开放的主导权和改革成果的分配权。”

在《天地翻覆》全书中，“文革最后的胜利者是官僚集团”这句话有无数次重复，可见这不仅是作者立论的基点，也是作者挥之不去的心中块垒呀！

凡亲历文革的人都知道，文革语境充斥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斗争，除了极少数场合外，很少出现过“官僚集团”这个词，以“官僚集团”替代“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资产阶级司令部”，本身就已经是偷换概念了。实事求是地说这种“偷换”也并不是老杨发明的，然而却以杨继绳的《天地翻覆》一书，钱理群的“三种政治”理论达到一个“大成”。

不过话还得说回来，如果将“当官的”、“当干部的”、或“干部阶层”一律称作为“官僚集团”的话，那么“文革最后的胜利者是官僚集团”这个结论也是可以成立的，而且必然成立。

（一）文革中后期，中国社会的政治力量

让我们先简要地回顾一下文革中后期中国社会的政治力量。

中国社会历来没有足够影响力的宗教集团。

中国也没有民间政治集团（或称群众集团）。即使是文革前期曾经一度活跃的造反派

组织也从来没有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一方面它们必须依附于也必须听命于中央文革而存在，充其量，也正如他们自己所一再自我标榜的那样他们只不过是中央文革的“马前卒”。另一方面，他们从来都是散兵游勇，应时而生，应时而灭，从来没有形成过全国性的政治力量。

中国没有在野党政治势力，虽有几个民主党派，但在中国政治生活中从来都是摆设。

中国也没有独立的军事集团（或称军事官僚集团）。林彪垮台前，以林彪为首、以黄吴叶李邱为骨干的军事官僚“小圈子”曾经初具雏形，但即使是在林彪炙手可热、如日中天之时，没有毛泽东的手令林彪也调动不了一个连；林彪垮台后这个“小圈子”就土崩瓦解了，不再成为独立的力量。

中国更没有所谓的“境外敌对势力”所扶植的政治力量；也没有投靠于“帝修反”的政治力量；

所以说，在中国社会除了执政党外没有任何其它独立的政治集团。当年固然没有，即使现在也仍然是没有。

这就是说文革中后期活跃于中国政治舞台上除了官僚集团还是官僚集团，取得最终胜利的当然只能是官僚集团，遭遇最终失败的也仍然是官僚集团，只不过是不同的官僚集团。

（二）文革后期，中国社会有三种政治力量

毛说过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所以接下来要做的事就是考察一下当年在中国政治舞台上角逐“最后胜利”的究竟有哪几支政治力量？

对于我们这些过来人回答这个问题并不难，老杨当然也不难。

第一种政治力量：江青为首的“四人帮”。

这些人是文革暴发户，他们在文革中打着毛的旗号，背靠毛这棵大树，攻城掠地，经营时间已经长达近十年了，并以上海为基地。应该说这股力量已经具备了“争夺最后胜利”

的力量。只要毛还在世，文革之“势”就在“四人帮”这一边，但民心却早已不在他们这一边了。

第二种政治力量：以华国锋、汪东兴为代表的“凡是派”。

代表人物是华国锋，包括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这些人。他们不是文革暴发户，在文革中也不是靠直升飞机上来的；他们在文革初期也受到过冲击，但没有伤筋动骨；在文革中后期，得益于毛泽东对各派政治力量平衡的需要，他们成为文革中的既得利益者。华国锋已经掌握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了，汪、纪、吴、陈等也位居要津。但是他们得势时间并不长，权力不巩固，在军队、政府中缺乏基础。尤其是，所谓的“凡是派”基本上还是停留在理念上的一个“派”，而不是一个在组织上同进同退的“凡是派集团”。他们是一批不老不青的中年干部，比起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他们在群众中的威信高得多；比起打江山的老一辈，他们在群众中的威望又要差得多。

第三种政治力量：老一辈革命家们。

以邓小平为首，包括叶剑英、陈云、聂荣臻、徐向前、李先念这些人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他们是开国元老，虽然这股力量在文革中曾被整得支离破碎、七零八落，只是由于毛泽东最终并没有同意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提法，所以周恩来没有被打倒；由于周恩来的委曲求全、精心保护才没有被彻底摧毁。毛、周死后，由于以叶剑英为代表的军方力量的支持，得以重新集结在邓小平的旗号下形成了一支政治力量。

这是一支以邓小平为代表，有军政力量支持的雄厚政治力量，又由于邓小平在第三次被打倒前后的出色表现，更由于“四人帮”的利令智昏、超级愚蠢，这支力量赢得了民心与党心，1976年春天的“四五运动”显示人民对这支政治力量的拥护，同时也是对“四人帮”力量的摒弃，当然也是对毛的冒犯；但老百姓不在乎了。

杨继绳、孙怒涛这些人都喜欢在文章中搞一个“政治光谱”，我也不反对。如果按政治光谱的排列法，从左到右是四人帮、凡是派、老一辈；按民心向背则是老一辈、凡是派、四人帮。

文革最后的胜利者正是这第三种政治力量。

杨书事实上也承认正是这支力量取得了文革的最后胜利，然而却用“不幸的是”表达了他无可奈何的不满和遗憾。

而我认为，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政治力量取得最终胜利是文革的最好结果，而且没有比这更好的结果。正是这支政治力量的胜利，才是人民的胜利，才是正义的胜利，才是共产党内进步、健康、正义、务实力量的胜利。

如果以江青为首的文革暴发户获得胜利，中国将又一次出现“女主天下”的封建王朝，武则天篡夺共产党天下，说不定还会传位给“太平公主”。这样一来，与邻家三代王朝的法西斯独裁政权并无实质性的区别。

老杨愿意看到这个结果吗？我想也不会。

如果以华国锋、汪东兴为代表的文革既得利益者胜利，那么是“两个凡是”，高举红旗，继承遗志，继续批邓，继续反击右倾翻案风。除了会将经济工作提上重点，也会搞点有限的改革开放，但是“阶级斗争”这个“纲”是不会丢的，“三面红旗”这个“旗”也是不会弃的，“人民公社”这种组织形式也仍然是要保留的，仍然要搞计划经济，农村保留自留地，城市允许开“夫妻老婆店”，也可以搞点手工作坊，但雇工不能超过七个人，市场经济是绝对不会搞的，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也不行，地富反坏右这几千万的“阶级敌人”也不会被平反，政治运动还会有，改革开放的力度不会那样大，也就是搞点“三来一补”，经济发展速度更不会那么快。

老杨愿意看到这个结果吗？我想也不会。

如果江青集团胜利，难道江青集团就不是官僚集团吗？如果凡是派胜利了，难道凡是派就不是官僚集团吗？现在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的力量胜利了。文革的“最后胜利者”只能有这三种选项，而不可能有第四种。如果江青集团不是那样蠢，如果他们能团结“凡是派”，他们是有可能胜利的；同样“凡是派”如果联合江青集团，他们也不会失败得那么快。

很幸运，最后的胜利者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政治力量。

我在这里运用的是比较法与排除法，我相信理工科出身的老杨一看就会懂。

（三）“不幸的是”另有所指是什么？

不过，即使老杨看懂了这个比较法与排除法，也未必会承认自己的失误。

他有可能会作这样的辩解：我并没有说江青上台比邓小平上台好，也没有说“凡是派”就比邓小平强。

那么他的“不幸的是”一定是另有所指了，他指的是什么？他当然知道自己指的是什么？其实，我也明白他指的是什么？

他指的是“宪政”。他认为“宪政”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法宝，或者就是“根本出路”。

其实今日之下有这种想法的远不是他一个，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想法。但是这样的想法是在改革开放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才出现的，尤其是在当今社会问题丛生后才出现的想法。而在文革中后期，即使是在“打倒四人帮”后，中国社会的舆论界并没有出现“宪政”思潮，中国社会各阶层也没有出现“宪政”的群体。不能说个别人没有过这一类的想法，即使有也是零零碎碎、不成系统，也没有代表性人物，更不可能形成一股独立的政治力量去角逐文革的最后胜利。

所以所谓的“不幸的是”，其实就是“不幸的是，天上没有掉馅儿饼”，其实就是“不幸的是，没有出现能做出无米之炊的巧媳妇”。

五、“前言”对老一辈革命家的褒贬太轻率、太浅薄

“前言”对老一辈革命家的褒贬，包括对刘、周、邓等重要历史人物的褒贬未免太轻率、太浅薄。

比如说：官方文革史“美化周恩来，掩盖周恩来在文革中紧跟毛泽东搞文革的事实”。

有没有这样的事实呢？肯定是有的。但是在整个文革中，周恩来有没有抵制文革极左路线？有没有与“四人帮”作长期斗争的事实呀？当然有，而且也是大量的事实存在。

连尼克松都说：“中国如果没有 Mao.ZD 就可能不会燃起革命之火；如果没有周恩来，就会烧成灰烬。”连尼克松都能看出周恩来在文革中的正面作用，老杨难道看不出来吗？

要知道老杨和我一样是清华文革中温和造反派组织“414”的一员，我们都不回避这一点，老杨也在书中坦承“我成了老四”。但是清华“414”作为一个群体对周恩来在文革中顾全大局、相忍为国为民，当然也是为党，所作的艰难卓绝的努力有切身体会，无不动之于色，对其在文革中错误也给予同情的理解。而老杨倒好，他是“三跳出”了，就算他是跳出“派性”了，只是不知道他跳出到什么地方去了？

老实说，我当然知道他跳到什么地方去了。正如，独立学者郭建所指出的那样，当代中国研究文革的文章中存在着一种“造反派情结”。我需要补正的是：这不是一般的造反派情结，而是极左造反派的情结，看看这第五章中作者是如何肯定与赞美极端极左造反派蒯大富的那些内容，我就知道他跳到了什么地方去了。

更令人无法理解的是“前言”居然说：“这一系列的对抗主要不是正义和非正义的对抗，而是利益的对抗。”我的看法与他完全相反，这一系列对抗主要是正义与非正义的对抗，其次才是利益的对抗。

主流与支流搞不清，甚至搞拧了；将文革往前推还是向后拉搞不清，正义非正义搞不清，必然写不好文革史。

六、为什么写不好文革史？

“前言”部分除了前段引用王蒙的话，后段引用奥威尔、吴大猷的话外，中段部分约占一半。

不客气地说：而这中段部分的所有段落不是错误的，就是片面的，所反映的立场、观点

都是不正确的，连情绪都不正常。

我曾经非常热切地期望《墓碑》的作者能写出一部中国文革史，现在当我仅仅看了“前言”、“导论”及少数几章后，已经深感失望了。

“十年文革史”不是“三年饥荒史”，写得好《墓碑》不等于写得好《天地翻覆》。

“三年饥荒史”的是非对错很简单，可以说是黑白分明。《墓碑》的成功关键在于作者有几十年当记者所积累下的丰富的材料，这一点在当今中国无人能比，作者用材料说话基本上就能行。当然比材料更重要的是表达的勇气，对此，我对作者的敬佩之情至今不移。但同时我对《墓碑》一书中一些资料植入时由于粗心大意而发生的低级错误也印象深刻，记忆犹新。

而“十年文革史”远非如此，不仅需要有材料，更需要有见识；既要有现代政治的觉悟水平，也需要中国传统文化的积累；当然需要以世界的眼光看中国，但同样也需要以中国的立场看中国，也需要以历史的眼光看中国。

我要强调的是，写文革史必需要具备足够强大的逻辑思辨能力，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洞察力与穿透力。逻辑思辨绝不是狡辩，也不是为了展现机锋，而是为了“求真”，为了“以理服人”。这就必然包括两方面内容：真相与真知。所以，逻辑思辨必须建立在“秉笔直书”、“以史为鉴”的基础上。

“以史为鉴”，鉴的是什么？归根结底“鉴”的是人性。所以研撰文革史与其它史都一样，根本上仍然是坚持“以人为本”，从人的角度看历史、写历史，以不变应万变，万变而不离其宗。表面上看来，“秉笔直书”、“以史为鉴”、“以人为本”都是老祖宗几千年前就已经有了的东西，所以这些主张是“回归”。但如果在当代社会真正做好了这些“回归”，什么“三个跳出”，“两个站在”也就有了。

“前言”的后半部分引用乔治·奥威尔的话说：“当我动笔写一本书时，我不会跟自己说我要写一本完美的书。我想写它，是因为我想揭穿某种谎言，是想唤起人们注意某些事实。”然后说：“揭露谎言，还原真相，这也是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又在引用吴大猷

先生的写史要求“叙事客观，分析深入”后说：“这也是我写这本书时追求的目标，我尽可能用中性描述来还原历史本来面目。”

我并不怀疑这些名言的正确性，但我坚信“秉笔直书”、“以史为鉴”、“以人为本”比它们更正确；我也不怀疑该书作者在引用这些名言时的真诚，但我要问的是：将“历史决议”说得如此不堪，是不是在制造新谎言？是不是符合“叙事客观，分析深入”的写史原则？

诚然，“历史决议”是有很多缺点与错误的，有的缺点与错误也很明显，影响也很深远，很难说当今社会所存在的诸多社会问题就与“历史决议”的错误与缺点没关系。

诚然。“历史决议”也有其不幸，不幸的不仅仅是由于它本身的错误与缺点，更重要的是它其后的遭遇。它原本只是一个反思的起点，然而多年来的不作为，使得我们没有能从“全面、彻底否定文革”这个起点往前走下去，今日之下更是面临着一个40多年前已经被彻底否定的文革倒退的尴尬局面。

尽管如此，“历史决议”主要成功之处就是对文革这一重大的历史问题所作出的“彻底否定”的结论是完全正确的；所作的那些分析与陈述也是基本正确的。

谁也不能否认，正因为“历史决议”全面、彻底的否定了文革，才基本统一了全党全民的认识，这才有了30多年来伟大的改革开放。

七、“历史决议”的伟大意义

（一）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与“历史决议”的“彻底否定文革”是分不开的

谈到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人们总忘不了经济建设的伟大成就，综合国力的迅速提高，大国地位的确立与强化等等。

具体的成就当然有很多。

例如：曾经饿死几千万的中国人终于吃上饱饭了，饿死人的现象也没有再发生。要知道中国人吃不饱饭的历史起码也有几百年了，但是改革开放结束了这个历史。

又如：曾经在大跃进时代与文革时代两次濒临崩溃的中国经济，GDP跃居世界老二已经很多年了。

还有：已经发射并还将继续发射的神舟系列、嫦娥系列的航天器；还有我们拥有了世界上最大的三峡大坝、海拔最高的青藏铁路；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即将在年底建成通车；还有大飞机和航母辽宁号；自主知识产权的“高铁”成为“一带一路”的拳头产品，还有“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澳门平稳回归20年了，“九二共识”下两岸关系一度长足改善、和平发展；——等等、等等。

但是人们常常忘了一条，那就是以“五类分子”为统称的“阶级敌人”没有了，“反革命分子”的政治帽子没有了，不断制造形形色色新阶级敌人的大规模政治运动没有了。

“五类分子”曾经是这个人民共和国的“贱民”，他们的子女则是“准贱民”，“贱民”与“准贱民”加起来上了亿。这些人都是人，“阶级斗争”、“阶级路线”、“阶级政策”使他们变成了鬼，“改革开放”的同时他们由鬼变成了人。

人世间，悠悠事，什么最要紧？人的基本权利最要紧；什么最伟大？人的基本权利最伟大。剥夺亿万生民的基本权利，事是最残酷的事；人是最可恨的人。将人的基本权利还给亿万贱民的事才是最伟大的事，将人的基本权利还给亿万贱民的人才是最伟大的人。

在我的“价值观”中，始终认为这是“改革开放”最基本、最伟大的成就。虽然也有一些不彻底，但基本上没有明显后遗症。胡耀邦是做这件事的首倡者，邓小平则是站在胡耀邦背后的强有力的支持者。尽管有些不彻底是邓小平留下的，但是如果没有邓小平的支持这件事也办不成。有人不是喜欢讲辩证法吗，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二）“历史决议”是阻止文革翻案的定海神针

“历史决议”30多年了。30多年来，企图为文革翻案的思潮一直存在，多少次暗流涌

动，多少次一度汹涌。

什么文革虽然应该否定，但不能彻底否定；什么文革是一场独裁政治利用群众政治反对官僚政治的运动（这是清华名人杨继绳、北大名人钱理群等的共同观点）；还有什么文革的功劳与成绩，如赤脚医生，平均寿命、三线布局等；还有什么文革是当代中国仅有的民主运动，文革是一次伟大的试错（这是清华校友周泉纓的观点）等等。

尤其还有一种比较普遍的论调：对任何事物都要一分为二地看，何况对亿万人参与长达十年的文革呢？

还有一些自称为“公知”的学者们不断制造及鼓吹出一些新鲜的理论与提法，如“两种文革”、“人民文革”、“三种政治”，说白了就是寻找文革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寻找一些鸡零狗碎的东西为文革涂脂抹粉。

然而，这一切都是不会有效果的，正是因为有“历史决议”将文革定性为“十年浩劫”，各种各样的奇谈怪论及其背后的势力都无法逾越这道关。

所以我们说：“历史决议”既是“改革开放”这艘巨轮的“压仓石”，也是阻止文革翻案回潮的定海神针。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郭于华教授这样说：

“且不说文革对中国文化和国人精神世界戕害之后患无穷，仅以对人的生命的剥夺就已罪恶滔天。”“分清罪与错，善与恶，是人类的基本能力和良知，是一个社会能否前行的先决条件。面对罪恶导致的巨大灾难，我们不能视而不见，也不能一分为二。如若就这样黑白不辨，是非不分，我们将永远在混沌的泥浆中打滚，我们将永无出路。”

我不认识郭于华，但认识杨继绳，但我认为郭教授的这段话句句在理，真是一个明白人；而杨书“前言”关于“历史决议”的这部分内容几乎没有一句话是在理的，真是一个糊涂人。■

【附件】

史实的层次

胡鹏池

表面上看，“秉笔直书”似与史识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其实“秉笔直书”表达的不仅仅是史实，而是史实背后的史识（或称“史观”也可以）。有的史识很深邃，有的史识不言而喻，因为它就是常识，就是世道人情。

就拿“在齐太史简”这个原始的经典史例来说吧，公元前548年，齐崔杼弑君光，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杼杀之；其弟又书，崔杼又杀之；其次弟又书，崔杼又杀之；太史兄弟以书崔杼弑而死者三人矣，其次弟仍书，崔杼知正义之终不可磨灭，乃止不杀。

在这个经典的史例中，“史实”的表述呈现了鲜明的层次性：

- ① 公元前548年，齐国的国君死了。
- ② 公元前548年，齐国的国君死了，是被杀死的。
- ③ 公元前548年，齐国的国君死了，是被杀死的，弑君者是崔杼。

这三条都可以被认作是“史实”，前两条刻意隐瞒了有关键意义的历史真相，这就是片面的“史实”，表面上看似乎也不是“伪史”，其实仍然是不同层次的“伪史”，只有第三条“崔杼弑君”才是真正的史实，这条史实背后是不言而喻的史识：“崔杼乃乱臣贼子也”。

也正因为此，这条史实才引起了崔杼的恐惧，而太史兄弟四人前赴后继、赴汤蹈火捍卫的正是“乱臣贼子惧”的史学价值。

在分析运用“在齐太史简”的经典史例过程中，笔者感悟到一个重要的观点：

任何史实都是有层次的。

一般而言，史料在经过筛选与鉴别后，有的被鉴定为“真”，可冠以“史实”之名了；

有的被鉴定为“假”，则以“假史”、“伪史”一言以蔽之。其实在真假之间常常没有严格界限，也没有固定标准。有的史料粗看起来也是真的，但因其隐瞒了最关键的史实，你说它是真还是假呢？你可以说它是“真”，但那是“低阶之真”；也可以说它是“假”，但是“高阶之假”。

所以说史料不仅有真假之分，还有层次之细。“真史”与“假史”都有层次之分。

条分缕析、剥皮抽筋，扒拉“史实”中的层次是研史者的重要工作内容。区分真假是基本功，扒拉层次是细致活。

从某种意义上讲，只有“扒拉层次”才能扒拉历史人物的灵魂，为德厚者流光，让德薄者流鄙，这永远是研史写史的根本目的之一。

这个观点在研史时有普遍的实战意义，屡试不爽。下面举两个案例说明之。

一、“韩爱晶殴打彭德怀”案中的史实层次

(一)

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一天上午，笔者在深圳桑达大厦505室邂逅韩爱晶。闲谈中老韩说文革中他所领导的北航没有发生武斗，甚至没有打碎一块玻璃，但是也被判了15年。于是抱怨说：共产党对他不公。

北航在文革中是不是没有打碎一块玻璃？这可不敢说。但是北航没有发生大规模武斗却是大家承认的事实。在这个层面上韩爱晶讲的是事实。

但是韩所领导的“红卫兵政权”在北航有没有整死过无辜的群众呢？肯定是有的，而且不止一个，大概有七、八个。“北航红旗”这一极左造反派组织作为“中央文革”的马前卒之一在文革中做了多少坏事呢？韩也没有自省。

当然这毕竟是一次闲聊，当时我们也没有聊得那样细，老韩没有讲是可以理解的。

我当时出于排解他“想不开”的心结，对他说：可是你们斗了彭德怀。

他说：是的。

我继续开导他：彭德怀是什么人？彭德怀是共产党的开国元勋，是民间老百姓所讲的天上武曲星下凡。你们斗了彭德怀，一是得罪了共产党；二是得罪了老百姓；三是得罪了天；何罪之无？

老韩说：老胡说得也有道理啊！

（二）

在韩爱晶著《清华蒯大富》第406页有一段话：“我自己就有严重责任，辜负毛主席、周总理信任与培养。我没水平！批斗会上我还打过彭德怀元帅一耳光，给造反派抹黑！给文化革命抹黑，给毛主席革命路线抹黑。”

韩说他打了彭德怀一耳光，我们可以相信他只打了一耳光没有打第二下，因为迄今为止并没有人爆料他打过两下或多下；

韩说他打了彭德怀耳光，我们也可以相信他除了打耳光外没有额外施拳脚或动棍棒，因为迄今为止没有人爆料过他动过拳脚与棍棒。

表面上看，韩爱晶承认了“打彭德怀一个耳光”的史实，而且承认得很畅快，并没有吞吞吐吐、结结巴巴。

实际上，韩爱晶承认“我还打过彭德怀元帅一耳光”与“公元前548年，齐国国君死了”都只是“史实”的第一层次，属于隐瞒关键历史真相的“伪史”。

史实的第二层次是：在这次内部小型批斗会上，参加者有内部骨干30多人，彭德怀被打翻在地好多次，被打断肋骨两根。韩爱晶自始至终参加了这次会，虽然他不是公开的主持人。

迄今为止并没有见到他在幕后是如何策划与决策的爆料，但作为“北航红旗”一把手，这样的会没有他的同意是根本不可能召开的。而且所有的“打手”都是韩的手下人，打手

们对彭德怀的一切暴行都是在韩的眼皮子底下发生的，韩出席并参与了殴打，并没有采取反对与制止的态度，所以韩爱晶应对会上发生的一切暴行承担领导责任及参与责任也是不言而喻的。

接着，还应当考察一下在韩出手前彭德怀的肋骨有没有被打断？由于没有发现有什么资料能说清这件事，所以只能推理。很显然，在韩出手前彭德怀的肋骨还没有被打断。因为如果已经断了，批斗就可能停止，就有可能将彭德怀紧急送医院。正是在韩亲自动手打了那历史性的一耳光后，打手们受到鼓舞更疯狂，最终打断了彭德怀的两根肋骨。

这才是第三层次的史实，与“公元前548年，崔杼弑君”是同一层次的。

这条真正的史实背后包含的不言而喻的结论是：韩爱晶不仅是“彭德怀被打断两根肋骨，受重伤”事件的领导者与策划者，而且其本人就是凶手之一、刑事犯。

二、戚本禹诬陷田家英一案中的史实层次

文革后，田家英得以平反昭雪。

每当人们揭露批判戚本禹文革中在“田家英命案”中落井下石、无耻诬陷的表现时，戚往往装无辜，谈田家英对他的恩惠以及他对田家英的感恩。

他说：我们两人有多年的交往。我从1950年进中南海起，就在他领导下工作，他很器重我，政治上、生活上都帮助过我。1957年“反右”时，我被中央直属机关党委打成反党集团为首者，他与我们共患难。此案在毛泽东的干预下彻底平反，这就是闻名全党的“八司马案”。

戚本禹的这段话为大家设置了一套逻辑：你们看啊！田对我是有恩之人，我对田始终是感恩的，我怎么会落井下石、构陷田家英呢？

这套逻辑符合世间人情，许多人也是这样认识问题的。笔者曾与一位认识戚本禹的文革老人谈过此事，这位老人为人正派，但他也是按照这套逻辑为戚辩护的。

戚的这段话，是不是史实呢？确实是史实，田戚之间确实存在过亦师亦友的关系。

然而这却只是一半的事实，或事实的一半。在两人完整的双边关系中。田对戚不仅有提携有帮助，但同时也有批评与阻击，而且是很严重的批评，很严重的狙击。前期有，后期也有。

例 1：戚与逢先知是一前一后被田家英纳于门下的。从时间上戚还在逢之前，从文化水平、工作能力上戚也略高于逢。但是田信用逢胜过戚。下乡调查时田总是将逢带在身边；临时离开农村去向中央汇报，田也是带着逢而将戚留在那里一个人包一个队。这是引起戚对田由嫉生恨的最早原因之一。

就像鬼谷子的两个徒弟孙臆与庞涓，大家都是同门师兄弟，凭什么鬼谷子将兵法传给师兄不传给我呀？庞涓始终不会明白自己虽然聪明能干，但人品不好、野心太大，所以鬼谷子对庞涓这个学生是有保留的。

例 2、戚写《评李秀成自述》一文本来就是一块敲门砖，遭到史学界的一致反对，反对的队伍中也包括田家英。而且田的反对旗帜鲜明的，曾经说：“这样的文章打死我也不会写”，甚至嘱咐有关杂志不要登戚的这篇文章。

这样一来，戚本禹对田家英的“仇”就结大了。

戚本禹虽然有点才华，但本质上是一个小人。凡得志的小人都会有些歪门邪道的才华。戚小人得志而成奸佞，而且还不是一般的，而是极品小人与奸佞，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戚本禹这类小人可与竖刁、易牙、开方这类阉竖式的小人与奸佞同类同列同宗。

在文革这样道德沦丧，沉渣泛起的政治运动中，戚幸得圣上垂青，得以有兴风作浪的权力与机会，他对田家英是报恩还是报仇呢？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报仇。■

【评杨书】

吴法宪的这个说法能采信吗？

刘建业（澳大利亚）

《天翻地覆》写到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时引用吴法宪的一段话：“军队及地方的一些人，一直在林彪那里‘烧火’。鼓动林彪出来讲话，以维护毛泽东的威信。”“这些人当中有陶铸、罗瑞卿、刘亚楼等，林彪起初很犹豫，不愿意讲，最后包括军委的一些领导也怂恿林彪出来讲话。”¹

笔者认为，这则史料有点问题：

1. 不是第一手资料。吴法宪承认：他“不是主席团成员，很多情况不知道。”“我所知道的一些内部消息，都是刘亚楼告诉我的。”²

2. 这是一条孤证。除了吴法宪自己，没有人能够证明刘亚楼曾经对吴说过这样的话。而刘亚楼已于文革前夕病逝，“死无对证”。

3. 林彪的这个讲话，是否是“军队及地方的一些人”“鼓动”和“怂恿”的结果？

对七千人大会深有研究，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张素华是这样写的：

“1月27日，刘少奇在大会讲话。林彪坐在主席台上，倾听着刘少奇那坦诚尖锐的讲话，外表上虽不露声色，内心里正在揣摩自己的应该怎么讲... ..林彪知道，‘大跃进’运动是毛泽东发动起来的，会上批评的不少错误的决策都是毛泽东提出或支持的，毛泽东的内心深处一定很不好过。这个时候，倘若有人站出来为他说话，一定会得到毛泽东的青睐，或许还会被视为知己。有了这样的考虑，林彪胸有成竹，就知道自己应该讲些什么内容了。于是林彪做出个决定，把写作班子为他准备好的现成的讲话稿也丢在一边，根据他

¹《天翻地覆》电子版 第一章，第16页。

²吴法宪：《岁月艰难》第546-547页（香港）北星出版社 2006年9月第一版。

最新的观察、体会，自己“拉条子”，写提纲，在大会上即兴发表讲话。”¹“林彪要讲的话，确实是无人能够事先为他起草的，因为那完全是一个别有用心的讲话。”²

事实上，林彪讲话并不是吴法宪所言的“军队及地方的一些人”的“鼓动”和“怂恿”，而是“这次会前，毛泽东曾布置中央常委都要在会上讲一讲”。³

中央常委中除了陈云以坚持“在做调查”，“没有把握”为由谢绝之外，其他人都讲了。因为没讲话，陈云还在文革中挨了批。⁴仅此一点，吴法宪说法的可靠性就要大打折扣。

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被认为是文革的一个起点，是唯一一次对毛有所批评，让毛“憋了一口气”的会议。在舆论汹汹，毛泽东受到很大压力之际，林彪挺身“护主”，竭力为毛辩护，是林彪的一个大历史污点。吴法宪用这条无人能够证明、而且还是听说的“史料”，为林彪开脱，就其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立场可以理解。但作为严肃的《天翻地覆》不加分析地引用，就有些不妥了。■

【读书】

字里行间的反思

——一位思想者的《回首文革》批注

途客

2015年春天，我在人民大学书摊上发现了这本《回首文革》。它收录了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一些文章，包括理论界、学术界的回忆与反思。一定程度上看，这些文字代表了当年反思文革的最高水平。但时至今日，很多观点已经明显陈旧。

¹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6月 电子版（PDF），第130页。

²同上。

³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6月 电子版（PDF），第202页。

⁴1968年10月17日，在“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第一小组会上，谢富治说：“我们回想一下，陈云同志在七千人大会上，主席三次叫他发言，他说没调查没发言权，后来不到一个月做了个黑报告反主席、反大跃进、反总路线。”中央“两案”审理领导小组提供：“康生、江青、文元、富治同志十七日在第一组小组会上的重要插话要点（记录稿）”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602f7d001014r1n.html)

我之所以将它买下，是因为先前的阅读者在书页中留下大量批注。这些批注内容丰赡，且不乏深刻见解。两年后再翻阅，我意识到，将这些丰富、零散的批注整理成文，可以更好地反映这位思想者的文革感悟。我也相信，他十多年前的思考，对时下学界的文革研究仍会有所启迪。这不禁令人感慨，历史发展充满了偶然，历史写作又何尝不依赖机缘。

除了身份考辩一节，我尽可能减少个人观点的掺入。一方面，由于个人学识所限，且长期着眼于农民记忆，故对高层，尤其文革时段的高层政治难有深入见解；另一方面，也是出于保存史料原始性考虑，尽可能减少后来者的价值干预。即便只是琐碎的史料整理，若可为领域方家提供思考，也是令人极感欣慰的。

一、关于批注者的身份考辩

批注者留下了大量的文革思考，可唯独没有留下自己的名字。我曾引以为憾，后来发现，这倒为我留下了探秘的空间。

扉页两段文字，记载了批注者与此书结缘的经过，他写道：



人世间的许多现象，往往都不是科学和人的通常智慧可以解释的，人每天的行为和不期而至的选择与机遇，几乎是任何人都说不清楚的，很神秘！为什么？不知道。一些天大的历史转机，和某些突然来临的重大启示，就在偶然机遇的一瞬间发生，是天意？！不知道。这很奇怪。

今天，本来是要到高法去索款，天色稍晚，路上有些犹豫。等骑车到隆福广场时，忽见有一书摊，又想到身上带的钱不多，如法院要手续费，可能不够。故索性改变主意，下

车浏览一下这些杂书。不期中，看到此书，一翻目录，有关文革发生的历史原因有多文。此正是我解决的问题。我也正想看看这些“时代能人”对此怎样思考和思虑到什么程度了。一看很可笑，但他们却提供了他们所能提供的全部材料。这正是这本书的真正价值所在。

2004年2月10日

从“时代能人”、“一看很可笑”的字眼中，可以看出批注者在思想层面与中共体制保持了一定距离。这一点，从他对文章的点评即可窥见。应当看到，《回首文革》收录的文章，有流于空泛的理论写作，有抽丝剥茧的学术探究，也有当事人极尽周详的亲历回忆。因此，批注者对不同文章的评价差异很大。点评中既有“重点文章”、“真实可读”的正面肯定，也有“胡诌”、“马屁文字”、“反动之极”的尖锐批判，甚至偶尔可见“可怜虫”、“哈巴狗”等文字嘲讽。由此推断，批注者性情直率，爱憎分明。当然，这并不是说他对人、文的评价充满了意气甚至戾气。细细考究发现，他的点评没有完全的肯定和绝对的否定，常常是整体肯定中掺杂零星批判，整体否定中不乏些许褒扬。而且，对同一作者的不同文章，批注者的评价很可能截然不同。这反映出，批注者的评论更多基于自己对历史的思考，而不是基于对不同人物的个人成见。

同时，批注者对历史中的人物也具备同情的理解，典型一点体现在他对毛泽东的评价上。整体而言，他对毛持严厉批判态度，斥其祸国殃民，以假革命摧毁真革命。但他在点评1969年珍宝岛战役时，对毛一石二鸟的谋略极为赞赏。1975年，毛泽东做眼部手术，批注者不无感慨：人生何必自寻苦，百年之后各千秋。人要豁达方自由，毛公太累了。从这些评论可以看出，批注者不仅具备深厚的思想，而且具备了难得包容的学养。

尽管批注者在思想层面与中共保持距离，但他的言行似乎可以对政党的某些政策做出影响。之所以这样推断，因为他留下了这样的文字信息：

半工半学、半农半学的政策，是我因当时经济严重困难，家庭无力使儿童得到正常教

育，这将影响中国未来社会发展，为此而提出来的革命政策。同时，这也是想通过国家财政，逐渐改变资产阶级法权消极作用的一个方法。但不幸的是，这一积极的政策措施，却被中共用来变成欺骗宣传的一种手段，最后演变成五七干校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即变成了处理社会问题的消极武器。一个好的方法，到了中共手里，却变成了惩罚手段。

1964年，中共对劳动政策、教育政策做出尝试性调整，批注者的建议大概是这个时段提出来的。由此我们可以推测，批注者可能在中共体制内担任某种重要职位。当然，更大可能，他是文化界、教育界具有影响力的人物，这种影响甚至超出文化、教育界，一定程度上可以影响高层的决策制定。无论身份如何，其济世救民的情怀当是毋庸置疑。

从批注中看到，他对中国教育事业比较关注，且对北京的高等学府颇有了解。比如他还写道：1963年4月12日事件爆发后，因该案件挖掉了反动政权的根基，统治政治集团惊魂出壳，立即组织了全北京市所有高等学校进行政治警告，不准受其影响。这其中，北大是重点中的关键学校。批注者对北大怀有较好感情，而对清华、人大则不乏鄙视。他对人大的鄙视，通过批判某些作者表现出来，他斥责他们的历史书写如同人大学生的“作业”，“这也算是他们所有的学问了”。而对清华的鄙视，则通过对胡乔木的评价看出：

禁锢的从一而终的思维模式，只能使他（笔者注：指胡乔木）是个铁杆反历史人物。除此之外，不可能有更好的评价。据说，他还是老北大的学生。但从他做人、议事、思维方式和评估世事的原则上看，他不是。或许是个清华派吧。

由此可知，批注者是一位极具人文情怀的人。在权力高度集中的时代，独立思考者往往因言获罪。批注者恰恰有过被捕入狱的经历。

在点评“四清”运动时，他透露一年前自己被捕入狱，由此判断，其入狱时间大约为1962年。他为何被捕入狱？文字中没有透露任何相关信息。他因为学识丰厚，在监狱中一

度受过重用，当然，这种重用也是赶在了特殊时期。他透露，1963年中苏论战期间，监狱曾要他写一写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解释。这是特殊时期的“立功赎罪”机会，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思想、学养是具备一定社会影响力的，甚至偶尔能获得实用主义的政党认可。

他还写道，1963年中苏论战期间，监狱让他做过对苏联“宫廷政变”的论述与分析。¹这次政变过后，中共一度对继任的勃列日涅夫抱有期望，派周恩来、贺龙率队赴苏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庆祝活动。这次活动中，发生了大家非常熟悉的插曲，马林诺夫斯基对贺龙说：“我们现在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应该效仿我们的榜样，把毛泽东也搞下台去。这样我们就能和好。”贺龙当场抗议，随即周恩来提出严厉质问。批注者认为，从此毛泽东不会饶过贺龙，周恩来也会因此失去信任，“质问”、“抗议”，周、贺可能都是真诚的，但毛会把这一切看做演戏，这是必然的。这就是封建政治的必然结果。

1962年被捕入狱，思想成熟，且具备影响力，按理说此时他起码也该30多岁。据此可以大体推断批注者的出生年份，他应当在1930年左右出生，更有可能是1930年之前。

批注者还留下一条信息。他说1964、1965年，自己活动和建立组织的地方是北京双桥公社咸宁侯大队。这个时候，他仍在监狱接受改造？抑或释放出狱，回到原本工作生活的地方？笔者一时难以判断。前文中他“半工半学”、“半农半学”的提议时间，以及分析苏联“宫廷政变”的时间，都给我带来难以梳理的时间错乱，这里面很可能包含了批注者本身的记忆错误。而从他对文革极为深刻的观察中，大约可以推测，他在狱中接受改造的时间并不长，应是亲身经历了文革动乱的人。如此说来，1965年大概是他获释出狱的时间节点。

根据以上零散信息，我们大致可以判断，批注者1930年前出生，大概是中国教育界、文化界具有影响力的人物。他思想深刻，极具情怀。1962年左右可能因言获罪，在狱中接受了短时间的改造。他说监狱必然是社会矛盾斗争激烈时最敏感的社会问题焦点所在。由

¹ 此处宫廷政变，指1964年10月16日赫鲁晓夫被勃列日涅夫赶下台。故时间上存在出入，估计批注者是在1964年做了论述，而非1963年。

此可以推测，接受改造的经历并没有扼杀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反而使他更深入地思考中国社会的各种问题。被捕的经历大概会影响他对中共体制的评价态度，这从不无尖锐的批注点评中可见一二。但毫无疑问，个人情感的奔放并没有削弱他的思考深度。

2004年2月10日，他开始翻阅这本书籍。70多岁的年龄，加上文革结束20多年的隔代冷却，都使他的思考进入了更加厚重的境界。孔子所谓“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大概说的就是这种思考状态吧！

二、对意识形态起源的思考

中共执政后，一系列政治运动的发展，透露了毛泽东规划中国社会的某些理念。追溯其思想根源，很明显的一点，毛泽东仍然沿用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理念。当然，这个过程中，中共也在尝试摆脱苏联模式束缚，逐渐与中国自身的现实情况相结合。毛泽东关于规划中国社会的理念，从《五七指示》中大约可以窥见一二。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给林彪写了一封信，通常被称为《五七指示》。《指示》描述了未来社会的大致轮廓：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是“迫使人们奴隶般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的社会和“个人全面发展”的社会。¹毛泽东根据这个目标要求各行各业、各个单位都要办成大学校，每个大学校都要一业为主，兼营它业。它的发展前景是，每个单位都有工，有农，有学，有兵，从而可以自成体系，自给自足，变成不依赖外界的“小社会”。这样，社会各行业之间的专业区别将逐步消失。

批注者认为，中共意识形态根源本身就存在严重问题，所以他对中共规划社会的作为不以为然。他说：

从查阅历史文献和对马克思学术经历分析来看，马克思个人既对人类历史没有下足真

¹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2页。

功夫（他颠沛流离的政治生涯也不允许有此功夫），对社会学和哲学更没有真正有价值的知识。他想改变人间苦难，同情不幸的劳苦大众，但结果相反。他脑子里是空的，要他用分析、推理、证明的方法说明未来社会，只能走向谬误和空泛。马克思的社会思想，主观愿望是善良的，客观上既没有社会学基础，又没有经济学基础。所以，只能是一个害人的幻想。

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局部是可用的，有实际价值的。总体上则是幻想的，是错误的，是不真实的。这也暴露了他在学问和思考能力上的缺陷。它给人类带来的是空前的残酷和一连串的大悲剧，并把人类推向了核战毁灭的边缘。

毛泽东自己也没有必要的最起码的广博的学术基础，更没有可能对未来社会做出清楚而合理的判断。所以，这一百多年极其混乱而又悲剧丛生的历史，都来源于无知和强暴的欲望。这是整个人类的不幸。

关于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法权”问题，批注者说：

注意，在1875年，马克思已是57岁，就是说他已经对自己的所谓学说理论作了完整的思考。而这里所产生的问题，也正是他对面临问题表述不清，即陷入混乱的一个明显特征。

证明一：未来社会中，不可能有“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公平分配”、“平等权利”。他举例说，老人和小孩和每个人不可能是一切平等的。¹这纯属无聊的饶舌。这里，在社会学的含义上，分析社会平等问题时，用老人与孩子及社会各个人不可能平等作为理论说明的例子，根本不能说明任何问题。这只能证明马克思在理论上的无能和浅薄。对拉萨尔对未来社会的无知和武断，不能用“机会主义”一语搪塞了事。²应做的是真正理论分析和说明。用“权威大棒”打人，又有什么用呢？！

¹ 《回首文革》，张化、苏采青主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年，第111页。

² 同上，第111页。

证明二：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用等量劳动交换价值等量的商品市场原则，在对历史说，是对封建社会贵族政治特权的反抗，是抵御和消灭贵族特权的一种社会武器，它的历史进步意义正在于此。商品的平等，是资产阶级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生命。这也是资本主义社会进入人类历史的主要特征。在对人类社会进步的公正涵义来说，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平等原则，它的平等，即所谓资产阶级权利（即“法权”），则是以不平等为前提和基础的。所以，这种平等是形式的平等。它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典型特征。但它都是人类进入有阶级社会以来共同具有的历史内容。资本主义社会把它普遍化、典型化了。

要改变和消灭这一不符合人类理想的社会现象，前提是要有一个良好的公正的未来的社会基础。对于确实有民主社会基础或历史的民主倾向的资本主义国家，可以通过扩大民主，缩小经济利益差别的社会建树和增加税收的社会民主分配，来削弱和减少不平等、不公正的资产阶级法权现象。对于没有民主、政治独裁、经济垄断，用官僚权力加强社会经济严重两极分化的国家，资产阶级法权正是他们的护身符。它只会无限加强自己的存在，与人类理想对抗。对于这种国家来说，资产阶级法权就是灾难，马克思所谓保留它的不平等形式，正是掩盖和加强不平等各种罪恶的护身符。所以，在这里马克思的理论是反人类的。

证明三：由于马克思对于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确实存在的各种弊病和罪恶的观察、思考和分析，对于商品平等原则虚伪的考察，也由于他本人的人生道路坎坷与痛苦，使他对资本主义社会极端憎恨，加上他个人浮躁而且暴戾的天生秉性，使他极欲立即消灭这个让人愤恨不堪的社会。这使他获得了一切被这个社会制度残酷剥削、压迫的人群的广泛赞扬与支持，一是备受痛苦的产业无产阶级，一是深受屈辱的各种知识分子。这就是后来形成时代思潮和世界性运动的来源。按当时的这种思想特征，马克思，尤其是列宁，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社会没有生存和改良的余地，它必须灭亡，然后把它在理论上说成是必然灭亡的社会。对还是不对呢？时至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冷静分析当今社会的实情，是它改善了人

类社会生存的状况，它在实现着许多当作社会主义理想的历史内容，相对来用暴力革命消灭这个社会人类需要付出的代价来说，实现政治民主和减少经济危困所付出的代价都要小得多。

另一方面，这也正是人类悲剧的来源，马克思在作上述论断的同时，他对于建立“未来社会”，都是一个似是而非的，实际上是非常模糊的东西。这种现象的真正原因是，马克思在青年时代，就已经先入为主的确定了自己并不清楚的一种社会思想，它不仅空洞而且充满了许多谬误。他不懂得人类历史的实质，更不明白人类社会的哲学基础究竟是什么！他急功近利地用一个商品尺度来观察社会的一切。并用他分析社会商品的历史作用和设想消灭商品来设想应有的未来社会结构形式。这是马克思先天病态的理论导致的历史悲剧。他武断，而又理论不足，后来的政治投机分子利用马克思，这倒不能完全看成是马克思的责任，这是两码事。

从国际形势变化来看，自1957年中苏蜜月结束后，两国、两党关系就逐渐呈现紧张态势。中苏关系紧张，其原因复杂，一个重要原因是毛泽东争夺共产主义阵营领导权的意图。为此，两国展开了意识形态领域的论战。毛泽东斥责赫鲁晓夫执行“修正主义”路线，并在1963年进行了影响深远的中苏论战。研究这段历史的国内外学者，往往视“反修防修”为毛泽东发动“四清”及后期文革的重要原因，这意味着，毛泽东旨在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纯洁性。

批注者认为毛泽东的“修正主义”理论成分复杂，其思想深处有两个根据：

一个是可以公开讲的，似乎是“名正言顺”的根据，即所谓的“修正主义”。要注意，这里所指的修正主义，不是列宁针对卡尔·考茨基和后来伯恩斯坦（笔者注：部分文字不清晰）关于无产阶级革命需要什么社会历史基础才有可能的修正主义内容，而是当时由铁托和后来的赫鲁晓夫所试行的那种现实的改良政策。这同时也必然是对斯大林反动政治、经济政策的修订。这当然也包括和毛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一些潜在的

思想维护。

当时的这种修正主义主要有两点内容：第一，放弃已经证明对自己极其不利的自我封闭政策，在经济技术领域向西方开放。与此同时，暗暗放弃对西方实行暴力革命的政治主张，承认西方议会斗争可以实现共产党政治意图（实际上是放弃这种不能实现的意图）。第二，对共产党政权国家内部，稍稍放弃经济垄断，实行极有限的经济私有化或民主化，改变趋向死亡的垄断经济状态。同时，活跃国家政治民主生活。

本来，这种所谓修正主义，在当时国际国内实际情况下，是唯一可行而且是有益的政策，但对于满脑子都是假、大、空邪恶思想的僵死派，却被看成是势不两立的敌人，是不可饶恕的罪恶主张。不幸的是，当时的中共中央，还不具备这种思想，还没有具有这种清醒认识的修正主义力量。毛与刘的矛盾，还仅仅是在政权利益中，即究竟谁为老大的问题。这充分说明了一个农民政权只能思想狭隘。

毛还有一个不能讲的思想根据，即中共的革命，本质上只是个农民革命，无论是社会基础、组党成分和实际主导思想，它都不是自己标榜的所谓革命无产阶级，这是理论造假，是名义盗窃行为。这时要补课，也就只能是人为地进行。而这时又正好遇上了现实的矛盾，并且非常尖锐。应该承认，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现实中，毛都没有足够的能力和准备去处理它。这就使文革成了一场无法理解的解释不清的闹剧。

三、权力斗争分析：暮年残雪畏朝阳

1965年底到1966年8月8日八届十一中全会，可以说这是文革发动的准备阶段。批注者认为，这之间的所有曲折迂回，都是毛泽东惯用的一种策略，即欲擒故纵，使对方完全被动。

1966年《二月提纲》的起草，是这段准备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曲折。吴冷西在回忆起草时谈道：“后来才知道，差不多与此同时，江青受林彪的委托，在上海起草彻底搞掉所谓

文艺黑线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个《纪要》在4月初中央批发全党之前经毛主席看过。而毛主席在这之前，在《二月提纲》之前，1965年12月在杭州同陈伯达等谈话时就说，姚文元文章没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这些情况，不仅我们，而且连中央其他领导同志都被蒙在鼓里。《人民日报》还是按照《二月提纲》的精神组织学术讨论，凡是涉及庐山会议的文章都被删改或不发。”

1

批注者说：毛老谋深算，他一切都佯作不知，目的是使对方暴露。暴露后亦不立即反对，造成不冲突的假象。然后突然进攻，使对方措手不及，完全被动，节节挨打。而删掉庐山会议的文章，可谓正中毛的下怀，说有鬼，鬼就来了！

《二月提纲》发出以后，紧张局势一度恢复了表面稳定和平静，学术批判重新按照《二月提纲》安排的“正轨”运转。批注者言：这一切，正好使毛泽东把目光转向中央，他不能不把攻击矛头暗暗转向身边手握重权的这批人。而这种“修订”做法，却正被刘、周、邓看成是正确的方向。在社教《二十三条》和《二月提纲》中，刘、邓认定的方向和性质越是肯定和明确坚持，在当时（直到今天）不能为世人所知的那个历史秘密因素作用下，毛泽东就愈加怀疑刘、邓是险恶的敌人。而且遍地都是他们的党徒，因此，必须除掉这些心腹大患。

龚育之先生同样回忆了《二月提纲》的起草经历。批注者对这篇文章的价值给予肯定²。他认为文章可以帮助自己分析当时的社会灵魂，以及与之相关的各种情况、趋势。为此他写了很长的批语：

从所有这些被动的反映分析，第一，所有在毛泽东麾下的这些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巨将”，没有一个有能力认识到当时毛的主导思想是什么，他的潜意识里的方向、内容是什么。所谓“罢官”、庐山会议等等，仅仅是些表面现象。这些不足以构成后来历史

¹ 同上，第284页。

² 同上，第289页。

风潮发生的原因。和历史相比，这课题太渺小了。本文正是在这个狭小的思想圈子里反映历史。《二月提纲》只不过是前面问题的应对而已。但它的历史作用却像天塌地陷。正是它的出现，坚定了毛在历史秘密意识的作用下做出超乎当时一切人意料的“惊世决定”，而且是极大地冒险。

毛这个做法，在实质上是出于可怕的恐惧，和孤注一掷而且别无选择的大冒险。正是当时这一微妙现象（因为无法公开秘密及这个秘密的可怕内容，所以微妙），迫使毛泽东认定当时现实中，已经广泛存在着二重政权，有表面的和实际的两个政府。更可怕的是，他所建造的这个政权，按照他所标榜的名义，在理论上是不存在的，是应该被消灭的。这个政权失去了历史的和理论的根基。而当时的社会现实又恰好提供了铁的大量证据。因此，理论与现实相结合，使毛已经无路可走。正因如此，文革初期才连篇累牍地大喊“变则存，不变则亡！”“他们打进来，拉出去，少则几年，多则几十年，我的国家就会变颜色，我们的党就会变成法西斯党！”（这是贼喊捉贼的叫喊）当然，这在《二月提纲》时，还是后话。

第二，毛对艺术界的震怒，不单纯是对那些讽刺、挖苦、影射的文人群的不满。一个潜在因素是，他们因为文党作风的文霸们（笔者注：原文如此），把一批文人青年逼上了造反的道路，而其中居然有划时代的杰出人物。竟然由于挖掘历史，发现了历史大骗局，迫使毛泽东一生事业全部破产，处于灭亡的前夜。这也正是毛泽东不惜一切代价，做出文革假革命冒险的真正原因。

《二月提纲》公布的同时，江青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座谈会。二月下旬，会议产生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山雨欲来风满楼，政治形势处于更加微妙、严峻的时刻。在这之前，江青先是找罗瑞卿商量开座谈会，被罗拒绝。罗被打倒后，江青转而找林彪商量此事。刘志坚在回忆文章中提到，这次会议实际是江青“一人谈”的座谈会，表达了对文艺界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洋人死人等文艺黑线的不满。由

于不准做会议记录，刘志坚等人在会后根据记忆，零散拼凑了一篇《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江青接到纪要后，很不满意，令人作了诸多改动。其中一点改动是将有“江青同志的意见”的地方，改为参加“座谈会”的同志的“认识”或“座谈会”的成果。刘志坚认为，这显然是借解放军的口来表达江青自己的思想。稿子改完后传给毛泽东审阅，毛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修改。重要的改动在于，标题加上了“林彪同志委托“六个字，改成“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¹

对此，批注者说：江青召开文艺座谈会不仅是有备而来，立场、观点十分明确，而且是授意而来，双方营垒赫然而立。江青仅仅是个影子，纪要反应的是毛泽东的思想和策略。此事专找军队，也是意图明确的。

关于毛泽东对纪要的颇多改动，批注者认为毛在玩弄隐身术。他说：从以上修文和文字含义的改动来看，毛是隐芒藏锋的。虽然毛泽东盛名高位，但实权分散，仍不能一家独唱。另外，修文趋向，是着重社会效应，他对旧时代文化积习是不满的。反之，这一特点客观上反映出当时整体社会趋向，是当权人物（群）很欣赏历来的旧文化传统。这其中，透射出意识走向的对立。这一切都是毛泽东精心策划的迂回的文字围剿战略，先在意识形态和社会精神走向上，使对方完全处于被动地位。这是大风暴来临的前夜。

批注者同时对毛泽东的性格进行了分析：毛泽东本人具有人格上的二重性，一方面，潜意识里他有极浓重的封建帝王思想，他的群体也都有同一潜意识；另一方面，他又有代表社会底层抗争的英雄主义思想。而后者，在实质上却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变相封建帝王思想。所以，他立意反对历史上的一切帝王及其成就，同时，又刻意要成为历史上唯一的第一个人。

1966年8月8日，中共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指导文革的纲领性文件《十六条》。实际上，这个文件并没有明确提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政治蓝图。批注者认为毛泽东发动的

¹ 同上，第321—350页。

文革压根儿就没有什么政治蓝图。

关于这次会议，有作者总结了一些历史教训。论者认为这次错误的发生，除了毛泽东“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的阴谋活动外，全党也有责任。这种责任主要在于文革十年间，对毛泽东在阶级斗争和个人专断上发展的越来越严重的错误，对林彪、康生等人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毛泽东错误的活动，没有采取措施进行纠正和制止，以至于“一言堂”、“一边倒”现象逐步滋长。¹

批注者对此评价：确切说，这个总结是错误的。第一，假定抵制增强，并且有效，结果必然是矛盾空前激化。而且作为矛盾的一方，毛泽东从名义到组织，都还是有决定力量的方面。而且他又有可以利用的尖锐社会矛盾这一事实。刘邓只能是在武装冲突中败得更惨。不要忘记，军权在毛的手里，又有林彪相助，胜败不言而喻。第二，文革是否发生，关键不是中共内部是否能够节制，这是舍本求末的思维程序。根本问题，是中国社会现状是否面临非改变不可的威胁。是否是：变则存，不变则亡（指中共自身）。如果是，那么所谓组织机构扼制毛的作为，不仅是无效的，而且是愚蠢的。因为毛的真正目的，是企图利用这种偷天换日的佞巧伎俩，使陷入严重危机中的政权，通过瞒天过海的方式渡过难关。毛想一石二鸟，既打内，又打外，以内为饵，捕杀洪水猛兽，这是真目的。

随着文革激起了举国革命热情，毛泽东本身也时刻处在骑虎难下的位置上。1968年4月，他在语录中谈到文革的性质，说这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²批注者认为：所谓政治大革命是假的，把走资派归结为国民党反动派，更是混淆视听、掩人耳目的做法。

林彪、四人帮及所谓“走资派”，都是毛泽东的工具。中央文革小组，本质上也是被

¹ 同上，第698页。

² 同上，第105页。

利用的工具，他们的悲剧就在于没有人认识到这一点。走资派、中央文革，都是毛用来为他自己服务的。

毛泽东企图用新派控制旧派人，不足用。林彪事件后，毛势微，周又病入膏肓，只好再启用旧派人。这是毛泽东出于无奈的结果。这时，他想利用新旧两派互相牵制，他可从中起平衡作用。不料，事与愿违，这埋下了旧派反攻报复，东山再起的机会。加上新派的无能，全局迅速瓦解。1974年后的毛泽东，已是“暮年残雪畏朝阳，但求宁静以苟安”的状态了。

1974年12月23日，周恩来、王洪文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毛泽东告诫王洪文不要搞四人帮。毛泽东还高度评价了邓小平，认为他人才难得，柔中有刚。¹批注者言：在死亡中重生，双双得救。晚年毛泽东见文革大势已去，自己实际上进退失据。在此条件下，只有顺从大势，重新向他反对的一派人靠拢，以保自己的后世名利。他把江青等人当成了保他自己的一个牺牲品。江青等人也确实不具备管理国家的知识和能力。

封建帝王独霸自尊的思想，是历代农民和地主揭竿起义时的共同特点，毛泽东更是这一思想特点的产物。所谓马克思主义、民主主义，只是适应时代，蒙蔽世人耳目的一种手段，他是封建帝王思想的真实和冒充时代思想的虚假二者结合的政治混血儿。

四、社会矛盾分析：假革命压制真革命

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人提出中国的文革有两个，一个是上层的，一个是下层的。前者是权力斗争，后者是群众利用文革之机反官僚、反特权，争取自己的利益。批注者的观点显然认同这一论述，他在分析高层权争的同时，也从社会矛盾的角度进行了更为深刻的分析。从这个角度来看，批注者将文革视作假革命镇压真革命，可谓振聋发聩。

他说：民众打走资派，为什么那么狠？！因为他们比地主老财更可恶！这的确是文革

¹ 同上，第1119页。

在全国轰轰烈烈的基础。这足以证明，文革的起因并不是（或不单纯是）统治集团内部恩怨和权力争夺，文革是有广泛而又深刻的社会背景。群众把反对所谓走资派、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文化大革命”，当作反对官僚主义压迫、铲除官僚特权、争取平等公正的理想社会的斗争。而毛泽东是在发现这个非常危险而又无法解决的尖锐矛盾之后，对这一政治形势进行投机，这才是他发动这场运动的真正原因。而另一方面看，没有极其严重，影响极为广泛的激烈社会矛盾，就不会有文革的轰轰烈烈波澜壮阔场面。

在文革不同时期，群众运动冲击的对象是各不相同的。运动初期，领导层和知识分子处境就很不同。1966年5月至7月，除了文教界和北京市委以外，中央和地方绝大多数党政领导干部处于领导地位，而知识分子则是被批评和批判的重要对象。因为此时运动被普遍理解为文化教育界的革命，主要打击文教领域少数领导人和知识分子。这时期的红卫兵，其主要成分也是自诩“自来红”的红五类子弟，他们后来被称作“老红卫兵”。但到了1966年10月以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扭转了运动的方向，领导层和知识分子的处境发生了微妙变化，而“老红卫兵”也逐渐不再是运动的主力。¹

针对前后的微妙转折，批注者言：这是毛预设的战略进攻步骤。毛利用传统观念和习惯政治势力造势，然后形成不可改变的倾向，借以控制全局。从而才有可能进一步利用已经造成的形势，攻击主要的政治敌人。如果没有这个转化策略，贸然进攻掌握实权的大批敌人，必将或失败或最后妥协，达不到完全打倒政敌的目的。

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提出中央另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陈伯达看到毛泽东这张大字报后，迅速写出一张《拥护毛主席的大字报》，从“理论”上加以发挥：

完全拥护毛主席八月五日写的一张大字报。一个共产党员，在大的政治斗争的关键，

¹ 同上，第354—355页。

忘记了群众，忘记了阶级分析，看不见阶级大变动的最新动态，还进行镇压群众，这就是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轨道，脱离了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同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方针政策背道而驰。这样做不是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引向胜利，而是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引向失败，引向资本主义复辟。大海航行靠舵手——毛主席把党的领导从最近一两个月的错误路线引回到无产阶级的正确路线上来，这是党的伟大胜利，无产阶级的伟大胜利，我国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同时是国际无产阶级的伟大胜利。马克思曾经说过，社会主义革命可能由法国首先发动而由德国来完成，但没有实现；列宁也设想社会主义革命可能由俄国首先发动而由德国、法国、英国来完成，但也没有实现。现实的历史可否说社会主义革命由俄国首先发动而由中国来实现呢？看看现在修正主义在苏联篡党、篡军、篡政，把苏联引向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那里正从革命走向反动，走向列宁、斯大林的背叛。难道这不像人们所说国际的希望在中国吗？

批注者言：这是文革的一个重大秘密！注意陈伯达这段文字中的三阶段陈述方法。这里的秘密，陈倒是心领神会，抑或毛泽东已私下面授天机，故陈有此文。总之，文革必行有二：第一，过去的倒行逆施、罪恶累累已经造成普遍矛盾和严重的恶果，用常规方法解决冲突已经不可能；第二，由于中国现代历史和社会背景规定了中国民主革命和中共历史任务的性质，当新的普遍的严重矛盾已经形成时，社会革命的任务必然是否定中共的历史地位。这在客观上决定了毛泽东走这条大冒险道路。因为不愿退出历史舞台。

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后，刘少奇失势。批注者言：一生执行毛泽东思想路线，这个“成绩”现在转化成了应该被革命的对象，而且是非革不可！为什么？显然这个“成绩”里面有罪恶，有反动，有非革不可的一切丑恶东西！但这是毛泽东自己的东西，刘少奇只是充当了实行的帮手罢了。为什么毛泽东自己不负责，不被革命，反倒要革执行者刘少奇及其他执行者的命呢？这难道不是这个文革最关键的中心问题吗？

首先，任何革命，必须具备非革命不能解决的重大社会灾难问题，才会形成革命的社

会势力，才会发生革命的爆炸性暴力行动。反之，太平盛世，民富国强，即便有政治野心之徒，也不可能策动社会发生革命大暴动，因为没有革命对象，没有可革和非革不可的革命内容。一个社会，如果一旦发生号召改变现状，而立即普遍群情振奋，那么这个社会，首先是罪恶累累，人民积怨太深了。这正是革命的前程。

1967年，全国各地逐渐进入“全面夺权”阶段，由此带来了诸多局势动荡。这种不安局面促使毛泽东做出调整，命令部队进行“三支两军”，期望以此稳住局面。然而混乱局面一时不可能受到控制，在随后运动发展过程中，不同行业开始出现了规模颇具的组织，这引发毛泽东担忧。

1967年7月至9月，毛泽东在视察华北、中南、华东地区时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要实现大联合；要抓革命，促生产，促战备，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10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工矿企业实现大联合的通知，采取釜底抽薪的办法，解散了跨行业、跨系统的群众组织，使经济领域的动乱走向缓和。1968年7月，毛泽东批准发出“七三”、“七二四”布告，强令武斗地区的工人回到工作岗位。月底，毛泽东决定向仍旧混乱的大中学校派出工人、解放军宣传队，同时也向生产秩序尚未恢复的工矿企业派出解放军宣传队。此后，全国进入“斗、批、改”阶段，群众全面造反时代结束。¹

批注者认为，毛在这一时段采取的稳定局势策略，恰恰反映出其“假革命”的本质。他说：假革命的真相暴露无遗，极为恶毒地向革命进攻，用枪把子决定一切。这是分化瓦解革命组织力量的阴谋。事实上，真正革命只有半年多的时间，其他都是政治派系斗争。

文革是真正的假革命。这是以旧社会矛盾的继续作为假象，欺骗掩盖新社会矛盾的本质。社会矛盾毕竟不同于党内斗争。文革领导者在实际运动中必须十分审慎，防止“政治革命”变为社会革命。他们一方面放手给予群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联、游行集会、成立群众组织、出版报刊等“大民主”的权利。另一方面，对运用这些权利的范

¹ 同上，第524页。

围、时间以及政治方向予以限制和引导；对于群众中越轨的言行予以批判、制止，甚至取缔、镇压。例如：批判造反群众提出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口号，以维护毛泽东和中央的领导权威；拒绝某些工人的经济要求，以保持政治运动的基本性质；取缔临时工、合同工和其他群众的全国性组织，以防止群众组织向政党演变等。

文革是举国狂热的一场造神运动，全国绝大多数人对毛泽东都极为崇拜。那么，这个过程中是否有暗暗反动的组织或个人存在呢？书中有作者认为，参加文革的亿万群众，动机各不相同，行为千差万别，但总体上没有超出毛泽东划定的大框框，更没有人公开明确地提出任何独立于毛泽东的理论、方针之外的政治纲领和不同目标。批注者则持否定态度：恰恰相反！如果真的没有与毛泽东理论针锋相对的理论出现，如果没有使毛泽东魂飞魄散的系统的理论出现在中华大地，如果没有使毛泽东惊心动魄的政治纲领将他推入危亡之地，他就不会贸然发动文革来捣鬼了。随着越来越多民间史料被挖掘整理，我们清楚地发现，当时还是有一批头脑清醒者不去顺应潮流的，甚至不乏敢于舍生取义，彻底否定文革，彻底批判毛泽东的义士。¹

1968年，轰轰烈烈的红卫兵渐趋消停。批注者认为：收兵之举成欲罢不能之势，这就引来了1969年及之后大量清洗城市红卫兵造反派的运动。上山下乡有两大目的：第一，清除城市红卫兵的威胁。这时，全国已无学可上，无业可就，留在城里非常危险。因为如万不得已，发生全国大规模屠杀，必将导致不测恶果。第二，边境不安，一旦发生战争，这些造反派就是最好的兵员，至少可以充当阻力。所以这都是势所必行的策略。

当时的中国边境，的确存在大量威胁。文革前半期，中国在国际上处于严重孤立状态，很大程度上，这源于中共自身的意识形态划线。1969年，中苏边境发生珍宝岛冲突，这次冲突对中国国际关系的调整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批注者认为，这次冲突的一个重要原

¹ 参见王海光：《一份反文革的传单》，载《时过境未迁》，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78页。

因，在于国内矛盾已经极为尖锐。他说：这是个阴谋！第一，国内激烈的矛盾冲突随时都有可能转变为突发的全国性大规模内战。一旦形成这种局面，毛泽东必将丧失一切实际权力，并且成为左、右双方的敌人，最终被彻底毁灭。为避免这已迫在眉睫的危险，有意识地计划利用“边界流血冲突事件”，转移全国视线，迫使所有势力放弃冲突，一致对外（实际上并没有这种危险）。这是转移矛盾，压制上升危险势力的一种绝妙手段。同时，这也是“珍宝岛事件”的真正目的。第二，利用这一轰动世界的事件，大造声势，促使美国重新考虑中、美、苏的三方国际战略关系，这也正是1971年中美关系变化的重大因素。

柯西金和勃列日涅夫这些人都是政治瞎子，明明被人戏耍了，还要向人求情。确实，他们都不是毛泽东的对手。弱可以胜强，以小博大，以虚化实，这是毛泽东晚年的一个杰作。很妙，也很险。当时，几乎没有人能识破毛泽东这个诡计。而如今似乎又无人详细分析这个小小的然而又是扭转了乾坤的大事件。

基于对高层权力斗争和社会矛盾的深入分析，批注者对文革的本质进行了宏观概括：

文革是什么呢？文革的起因是什么呢？目的是什么呢？它是历史必然路程上“人为”的一场戏，投机投中，而且很辉煌，也很成功。其秘密在于：

第一，1949年以后，特别是1957年以后，借用各种光辉的名义，打着各种旗号，利用各种借口，实行了各种各样大量的反动政策。造成了极其深广的恶劣后果。这是社会革命的社会基础形成的历史过程。

第二，1957年以后，到1963年，在国内、国际上造成了大量的敌人（其中包括在中共党内广泛存在的）。从经济、政治、文化、科学教育等全方面地引起反抗、愤怒和憎恨。急切希望改变现状的思想遍地皆是。

第三，1960年以后，到1966年之前，国内外、中共党内、整个社会的人民，怨恨沸腾。国内产生了以各种名义出现的反抗政治组织。国内形势岌岌可危。

第四，尤其严重的是，国内反抗的政党组织，已经非常成熟地提出了系统而又完整的

政治、经济革命纲领。（笔者注：是什么？未解释）

实际上，文革是一个大阴谋。一是打走资派（这名字也许有点冤枉，因为它是毛泽东给的），因为走资派对建国后，特别是1958年以后的各种倒行逆施造成的恶果有不同主张，即对毛泽东的皇权有对抗言行，故成了毛泽东的反对派（但走资派也最忠实地执行了毛泽东的所有倒行逆施方针政策，所以他们也是普遍恶果的直接责任人）。另一方面，是社会恶果造就了层出不穷的敌对政治组织，它把中共的历史叫做新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把中共的政权叫做国家社会主义，即资本主义的变种。新的理论上的威胁使社会矛盾空前危险。文革必须欺骗这些新生的敌对力量（后来的造反派），把他们引出来，充分暴露，然后加以消灭。这一切，才是毛泽东的真正意图。

说到底，毛泽东发动文革是因为，他极其忧虑地认识到（不是老糊涂犯错误），由于长期各种原因造成的严重的大量社会矛盾，从历史理论到现实生活，政权已经受到严重威胁。因为这些无法解决的矛盾，他个人已经受到了冷遇和排挤。这时他毫无办法。形势是阻洪，不如泄洪。利用瞒天过海，偷天换日的手段，把社会中隐藏着的解决社会命运的革命纲领窃为己有，假借“革命”的名义，把革命暗暗涌动的洪流，主动引出来，避免它对政权的冲击。

代价就是牺牲所谓的“走资派”（实为中共执政的全部主力）。当发现涌动的革命势力要求彻底摧毁旧政权时，毛又利用当权势力镇压。对能软化的，可收为工具；不能的，予以消灭（刘少奇、彭德怀、贺龙、林彪等）。这些戎马大半生的同道，都是文革的牺牲品。这些人的悲剧在于，他们既忠实地执行了毛泽东的一系列荒谬倒行逆施，又反对（至少是反感，敢怒而不敢言）这些荒唐的做法和后果。本来，社会矛盾、政权危机，完全是毛泽东的错误造成的。文革却偏偏把这个责任，转嫁到这些还有良知的党内民主派的头上。这就是最真实的历史本相。国家、社会、人民、中共自己，都遭到了空前的大灾难。从根本上说，文化大革命没有给中国带来任何益处。反之，却造成了空前的损失和悲剧。

这一切就是毛泽东进行政治投机、冒险的真正原因。他的目的是利用假革命，消灭真

革命。当时已经初步具备革命的社会基础，但代表时代的革命思想、革命纲领，未能向社会广泛传播。正因为如此，文革这个假革命才得以实施。文革是假借革命名义、革命口号，利用普遍强烈的革命愿望（实为长期受压榨造成的痛苦的反抗情绪），以牺牲“反动派”为代价，达到破坏社会革命的反动目的，所以，它是真正的假革命。

五、结语：不尽思考与关怀

文革结束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并迅速在全社会开展拨乱反正工作。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式否定了文革。在《决议》起草的问题上，中共高层一度煞费苦心，焦头烂额。如邓力群所言，“起草过程最大的难题，是毛泽东同志‘自己跟自己打架’”。而《决议》将毛泽东错误排除在毛泽东思想之外，似乎解决了这个棘手难题。甚至有人将毛泽东思想批判毛泽东错误的构思，称作《决议》的一个杰作。¹这样一来，更证明毛泽东思想确实是科学原理，更不能丢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批注者写道：“这种把戏，只能是自欺欺人的无能表现。”

对于这种把玩文字的精致伎俩，批注者表达了强烈的反感。他认为人们甚至不知道文革是因为什么发生的，其反思也必然是自说自话，极尽护短之能事。正因如此，他对文革之后的中国社会充满了关怀与忧虑：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主要是最大限度的社会结构合理化，优选利润分配，以利于取得最大再生利润，使社会充满活力，以期全社会公民最普遍、最大限度地取得经济发展的实际益处。这样，这个社会才有存在的价值。严格说，计划交换、社会性的计划分配，应与商品自由交换，在根本上是功用一致的。正因为前者不是以实际社会生产需要、社会生活需要为准则，而是以集团政治利益需要为宗旨，所以才造成恶性的社会经济后果。马克思误以为是商品经济造成了社会两极分化，贫和富都被逼进了死胡同，造成社会灾难。

¹ 《回首文革》，张化、苏采青主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年，第18页。

所以，他主张消灭商品经济，这是非常荒谬的。资本主义条件下，企业生产的有序、社会生产的无序，只能是暂时的历史现象。无论在何种社会制度下，经济的最大化利润始终是社会的生命。而利润分配上的社会受益最大化，则是社会存在的最根本条件。一个没有普遍社会实际利益的社会，必然是经济趋于停滞，社会动荡不安的。最后导致大变革的来临。

在国家社会主义条件下，利润的集中不再是大资本家和大资本家集团，而是国家政治官僚集团。在这种条件下，社会计划经济的秩序，隐藏着和体现着统治集团的意志和利益，它与社会普遍实际生活利益背离。这与资本家集团对生产最大利润的垄断，与整个社会生活利益背离，在本质上是一样的。而且比私有资本主义社会更恶劣。这就是为什么国家社会主义更容易灭亡的原因。社会主要矛盾是官僚政党集团与全社会民众的对立关系，这与社会中因发展商品经济而产生经济对立矛盾是两回事。

这两册书的阅读，整整花费了批注者一年时间。一方面因为年事已高，难有持久的精神状态。另一方面，他也分明进行了极其细致、深刻的思考。他对这套书的评价是：

这本书有真话，有鬼话，有瞎话，有伪造的假话。总之，这套书很好，它尽可能详尽地阐述了这群卫道士的肺腑之言，发挥了他们生平所有的才能。但不可避免地为历史提供极为系统的反面教材，这是无可奈何的。

可惜，中国人还在迷梦中。

所谓历史唯物主义，所谓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所谓经济基础、生产关系是历史变革的根本条件等等，这些神话，按此书的记载，有多少是对的呢？！与“天子”是上天的儿子一样荒唐。到2015年2月22日上午，才全部读完。有时想：所谓历史，该如何理解？！■

【旧文新编】

纪念海外“文化革命”四十六周年（1970-1976）

——一段金色的记忆与反思

龚忠武

一、金色的记忆

今年是大陆文革50周年，这场当时轰动世界的运动，现在虽然已被似水的岁月冲淡，但也同样值得海内外中国人纪念反思。

往事有的如烟，有的却是金色的记忆，历久而弥新，最好的例子就是有幸亲身经历的钓运；之所以历久而弥新，是因为当时这场运动，犹如声声春雷，震醒了在长期严峻的冷战氛围下与祖国隔绝二十多年、处于冬眠状态的台港海外广大华人的政治意识，打破了台海两岸二十多年的冰封状态，启动了祖国与台港海外华人“笑泯恩仇”的大和解进程，因而在近现代海外华人的爱国爱族运动史上、进而在中国的近现代史上，特别是在中国统一运动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深远历史意义，怎么强调都不会过分。

质言之，钓运，本质上虽然是场台港海外留学生的爱国运动，但更是一场在受到美国学生的反战运动和国内文化大革命（文革）双重刺激和启发的台港钓运世代的带动下，唤醒海外广大华人、认同祖国、回归中国历史文化主流的深刻的文化思想革命。

二、海外的“新五四运动”

盛传1971年周总理对历次“破冰”的海外老保钓回国访问团转述毛主席对钓运的历史评价，高度赞扬钓运是一场海外的“新五四运动”。（3）此即本文题旨之权威依据。职是

之故,史家一般认为1919年的旧五四运动是场“文化革命”(有的史家称之为中国现代的“文艺复兴运动”),那么依此类推,钧运这场“新五四运动”,当然也可以说是场海外的“文化革命”。

新旧文化革命,有其共同特征,其中首先是两者都是爱国学生带头发动的学运,而且都是因恶邻日本横蛮的领土侵略激发的,前有山东事件,后有钓鱼台(这是台湾的说法,即大陆所说的钓鱼岛——编者注)事件。所以新五四运动继承旧五四运动的反帝爱国主义精神,也标举“内除国贼、外抗强权”、“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不可以低头”的口号作为运动的旗帜。

两者所谓的强权虽然依旧是恶邻日本,但时移世易,国贼却不同了,已经从旧的北洋军阀集团变为新的独裁武夫蒋介石。在台湾成长的欧美留学生,特别是留美学生,公开向全世界宣布反对他们“养之、育之”的政府——国民政府——政权的合法性和代表性,转而认同新中国政权的合法性和代表性;单就这一点而言,钧运就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政治革命,虽然只限于少数留学生,但具有高度象征性的和实质性的时代意义。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这就相当于从清朝变为民国的改朝换代的革命性变化;1949年大陆人民已经推翻蒋家王朝的民国,改换了政权;但由于直接或间接依附台湾国民政府的台港海外华人,在美苏两霸主导的两极冷战世界格局之下,人为地异化于大陆母国,而被推迟了二十多年未能认祖归宗。现在的老保钧通过钧运,补写这一页历史,在台港海外广大的华人社会,初步肩负起推动一统中国的历史使命。

说它是初步,主要是因为在中国统一的进程上,由于美日大小海霸不断设置障碍,想方设法,百般阻挠、扶植岛内外的各种分离势力,所以在一统中国的道路上还有一段漫长艰辛的路要走;因此,钧运只是在朝这个方向迈出了第一步,虽然就国家而言,只是一小步,但对老保钧个人而言,却是一大步,改变了他们人生方向的一大步!

三、货真价实的文化思想革命

但是，另一个突出的共同特点就是，新旧文化革命都很快由政治社会运动的学运，深入演变为影响深远的文化思想运动，一场文化革命。旧五四拜德先生（民主）、赛先生（科学）为师，打倒孔家店，彻底批判孔丘主义，引进欧美的自由主义和欧俄的马克思主义；“新五四运动”当然也拜德赛两位先生为师，但已烙下新的时代印记，老保钧批判资本主义、自由主义，而赋予新的进步的时代内容。

质言之，就是除了继承旧五四运动左翼拜洋人马克思为师之外，更进而拜中国人自己的毛泽东为师，推崇他为反帝的民族英雄，从而将以“民族救星”自居的蒋介石贬为“国贼”；这一褒一贬之间，对在蒋家个人崇拜的愚忠教育下成长的台湾留美学生，不啻变天变道的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因为毛泽东早被蒋家“汉贼不两立”的反共神话教育定性为“祸国殃民”的“匪”、“民族罪人”。所以单就老保钧反蒋认同毛泽东主义的新中国而言，就是一次货真价实的文化思想的革命性飞跃。

另从广义的文化思想领域而言，新旧两个文化革命都有创意，都有担当；旧文化革命不但敢于扬弃被奉为国教的孔丘主义，引进欧俄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且进而走入广大的中国农村，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彻底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

与此相较，海外的“新文化革命”，则敢于自我批判，扬弃国民党和西方史观的中国近现代史，虚心学习马列毛思想，回归祖国的历史文化；特别值得突出的是，老保钧通过如饥似渴地学习毛泽东主义，推崇毛为英雄伟人，对恢复自1900年庚子国变以来长期浸淫、耳濡目染，迷恋西方文明，形成“只知有洋不知有汉”的习惯思维、从而早已丧失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的海外华人、特别是知识人而言，如今自愿地拜自己的汉人为师，的确是一次政治忠诚的飞跃，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思想大革命！当然，之前崇拜的蒋介石也是个汉人，但不是自愿的，只是蒋家精心编织的一个神话！单就这点而言，钧运就是一场深刻的文化思想革命！再怎么强调，也不会过甚其辞。

当然就历史场景而言，旧文化革命发生在自己广大的中国社会，而新文化革命却发生在边缘的台港和散居在异域他乡的华人社会，特别是蜗居在全美校园、人数极其有限的台港留学生。由于脱离了母体，先天不良，所以注定不可能起到多大的主动作用，有多大的作为；只能被动地起着边缘的或桥梁的作用，随着祖国母体主流的变化而调整适应。所以，老保钧受文革思想和作风的启发和影响，亦步亦趋，有样学样，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四、见证和参与

笔者有幸见证并深入参与了海外“文化革命”的进程。我是1966年秋来到哈佛的，1969年春末取得博士生资格后，原本打算走前辈的老路，专心撰写论文，然后做个教书匠，误人子弟。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这时风云突变，天下大乱；在东亚，中美进行第二次战略大决战的越战（1965-1975）的烽火，正在中国的南大门炽烈地燃烧；美苏的二元国际大格局正在面临毛主席领导下的新中国发起的结构性的严重挑战；在非洲、东欧和拉美的第三世界，人民革命的如火如荼；（4）在国内，文革的洪流正在席卷神州大地。

国内外的急剧变化，不禁令人深深感到国际的格局正在发生冷战以来空前未有的重大变化。每天报章电视上报道的全是越战的惨烈战况，美军的伤亡人数，以及美国各大学校园进行的没完没了、如火如荼的反战运动；哈佛校园也不后人，经常爆发示威罢课、占领行政大楼等激烈的抗争活动，有时整个学校几乎陷于半瘫痪状态。然而作为一个中国留学生，虽然内心深受触动，但还是可以置身事外，作壁上观，乱中取静，不必像美国同学那样担心被征召到万里之外陌生的越南战场上，打一场无理的不义战争。

但这只是表面的暂时平静，实际上从到哈佛的第二年起，特别是从1968年起，苦闷、抑郁、日益对美国中心史观和美国利益至上的哈佛学派主导下的美国中国学产生严重疑惑的阴影，（5）已经逐渐在我的心湖里形成了汹涌的叛逆暗流。初来哈佛时的兴奋、乐观的心情已经随着欧美学生的反战风潮和文革的风暴而日益冲淡，一旦有引爆的导火线，这股

深藏在内心的苦闷及对现实的严重不满情绪，就会像洪水决堤一般，一泻而无所底止。

1970年底台港留学生在普林斯顿大学和威斯康辛大学首先引发的钧运春雷就是这种导火线，它将我从绮丽的哈佛之梦的主观愿望中震醒，激发了潜藏在内心深处的爱国主义和传统中国士人关怀国事世事的激情。激情使我向台湾国府造反，向费正清和哈佛学派造反，与台湾和美国的学术界告别，从此走上了孤独的、满布荆棘的体制外的学术道路。(6)

简言之，此后至今，我选择了走自己的路，一条从流落异国他乡的“民国遗民”（法律上还是中华民国的国民），回归中国历史文化主流、认同社会主义新中国的道路。

简言之，就是见证和深入参与海外的钧运。(7)作为一个老保钧而言，其间(1970-1976)标志深入参与钧运的活动中值得一提的重要活动，就是以自由主义左翼的立场主编了《哈佛中国留学生通讯》、与美东的老保钧共同创办编辑了学生刊物和报刊，例如纽约的《群报》、麻州的《新境界》，并于1976年分别主编了美东纪念毛泽东、周恩来逝世的纪念特刊。此外，就专业的领域而言（间接同钧运有关），笔者还同当时哈佛校园的反战美国同学参照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主义，合写了一本旨在批判以“现代化理论”为主流的中国学的专著，China's Uninterrupted Revolution（《中国的不断革命》），构建一套美国自由主义左翼的新中国学，(8)并于1975年由纽约的万神殿出版社 Pantheon House 印刷发行，(9)颇获好评。这篇文章的完成，标志我基本上完成了思想改造，也可视为海外文化革命的一个颇具代表性的史例。

五、就地报国

1975年响应周总理海外老保钧就地报国的号召，同一两百多名台港海外已经基本上完成“自我批判、认同新中国”的思想改造的老保钧，一道进入联合国中文处支援新中国的国际事业。此后直到1997年笔者从联合国退休，其间继续发挥钧运余热，以业余时间同纽约侨界爱国华侨共同创办了《侨报》，并兼任外聘的社委、总主笔、主笔，协助编务，撰

写大量评论；还利用假期，以《侨报》特约撰述名义走遍祖国大江南北、塞外江南，实地采访报道中国的脱贫事业。事后汇成专辑，分别在两岸刊印发行。（10）

六、深刻的反思

狄更斯说的好，“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双城记》）。（11）这也正是钧运岁月的最好刻画；在历史的大转折时期，在新旧交替、正反的激烈斗争过程中，龙蛇混杂，泥沙具下；钧运固然是老保钧的峥嵘岁月，也有不少令人遗憾的阴暗现象；其中令人遗憾的现象之一就是，海外的老保钧对国内红卫兵极左的偏激行为也盲目地有样学样，国内批白专的样板张铁生现象，竟然一度也成为时髦，例如纽约有个紧跟派、自认“一贯正确”的老保钧，公然在哥大的一次公开的讨论会上，也把著名的历史学家何炳棣当成靶子，指名道姓地批了一顿。何老如此，我这个研究生何能例外，笔者挤出假期时间返回哈佛撰写论文，也成了白专的罪证。也正是此人，有一次竟然当着哈佛燕京图书馆一位美国馆员的面，说某位老保钧是个“职业学生”，完全不知道此话的政治严重性和可能的后果。类此离谱出格的怪异言行，不胜枚举，都是钧运中值得反思、不应讳疾忌医的“脑子发热”的极左现象。（12）

七、昙花一现，走入历史

正当这场海外文革方兴未艾、从钧运转入统运之际，国内政局却又发生了钟摆式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毛主席于1976年逝世，邓小平随后出来主政，从理论到实践，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彻底推行向欧美资本主义取经全力发展经济的改革开放政策。（13）当然，在此路线下，海外的钧运和“文化革命”也随之被全面否定，甚至还被国内邓派的某些过激人士上纲上线，将言行偏左的少数老保钧戴上“海外四人帮余孽”的政治大帽子；可见

处境之严峻，当然曾经轰动一时的海外“文化革命”也在这种大气候下昙花一现，走入历史，成为钓运中一项“未完成”的爱国事业；连带波及的是上面提到的笔者同哈佛反战同学合写的《中国的不断革命》，（14）从此被束诸高阁，再也无人问津，甚至成了为笔者贴上毛左标签的黑材料。

八、风云际会、神奇巧合的一年

然而世事多变，今年的2016年风云际会，许多重要的历史节日神奇地巧合到一起，例如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五周年、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越战五十周年，新中国三大伟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相继逝世四十周年等，美国钓运四十六周年（台湾钓运四十五周年）。更巧合的是，有幸也是笔者来美游学取经（1966年9月6日抵达哈佛校园）的五十周年。

回顾往事，固然并不如烟，但笔者尤以毕生得以有幸见证并深入参与海外的钓运和文化革命——一项民族的事业——而感到自豪。诚如老保钓的一位领头人袁旂所言，对台湾的保钓世代而言，不论个人的事业多么成功，如果在钓运这项民族大业也即海外的文化革命中缺席，将是终生无法弥补的莫大遗憾！（15）梁任公的家教传承就是两个字，“爱国”；钓运，就是为钓运世代上了最好的“爱国”这一课；如果一个中国人忘掉了这个民族的至高无上的精神追求，岂能终生无憾？！

记忆，毕竟是已经消失的往事；但世事无时无刻不在变化发展，种种迹象显示，习近平主政以来，中国的历史似乎又进入了另一个大调整时期，党和国家建设的重心，显然已逐步从邓小平时代的经济建设，转向文化文明建设，开始在文化思想领域有所作为、有所宣誓、有所构思了。例如今年5月17日习近平在“构建打造具有中国特色风格的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昭示国人和海内外华人，今后国家建设的当务之急，最优先的工作，应该是在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各个门类，构建一套完整的、系统的、具有中国特色、

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近现代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从西方主导的话语体系中解放出来，为中国在近代世界定性定位，让每一个中国人知道自己在世界上、在人类历史中的位置。

习近平所谓的今后国家建设的“当务之急，最优先的工作”，不就是“重点”的意思么！可以设想，习近平启动的这个文化思想建设的旷世大工程，必将同毛邓时代一样，为中国人，为炎黄子孙，迎来另一个傲视古今的辉煌大时代！

实际上，由上文可见，早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海外保钓运动中，我们这批台港的老保钓，包括作者在内，早已经沿此方向，多少作出了一些初步尝试性的努力，迈出了一步，虽然是微小的一步。后来由于邓小平大力推行向西方取经的改革开放政策而戛然而止。但其成败得失或有可值得借鉴之处。这也是作者撰写此文的一个目的和愿望。

值此纪念钓运、海外“文化革命”的46周年之际，本文作者未敢忘保钓认同祖国、回归祖国历史文化之初心，愿以微薄之力，谨以此文，支持习近平高瞻远瞩的呼吁，继续完成海外“文化革命”在这方面有始无终、有待完成的历史使命。

余论：正当拙文完稿时，欣闻中国女排意外地摘得奥运女排桂冠，不但“举国震动”，甚至全球华人无不为之激动振奋，网路报章涌现潮水般的褒扬颂赞之声。其中对这支平均年龄不足24岁的队伍的顽强搏斗精神有这样一段深刻的分析，说她们“一路走来，可以被打败，却始终无法被打倒”；如果按照这个思路稍加改写为“可以被打败，不可以被打倒”，这不正是旧五四标举的“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不可以低头”的爱国主义精神的现代版么？所以同秉承“永不放弃”的保钓拼搏精神一样，也可视为新旧五四精神在当代体育领域的发扬光大，一脉相承么？

感谢郎平带领的女排，使我们在今天纪念海外钓运46周年之际，赋予鲜活的新意，并得到启发和鼓舞！ ■

注释

1.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简称，这里之所以不称为海外的文革，而称之为打上括号的“文化革命”，主要考虑到自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四十年里，文革二字已成为具有约定俗成的特定意义的专有名词；不但如此，还带有“妖魔化”的强烈贬义，而且又偏于服务于狭隘的政治权斗的意识形态；再者，其全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无产阶级”一词，与海外华人社会的情况扯不上关系。是以与本文的题旨格格不入，故称之为一般意义的“文化革命”，而不简称为文革，以示区别。

所谓一般意义，是指用“文化革命”在表述人类文化文明史上，大而言之，在价值、信仰、世界观、人生观、历史观、政治忠诚等领域的重大的质的变化；例如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欧洲近代初期的文艺复兴，中国近代的五四运动等。小而言之，例如为人处世的态度，喜好爱恶等。此即本文之主旨，以区别于文革，虽然两者有颇多重叠之处。

2. 钓运爆发时间有两种版本，一是美国老保钓的，定于1970年12月，距今46年；一是台湾老保钓的版本，定于1971年4月，距今45年。作为美国的老保钓，本文是专为为纪念美国的钓运而作。

3. 七十年代初老保钓组织的历次回国访问团几乎都是蒙周总理在百忙中抽空接见，有时甚至交谈到清晨四五点钟。但记忆中，没有一个老保钓或保钓访问团能够有幸像海外一些名人，见到毛主席，老保钓对此百思不得其解，视为钓运史上的一大缺憾和困惑。但可以肯定，毛主席和周总理对当时海外的钓运是充分了解的，因为老保钓向国内提供了详细的第一手资料。（令人深感遗憾的是，后来当笔者在编辑钓运文献辑时，间接向外交部和统战部打听这批珍贵的钓运初期资料（文字的和影像的）的下落时，得到的答案是“不知去向”，竟从国家的档案系统中消失了！）

4. 令人大惑不解的是，由邓小平主持、胡乔木主稿的1981年的《历史问题决议》（全文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其中对笔者置身其中的、涉及国际格

局这么重大的结构性变化，也即文革发生的国际大背景居然未有着墨，轻轻带过，没有深入分析；这是有违唯物辩证史观的基本原则的。后来反毛的人据此也将密不可分的文革与越战，脱离当时的历史时空条件，强行分开孤立处理，完全不顾文革的丰富内涵、多项目标，而死死咬住狭隘的权斗不放；然而，大量的中英文资料有力地证明，通过“抗美援朝”在东亚进行的中美继朝鲜战争之后的第二次战略决战的越战，以砸烂美苏二元格局下不义的冷战国际秩序，正是毛发动文革的主要考虑之一，而且可能是最重要考虑。1972年越战末期、尼克松访华之后，中国体面地进入国际社会，成为三极之一，就是最好的证明。

与此密切相关的是，在《历史问题决议》中，邓、胡使用曲笔，硬说毛高估了当时正陷于“天下大乱”的国内外阶级斗争的严重性，从而坐实毛晚年提出的“不断革命论”的严重理论错误，犯了发动文革的严重错误的指控。这是邓派旨在证明其权力的合法性和正当性而搞的主观意识形态的政治史学，不是基于严谨学理和史实的客观科学史学，例如动态历史学。动态历史学，不是从意识形态出发，而是从“问题”的维度出发，客观地考察历史现象的因果关系（详见笔者的《历史的毛泽东，现实的毛泽东，未来的毛泽东》的文字稿和视频，乌有之乡、谷歌、百度等网站）。学问、理论、学说，原本都是为了解决、解释、说明问题，否则就不能成立，纵然有权力作为后盾。作为纲领性文件的《历史问题决议》，当然也不能例外。

由于不是客观的科学史学，所以对于1972年西方盟主、美国总统尼克松为何竟然时值邓派所说的中国“正陷于经济崩溃边缘”、“历史浩劫”之际，不远万里，访问中国，央求“将中国陷于浩劫”的毛主席，帮助美国体面地从深深陷入越南的泥沼中脱身。消息灵通、精于计算的美国政坛老手，尼克松会干这样的蠢事吗？然而，对此具有全局影响的中美关系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官方每年只是作为一个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天上掉下来”的既成事实，纪念如仪，从未作出令人信服的学理上和史实上的解释，也就不足为怪了。前胡总勉励中国史学界“科学治史”，就这点而言，徒具形式而已。

5. 毋庸置疑，我的两位指导教授费正清、施华慈 (Benjamin I. Schwartz)，学识渊博，

都是大师级、宗师级的大学者，让我这个不远万里西来取经的外国学生受益良多，较之我在台湾师从过的老师确有过人之处；特别是费正清，融史料学和社会科学于一体的锐利的现代治学方法，加上他不拘一格、体现美国当时独领风骚的盛世气派的开放式治学风格，更是深受启发。但他们以欧美中心史观、特别是美国利益至上为指导思想，由此预设而得出的结论，有的肤浅万分（何炳棣对美国中国学的一般评论），甚至有的迹近荒谬，实在令人不敢苟同、无法接受。

费正清对此当然有自知之明，并不否认，甚至公开承认这是他作为一个爱国的美国中国学家应尽的天职，而且预感到这可能会在中美两国间引起麻烦：

然而中国专家，虽然试图充作(美中两国的)中间人，但无可避免地必须要占在一边。在基本态度上，他们反映本国的文化及其偏好。因此，人们难免会质疑他们是否能够充分了解中国，也会质疑他们究竟对美国又有多少了解。

简言之，要处理好中美关系，我们必须对双方都有很深的了解。但是中美这两个实体都在改变，而且变得很快。单单只是历史那是无法让我们得窥全貌的。这就是说，中国专家根据的假定和所作的分析，都可能只是反映受美国文化制约的盲点。例如，在这些文章中，我特别珍惜对我国传统体制具有根本价值的法律、个人权利和民族自决至上的理念。然而我无法预知这些价值是否也会在中国当道流行。那么它们会在中国将我们引向冲突吗？

6. 这些年来，好心的师友们经常关心地问我为什么不回到学校教书。是的，在改革开放期间的这二三十年也即在到联合国“就地报国”的这段期间，确曾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而且的确多次有很好的机会回归学术界的体制内做个教书匠或研究员，但都由于种种现实的原因和考虑，最终决定还是走自己治学的道路，做个体制外、独立思考的“独行侠”（笔者老友、台湾文学家吕正惠教授90年代初在台湾统联内部的一次会议上的戏言）式的历史学者，是个比较好的选择。

7. 我是在大波士顿地区投入钓运的。在运动初期，我是个后觉者，见证者，全美校园已有不少台港留学生走在我的前头。就我所在的大波士顿区的台港留学生而言，这时一下

子跳出来决不只是一时的冲动，而是经过了一段思想和心理上的准备阶段；那就是在1969年下半年和1970年大半时间里，这些得风气之先的先行者，不断受到美国学生如火如荼的反战运动的刺激和鼓舞，同时更受到来自大陆文革“造反有理”的思想的启发和激励。于是哈佛和麻省理工学院两校的台港留学生便成立了由廖约克主持的读书会，不定期地学习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中共革命史，西方帝国主义史，以及鲁迅和三四十年代作家的小说。当然，毛泽东选集和马列主义经典也是必读的书籍。后来我也被邀参加他们的读书会，所以是个后知后觉者。

在学习讨论的过程中，我们很自然地进行了自我改造，扬弃了过去在台港接受的传统儒家和西方自由主义矛盾共存的历史观、价值观和人生观的心理思想结构；转而同情并进而部分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的历史观，价值观和人生观。

千万别小看了这个读书会的历史意义，它在冷战时代头一次使海外盲目膜拜西方文明的年轻一代的台港留学生开始觉醒，扬弃国府，认同祖国，并融入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潮流。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因为它为中国的最终统一和中国古文明的振兴，在海外播下了思想的种子，虽然非常稚嫩，但在海外已开风气之先！

这种转变可以从廖约克当时向小组提出的一个书面意见略窥端倪，并可以从中了解到哈、麻两校老保钓当时的思想认识水平：

如何能抓住历史的主要矛盾？还是那句老话：提高警觉，坚定立场。怎样做到这一步？我觉得是主动地去学习至少使我们有直接感受的问题。鲁迅留学的转变及对青年的批评与期望，胡适对西方社会的了解等等。而最主要的是看帝国主义今天在越南、金边、在南美、在非洲、在本国的黑人社会干了什么。

在港台，与我们姐妹们年龄相仿的被美军凌辱的少女们，在越南中弹后仍俯身去掩护他弟弟的一个七岁的小童，在芝加哥被射杀在床上的黑豹党的领袖，对于他们，什么是帝国主义及什么是认同等问题，相信是不存在的。

同学们，用我们的眼睛去看，用我们的心去了解一下这些在血泊中辗转的人民，我们

当更会深刻地体会到百年来中国所受的苦难是什么,我们当更明白在美国为虎作伥的意义是什么。很难想象一个人若能对眼前被压迫民族的苦难视若无睹,却会对几十年前祖先们的痛苦感到义愤填膺,热血沸腾。

8. 这时我们这些台港留美学生思想上革命性的变化,当然是直接接受了校园里美国反战学生的冲击,间接受了大陆文革的启发激励。拿我“及身受惠”的哈佛反战同学的造反思想来说,例如詹姆斯·佩克(James Peck)、倪志伟(Victor Nee,华裔美人)(社会学系),乔恩·利文斯通(Jon Livingston)、赫伯特·比克斯(Herbert Bix)(日本史)、托马斯·恩格尔哈特(Thomas M. Engelhardt)、詹姆斯·莫雷尔(James Morrell)、林培瑞(Perry Link,本是反战健将,六四期间却改变立场,在北京十分活跃,据说是他从中牵线引领方励之、李淑娴躲到美国大使馆逃避追捕的)(都是中国近代史专业)等,对我产生的潜移默化影响。其中有的是费正清中国近代史讨论班上的同学,有的甚至是室友(如利文斯通和莫雷尔)。他们不仅是当时哈佛的反战健将,而且在全美高校的反战运动中也起着带头作用。他们在美国风起云涌的反战学潮中,大胆地对费正清说,你错了。这真使我这个一向视费正清为不可挑战的学术权威的中国留学生,大开眼界!原来费正清也有错,也是可以批判挑战的。这些美国的“红卫兵”反战同学向老师造反,向体制挑战的勇气,给予我这个来自台湾的笃守师道尊严古训的外国学生很大的鼓励和启发!于是,费正清,这个美国中国学的一代宗师,在我的心目中的至高权威开始动摇了,也让我走上了向哈佛学派造反的不归路。这些美国同学对我思想的转变主要是来自同他们朝夕相处的言行,以及他们的反战文章和他们同费正清及他的助手傅高义在关心亚洲问题学者委员会上进行的针锋相对的精彩辩论。

他们的基本思路是,美国介入越南的战争是一场违反正义的侵略战争,根本不值得美国人民支持,不值得花美国人的钱让美国青年去送命,所以他们基于一个学者的职业良心,一定要坚决反战。他们进而从理论上分析导致美国陷入越南泥沼的深层原因是美国狭隘的国家利益,是僵硬的美苏两极的反共反华的冷战思维,是从理论和实践上都有问题的敌视

共产中国和在东南亚围堵中国共产主义的多米诺骨牌理论。费正清一手建立的中国学就是这种围堵中国的理论和大战略的一个构成部分。

1968年初越共的春季攻势后，美国在越战的泥沼中越陷越深，接连不断的越战灾难使他们深深感到，整个天都要塌下来了；过去他们深信的美国基本价值、教育体制和运作机制、政学关系、建立在言论自由价值上的大众传媒，现在一下都面临崩塌的危机，都需要彻底从新审视。一时间，美国人引以自豪的盛世文明突然变得都出了问题暗淡无光，一无是处！然而，对于越战揭露的欧美这种从社会到文明的深刻危机，《历史问题决议》视而不见，只字不提，只见到自己文革期间深受红卫兵的羞辱遭受到的身心“伤痕”而折射出来的并尽力夸大的中国社会、政治和经济的问题，所以是经不起历史和时间考验的。

这时我的好友和室友，佩克和利文斯通于1968年10月间，同费正清和傅高义进行的冗长的辩论的焦点，是质问他们所主持的东亚研究中心，为什么要培训在当时反战学生深恶痛绝的中央情报局人员。他们认为，这是根本违反学术的自由和独立性的，是可忍，孰不可忍？费正清被迫被动性地回应说，双方的合作是互利的，中心可以从国防部得到经费支持，并可从中央情报局得到保密的资料。费的回答彻底暴露了美国中国学的真实面貌，原来所谓客观独立的学术研究只是个幌子，中国学骨子里只不过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驯服的工具，为美国的亚洲政策提供所需的理论依据而已。

这些前所未闻的、令人震惊的反战、反权威、反现行体制的观念，从根本上动摇了我对哈佛作为一个维护学术独立和尊严的信念，使我对费正清一手建立的美国中国学的一些基本假定打了个大问号；连带地使我原来在台湾国民党长期教育下形成的传统儒家和西方自由主义矛盾共存的历史观、世界观、人生观的心理思想结构，陷入支离破碎的境地，以致思想陷入了严重的混乱状态；严重到不知道论文究竟要写什么和怎么写；严重到失掉了论文的立场、大方向和前景，不知道应该朝着什么方向来引导论文的论证。确切地说，这时我感到的是迷惘、失落、焦虑，陷于严重的思想和心理危机，同我初到哈佛时的那种意气风发和乐观自信，适成鲜明的对比。我的哈佛之梦，开始幻灭了！

历史是吊诡辩证的，黑暗的前夜露出一丝引导我走出人生黑暗隧道的曙光！当此时刻，我的美国同学们和他们的同志，例如哈佛的利·卡根（Leigh Kagan）、威斯康辛大学的埃德·弗里德曼（Ed. Friedman），华盛顿大学的马克·塞尔登（Mark Selden）等一批美国反战的红卫兵，假定导致越战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以费正清哈佛学派为首的中国学学者通过他们的著作和建言，向当道提供了关于中国的错误的研究成果和信息，并严重误导了美国公众。所以他们在1968年3月利用亚洲学会年会之际，将越南问题核心小组（Vietnam Caucus）扩大成为关心亚洲问题学者委员会（Committee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CCAS），长期推动对亚洲研究和中国学的重新评价。同时一方面纠集全美各地的反战同志，出版了CCAS学报，作为他们反战的言论园地，另一方面纠集一些研究生或教授向旧中国学造反，另起炉灶，撰写专论，从理论上批判以费正清学派为主导思想的现代化理论，并建立同情共产中国的进步的自由主义左翼 Liberal Left 的新解释体系。

于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这些美国同学决定写一本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专论集。1971年1月15日，该书共同主编佩克和倪志伟正式通过纽约一家有名的潘西恩书局（Pantheon Books）所属的兰登出版社（Random House）邀请我加入他们的写作班子，我当即欣然接受，把论文视为不急之务暂时放在一边，全力以赴。我被指定负责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近代文化思想变化也即历次文化革命的这个侧面，追溯文革的深层历史文化原因。

具体而言，我之所以乐于参与这项事业的基本动机与我美国同学不同；我的出发点不只是反战，是要通过这篇专论，试图从西方中国学学者的手里夺回中国自由主义者长期以来甘愿放弃的对中国近代历史的解释权（针对海外华人自由主义的史学界而言，当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早已从事这项事业）。所以我和这些美国同学是同途而殊归。

但是，这不是一篇二三十页的小文章，而是一篇无论就内容、时间跨度和篇幅而言，都相当于甚至于尤胜于博士论文的大文章。为了撰写这篇文章，这几年中我恶补式地大量阅读了大陆近现代史家和思想史家如范文澜、胡绳、黎澍、刘大年、侯外卢、李泽厚等学者的著作和大陆报章杂志上的有关专论；当然毛选和马列经典也是必读和精读的书籍。此

外，也阅读和参考了大量有关的英文书刊专论，从而为我的中国近现代史专业打下了学理和史料上的坚实基础。

花了整整三年多的时间，也就是相当于撰写一篇博士论文的时间，终于于1974年中完成了这篇题目为“Cultural revolutions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1840—1969)”（《近代中国历史上的文化革命》）的长达103页印刷页（非打字页）的专论，从鸦片战争起一直写到1969年，前后时间跨度长达一百三十年。拙文的方法是结合锐利的阶级分析观点、韦伯的理性分析法和儒家的道德史观，论证一个中心观点，即近代中国的无产阶级不是西方意义的现代产业工人阶级，而是由于国家长期沉重的外债、连年民不聊生的内战和帝国主义在不平等条约下的长期经济侵略，在广大农村和沿海城市制造了无数的贫困农民和工人的无产阶级，这是经济发展严重滞后的近代中国的特殊国情。这些广大的无产者极端不满现状，渴望推翻现状，所以要求革命，投入革命，成为毛泽东人民战争无穷无尽的人力来源。其次是结合辩证法的主观能动性的概念和儒家的道德直观法，说明毛如何在文革中改造中国历代一脉相承的“公”的概念，在现代工业化的基础上赋予现代内容，从而在毛泽东主义里引入了儒家的道德价值观念。在当时进行扬法抑孔、儒法斗争的大气候下，提出这样一个肯定儒家积极成分的论断，是需要一点勇气的。

对我个人来说，撰写这篇专论的过程相当于完成了一次深刻的思想改造；无疑地，这是我个人当时思想上的一次质的巨大飞跃，个人的思想革命。所以本文视钓运为文化革命的主旨，是以个人切身的心路历程作为根据的，而且不是孤立的，在老保钓的思想转变中很有代表性（参见笔者主编的《峥嵘岁月·壮志未酬》）。

历史学者很像一名社会医生，利用心理历史学分析方法，根据历史事实来诊断社会的病因。过去我这个社会医生，学的是传统儒家和自由主义的那一套本领，结果始终把不出中国近现代社会的脉动。自从通过镀过马克思主义之金的毛泽东主义——遗憾地是未能等到通过后来的“邓小平理论”，开始触摸到中国社会的脉动了。这个结果真使我喜出望外，兴奋莫名！

我之所以到哈佛深造取经，不正是学到这套本领吗？但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我不是从费正清、施华茨那里学到的，而是从批判他们的学派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主义那里学到的。这是我到哈佛之初怎么也没有料想到的！（参见拙文，《激情的哈佛岁月—夺回中国历史的解释权》，载于各大网站）

9. 所以可以说，我在哈佛撰写了两篇论文，一篇出版了，一篇则存于哈佛总图书馆。1975年我带着出版的文章去见施华茨，要求以这篇文章作为博士论文，但被拒绝，他说哈佛规定，已经出版的文章不能作为博士论文，所以被迫挤出业余时间又撰写了另一篇论文，《晚清最后一个儒家政治家的功名之路——张之洞和同治中兴》（1863-1881）。

10. 由于作者在1976年后所从事的有关钓运的爱国活动，已经超出本文论述的时限（1970-1976），所以不在正文详述，仅在本注释中述其大要，以备对钓运有兴趣者进一步研究参考：1996、1997年作者先后在台湾（人间出版社）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中国向农村的贫穷开战》（人间出版社）；2001年在台湾出版由陈映真和作者合编的《春雷声声》（人间出版社）；《盛世诤言》（2002年，（海峡学术出版社）；《一个书生眼里的国事、天下事》（2004年，台湾问津堂书局）；2006年在台湾出版由作者主编的《春雷之后》（人间出版社）（三大册）；2009年在北京出版的由作者和程君复及其夫人蔡文珠合编的《程君复先生纪念文集》（九州出版社）；2009年在香港出版的由作者和关文亮夫人朱织图合编的《关文亮纪念文集》（明报出版社）（两册）；2010年在台湾出版的由作者主编的《峥嵘岁月·壮志未酬》（海峡学术出版社）（两册）。（以上各书合称《春雷系列》）。

11. 英文略

12. 文革时期，笔者被贴上白专的标签，改革开放时期，却又被贴上了右转的老保钓眼中的“毛左”的标签；真是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左右为难，难以自处。当时，笔者也犯了跟风的毛病，积极参加了“批林批孔”、“儒法斗争”的活动，当然这也可以是一个有争议的学术问题。类此现象，是笔者认为钓运中应该深刻反思的反常言行。

13. 既然摆明了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了把经济搞上去，邓小平在国内的大政方针上，断然采取了与毛的政治挂帅截然相反的经济挂帅的路线；在国际上，以毛多年积累的丰厚政治资本交换美国和西方的经济金融资本，联美反苏，发动美国人“深获我心”的超越的自卫战争；在国内，否定文革，有限度的批毛等。

但就联美这点而言，当时的美国正值越战惨败之后，国际声望大落，霸气不再，邓的联美政策，无异于雪中送炭，在美国内外交困时帮了及时予以援手。当时的卡特政府，在布热津斯基的主导下，遵循尼克松、基辛格制定的联华反苏的政策，放弃越战时的大棒政策，改而推行直到现依然不变的“民主人权”的胡萝卜政策。可以想象，美国此后的历届政府，投桃报李，也给予邓小平和中国以丰厚的经济文化领域的回报，对中国提供发展经济不可或缺的市场、资金、技术、经验等，并开放大量中国留学生来美取经。

现在看来，这是邓小平总设计师的一个大胆的政治博弈，结果成败得失参半；中国的经济虽然搞上去了，成了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但为此也相应地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例如信仰迷失，道德、社会风气大幅滑坡，贪污腐化、拜金主义、崇洋媚外之风大行其道；特别是就两岸关系和中国统一运动而言，以政治换经济，着重两岸的经贸活动，放松对台独或独台思想的压制，以致这些年来台独势力在美日明帮暗助之下，终成气候，取得政权。这可能是邓派为此所付的始料未及的高昂的政治代价。有鉴于此，在文革中锻炼成长的习近平主政以来，大刀阔斧，拨乱反正，以便将中国的社会运作和两岸关系，再度纳入马毛主义思想主导的正轨。

14. 这本书参照马列毛主义，系统地批判了现代化理论，值此习近平呼吁重视中国话语权之际，应该引起国内新左派的兴趣。

15. 他们大部分至今仍无怨无悔，为曾经燃烧过的激情青春岁月而自豪，甚至表示如果再有一次保钓，他们将义无反顾地再次投入。（朱双一，《保钓运动的台湾思想史意义》）



【编读往来】

1. 张正儒认为，胡拾音的文章仍在沿用文革思维

文革中要想搞垮或丑化一个群众组织，往往给这个组织安一个“黑后台”或说这个组织“背后有黑手”。《记忆》185期胡拾音的文章还沿用这种文革思维和文革逻辑，让人感到他的思想还停留在文革中。研究文革应从大处着眼，仅利用一张2分钱的传单，大作文章，攻击一个有不同意见的群众组织，有什么必要和意思呢？编者把这篇文章作为该期头版头条，但愿这不代表编者对该文的首肯。■

2. 何蜀正误

第185期高校（九）的目录中“王复光”应为“王复兴”，郭予庆的信中数字顺序号1、2、……不合出版规范，应为1.2.……（在阿拉伯字母后面，不应该用顿号（、），而应该用下圆点（.））。另外，186期反右专辑（一）首篇刘新华的文章开头，提到《社会主义好》那首歌时，说是唱的“反动派想反也反不了”，可能记忆有误，早期的歌唱的都是“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后来排《东方红》大歌舞时此歌词才把“右派分子”改成了“反动派”，因当时已经有一些右派摘帽而且社会上也只称四类分子而不称五类分子了。

编者回复：谢谢何蜀先生的指正。上述三处误植都是我的失误。在阿拉伯字母后面，不应该用顿号（、），而用下圆点（.）的规定，我是知道的，这次疏忽了。刘新华文章引用的那句歌词，原来作者写对了，写的就是“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是我们自做聪明的结果。以后这类地方，应该跟作者通通气，不能妄加修改。（韦陀）■

3. 樊能廷对于胡拾音文章的一点意见

贵刊第185期专辑（九），刊载北大校友胡拾音《北大井冈山兵团和王、关、戚真的没有关系吗？》一文，读了以后有些感触，向你们反映一下。

①你们是井冈山兵团及其前身“团零飘井红”的领导人吗？如果不是，你们怎么就能断言“没有打过交道”？……

②“陈文”认为“团零飘井红”和井冈山兵团与王、关、戚没有直接来往，因而“没有一毛钱关系”，真是把自己的档次看得太高了。

这些都是居高临下、盛气凌人的语气。据知陈子明、林爻和胡拾音是北大校友，双方对于北大文革旧事，立场不同，认识不一，亦属平常。大家平等相对，摆事实讲道理，讨论和研究问题气氛好一些。保持起码礼节，还是应该的。 ■

2017年7月9日

【本刊声明】

本刊声明

《记忆》创设于2008年9月，是一份面向民间，面向业余，面向青年的同人刊物。《记忆》非慈善、非公益。编者尽义务，作者无稿酬。凡认同本刊的宗旨，并取得会员资格者，皆可获得本刊。

《记忆》主张众生平等，凡摆事实，讲道理的文字，无论何门何派，皆可刊发。除特殊情况，《记忆》要求首发。所发文章，不代表编者的观点。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等内容，均受国家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未经著作权人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xx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联系信箱：fxc1966@163.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

本期编校：方惜辰 立新

封面设计：贺真真

版式设计：韦 陀